

西方女性学

起源、内涵与发展

刘霓◇著



图书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西方女性学

——起源、内涵与发展

刘 霓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刘霓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
ISBN 7-80149-437-7

I. 西… II. 刘… III. 女性-研究-西方国家
IV.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5235 号

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



著 者: 刘 霓

责任编辑: 王晓丽 王元佑

责任校对: 闫晓琦 张景秋

版式设计: 辛 诤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37-7/D·067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西方女性研究是一个从妇女的角度出发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它包括教学与研究，包括对女性研究理论的丰富、发展与推广。女性研究教学与研究的范围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方面，还涉及到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女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觉悟的提高，使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成为与男性同等重要的参与者，女性研究为妇女从事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知识革命提供了基础和空间。

西方女性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妇女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8世纪，女权思想就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孕育并发展起来，代表这一思想的论著有1792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写的《女权辩护》一书和英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69年出版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两部书对英国妇女地位的分析，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抨击，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约翰·穆勒更在书中明确地指出：“我确认，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

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① 这一论断为妇女的觉醒、为她们认识自身所处的不公平的地位起了促进作用。

西方女性研究的大规模出现是基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女权思想发展积蓄的结果，然而它更为直接的动力是来自于西方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

- 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源起于美国。说它是第二次，是相对于世纪初英美妇女为争取选举权而进行的大规模妇女运动，然而在 1920 年选举权修正案通过之后，妇女运动进入了一段较长时期的沉寂，直到 60 年代才再度形成了一个活跃的高潮。第二次浪潮最早的参加者主要是白色人种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这些妇女在自己受教育和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经过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妇女获得了一些平等权利，但这些权利并未给她们带来平等的机会，不管是在教育领域，还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妇女仍然面对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有些甚至是对她们权利的践踏和对她们劳动的剥削。于是妇女们组织起各种各样的妇女组织和妇女小组，交流各自的生活经验，相互启发和提高觉悟，并通过开会，讨论，上街游行等方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影响舆论，形成了新的大张旗鼓的妇女运动。由于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已经十分普遍，大量知识界妇女的加入既为妇女运动增添了理论色彩，也为这一运动从校园之外走进校园之内、从游行队伍走进课堂、走进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① [英]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著，汪溪译：《妇女的屈从地位》，第 255 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95。

随着参与妇女运动的知识女性对妇女所面对的剥削与压迫的深层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的探索，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有关妇女问题的出版物大量出现。到 1971 年，在美国已经有超过 100 种与妇女解放运动有关的杂志和报纸，还出版了为数众多的女性研究理论论著，较为著名的包括：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Feminine Mystique*）（1963），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罗宾·摩根的《姐妹情谊是有力的》（*Sisterhood is Powerful*）（1970），舒拉米思·费尔斯通的《性别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ex*）（1970），伊迪丝·霍希诺·阿尔特巴赫的《从女性主义到解放》（*From Feminism to Liberation*）（1971），和维维安·戈尼克和巴巴拉·莫立的《性别歧视社会中的妇女》（*Women in Sexist Society*）（1971）。这些论著既是产生于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的代表性著作，也对妇女运动向学术界的延伸，以及此后的女性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是通过著书立说、创办新杂志、开设新课程，活跃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妇女运动进军校园，进入各级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通过教育和研究手段，启发妇女的觉悟，对传统的学科进行批判、改造和重建，由此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即女性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妇女运动和女性研究的形式与内容迅速传播到北美、欧洲，并进而发展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女性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各级妇联组织中，女性研究已形成一个正式的研究领域，1998 年北京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女性研

究的硕士研究生。许多研究人员经过长年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积累，通过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学科中女性问题的反思与感悟，自发地投入到这一领域中来，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各个角度对妇女问题展开研究，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中，妇女地位、妇女就业、女性角色等均已成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更是推动了我国女性研究工作的发展。

然而一个研究领域如果缺乏学术交流，便会缺少活力。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地了解国外这一学科研究的动态，吸取国外同行们的经验和教训，才能使我们的研究与世界上的同类研究接轨，便于我国的学者与国外的学者相互切磋，彼此交流。本书通过对西方女性研究的发展状况、理论方法以及相关的研究机构的介绍，向国内学者提供她们所需要的系统和全面的信息，使她们获得对国外女性研究发展情况的总体认识。这也正是本书希望达到的目的。

本书共分 9 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西方女性研究的起源与发展，并重点介绍了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家女性研究领域的具体情况；第二章涉及女性研究的定义、内容，女性研究课程的参加者，女性研究的教学方法；第三章对女性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重点评述；第四章重点介绍了女性研究的方法与特点；第五章概括性地阐述了女性研究在传统学科领域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它对传统学科的挑战以及为学科重建工作做出的贡献；第六章重点分析了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女性研究的状况以及所面对的一些新

的问题；第七、八、九章介绍了女性研究领域中与人类生存相关问题的研究，即与和平、发展和环境问题相关的研究，这些问题虽然不属于传统的学科范畴，但由于它们与女性研究的目的联系紧密，因此成为女性研究领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方面。

20世纪业已结束，新的千年已经开始，人类历史不可阻挡地飞速向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类社会取得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科学的、人文的、艺术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中，20世纪一个最不可忽视的景观就是妇女的崛起。妇女，作为人类群体的一半，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长久沉默、不为人所重视的一群，终于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们行动起来，呼唤妇女的觉醒，并呼吁整个世界认识妇女。她们从妇女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政治理念和学术思想，使之引导我们这个星球向着更健康、更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她们的力量与潜能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最后我想就书名做一点解释。女性研究在英文中是women's studies，在我们国家学术界中，对女性研究有几种不同的表述方法，比如有女性研究、妇女研究、妇女学、女性学等。出于各种考虑，本书的书名采用了西方女性学这一表述方法。但是在正文当中，我仍使用了女性研究一词，因为相对于女性学，我感到女性研究一词包含的内涵更丰富，可以更明显地区别于主流的传统学科，可以更好地反映它本身的跨学科性、开放性、反对权威以及行动主义的特点。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于沉默中爆发	
——西方女性研究的发展历程及个案分析 ...	1
一、从社会运动到学术研究	
——美国女性研究的发展历程	3
二、多样性的发展与生存状况	
——欧洲国家女性研究发展概况	8
三、窥一斑而知全豹	
——荷兰女性研究的个案分析	13
第二章 让沉默者讲话，为无言者立言	
——西方女性研究的内涵与主题	22
一、女性研究的内涵以及相关问题	23
二、女性研究的参与者——教师和学生	30
三、与传统学科有明显区别的女性研究教学方法 ...	34
第三章 赋予灰色的理论以生命的活力	
——女性研究的理论发展	39

一、女性主义理论中有关父权制的讨论	44
二、对普遍论和差异性的讨论	49
三、对妇女范畴的争论	54
四、社会构造论和本质主义的争论	57

第四章 吸收、对抗、丰富与发展

——女性研究的方法	61
一、女性学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 主要方法	62
二、女性研究与研究方法的关系	81

第五章 批判与重建

——女性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其特点	85
一、女性研究学者队伍的形成与壮大	85
二、向传统学科中的性别歧视宣战 ——女性研究的突破口	89
三、互动与重建——对传统学科知识发展的贡献 ...	94
四、女性研究学术发展的特点及其面对的困难	101

第六章 新的课题与新的挑战

——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研究的发展	110
一、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女性研究的概况	110
二、面临的挑战和新课题的形成	114
三、对未来战略与对策的思考	125

第七章 妇女与和平 129 |

一、人类和平是妇女始终不渝的追求	130
------------------------	-----

二、妇女对和平的理解与评价	132
三、世界和平与妇女利益攸关	135
四、女性研究学者对人类安全前景的看法	138
五、妇女探讨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特点	143
第八章 妇女与发展	147
一、走入误区的发展战略	148
二、女性研究领域中的发展研究概况	151
三、发展研究中的性别概念与性别意识	154
四、女性研究领域所倡导的发展战略	155
五、从福利到赋权——方法与思考	158
第九章 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	169
一、作为一个主题的形成与发展	169
二、妇女、环境与人口问题	175
三、女性主义与绿色经济学	178
四、妇女与生物差异保护	181
结 语 面向新世纪的西方女性研究	185
附 录 国外女性研究机构简介	192
主要参考文献	266

第一章 于沉默中爆发

——西方女性研究的发展历程及个案分析

西方女性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是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形成规模。在那之前，西方各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也曾有零星的有关妇女的课程，例如1892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学系曾开设过有关美国妇女地位的课程，这恐怕就属于最早的相关课程之一。此外在20世纪初，美国一些大学的经济学课程曾专门分析过工业社会中妇女的劳动力问题，如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912年由特丽萨·麦克马汉教授开设的“妇女与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变革对妇女地位的影响”的专题课程，上面这些课程与专题对今天的女性研究是有着紧密联系和重要影响的。

西方妇女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掀起高潮，这次高潮对女性研究在诸多学科中的确立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她们不满于人文社会科学现状，对传统的学科知识敢于提出质疑。196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一些积极投身妇女运动的女性学者组织召开了一个有关妇女的会议，在会上她们探讨了一些当时妇女运动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讨论，与会者认为这些问题应在社会科学和行

为科学的课程中给予专门的描述与研究，因此她们决定发起一门跨学科的课程，题为“女性个性的发展”。几乎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圣迭哥学院的女性研究计划也开始启动，新开设的课程有“比较文化中的妇女”、“文学中的妇女”和“妇女解放的当代诸问题”。到1970年底，美国各大学中开设的相关课程约有110门，此后这一数字持续增长，20世纪80年代初，全美大学与学院中的相关课程已达到3万多个，而跨学科的女性研究计划的数目也达到500个，1991年，68%的美国大学都提供有女性研究的课程。

这一女性研究与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局限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相类似的研究计划和教学课程在加拿大、欧洲也相继出现，紧随其后的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欧洲的情况与美国略有不同，以英国为例，女性研究是由一些具有政治目的的提高觉悟小组所发起，这些小组在最初并不是由学术界人士所倡导，而是围绕着妇女运动逐渐形成的。首批英国妇女权利小组之一是在赫尔成立的，目的是支持由莱尔·比洛卡领导的渔妇们要求改善拖网捕鱼者安全装备的运动；另一个是1968年成立的支持缝纫机工要求同工同酬和妇女权利的行业工会组织。英国女性研究在早期特别关注诸如“健康与传媒”这样一些专题，并经常探讨妇女历史以便为当时的运动提供佐证，这些运动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争取妇女堕胎权力的运动（National Abortion Campaign）和妇女的援助（Women's Aid），正是这些小组与活动逐渐发展为今天英国的女性研究。

虽然女性研究在北美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已形成

规模，但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中的存在方式是有着明显的地区特色的，本章将简略地描述女性研究在美国和欧洲的发展生存状况，并将荷兰的女性研究现状作为一个典型个案进行分析，以期使读者对这一问题有更为具体和感性的认识。

一、从社会运动到学术研究 ——美国女性研究的发展历程

美国的女性研究起源于校园之外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而这一斗争的内容也就构成了最初女性研究与教学的目标、内容和理论，对确立女性研究计划目的的阐述也反映了这一政治取向。一位女性研究计划的组织者曾这样写道：这一教育将不是一种学术上的研习，它将是一个改变妇女思想与行为方式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必须成为争取建立一个新的和更完整的社会的一部分。^①

至少就理想而言，女性研究从未仅仅限于为平等权利而斗争，而是要从根本上对一向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领域所形成的知识主体进行重新思考。多少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妇女的成就与经验或是视而不见，或是进行曲解，因此，女性研究应该在总体上对一般性的学术概念进行反思，挖掘妇女经验的宝库，在妇女具体实在的日常生

^① Howe, Florence, 1984, "Women's Stud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Howe, Florence (ed.), *Myths of Coeducation: Selected Essays, 1964~1983*, p. 10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活中寻找真理。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洛伦斯·豪对女性学者探寻知识活动的阐释就表现了这种立场，她认为：首先，有一个准确和诚实的真理与知识的问题；第二，有一个真理与知识的目的，它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拥有的机会，追寻历史的真理和赋予妇女权利这一女性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理想上是就全体妇女的利益而言的。^①

正如前面提到的，女性研究凭借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的推动，走进了美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并在随后的十几年中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促进女性研究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专业协会中妇女核心小组和委员会的成立，这些小组要求对女性学者和她们所关注的与以往不同的学术问题给予更多的承认。虽然这些委员会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妇女的专业地位和在职业发展方面的机会，然而它们在客观上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妇女的注意，使之成为学科中教学与研究的一个主题。在这些委员会中，因学科的性质和工作其中的女性学者人数所决定，有些表现得十分活跃，如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等领域。在1970年，现代语言协会的妇女地位委员会协助出版了女性研究系列的课程提纲和参考书目，成为服务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师的信息资源。同样，美国历史协会的女历史学家委员会也为G. 勒纳《教授妇女的历史》一书的筹划与出版起了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女性研究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

^① Howe, Florence, 1984, "Women's Stud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Howe, Florence (ed.), *Myths of Coeducation: Selected Essays, 1964~1983*. p.10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域，1977年美国全国女性研究协会（NWSA）宣告成立，该协会的宗旨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各种教育环境中促进女性研究在社会、政治和专业方面的发展。协会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大批热情的成员，其中不仅有学者，还有小学和中学的教师，以及图书馆员和其他对女性教育有兴趣的人士。协会在为女性研究的从事者和支持者之间的互相联系、为传播女性研究的知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还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在女性研究逐渐形成规模之后，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让学术界将其视为一个合法的研究领域，对它的学术活动给予支持，对它的研究成果给予承认和重视，在这方面，基金会和其他一些提供研究经费的机构起了关键的作用。1972年福特基金会首先启动了一个为女性研究提供的研究基金计划，它不仅是对单个学者的研究给予了支持，而且对这一领域获得显著的和合法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有了基金会的支持，一些有组织的研究中心也得以成立，这些中心为女性研究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是美国女性研究档案馆和研究中心大发展的时期，到80年代中期，全美就已经有大约50个女性研究中心，这些中心多数是以大学为基础的，也有一些是独立的机构，比如建立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些女性问题研究中心，这些中心多以涉及妇女的公共政策作为研究的重点。女性研究中心的成立不仅对个人学者的努力给予支持，还使大规模的跨学科研究计划的发展成为可能，它们当中最著名的当数瑞德克利夫学院的邦廷研究所，韦尔斯利学院的女性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的女

性研究中心。在华盛顿，妇女研究与教育研究所（WREI）则发挥着国会妇女问题决策委员会的研究助手作用。以这样一种地位，WREI 就与妇女有关的一些特殊问题在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架起了桥梁，它保持着妇女研究网络和政策中心的经常性联系，一方面促使研究者考虑她们工作的更广泛的含义，特别是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从对妇女影响的角度来考察政策。

1981 年一些政策与研究中心联合起来组成了妇女研究全国委员会（NCRW），以便共享资源和促进协作研究，促进相关课程的发展。委员会当时的计划包括一个数据库项目，以协调改进有关妇女的研究信息的保管和服务，这个项目是由一个综合索引系统和一个计算机化的数据库组成，收集与妇女问题有关的业已发表的、尚未发表的和非正式出版物的书目文献。委员会通过其成员机构联系了 2000 多名学者，它还通过自己的工作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中心的联系。

20 世纪 70 年代及其之后女性研究教学与研究活动的激增，伴随着传播这一新知识的书籍和杂志的数量增长，学术出版物中附带有女性研究的部分已成为寻常之事，探讨妇女角色和经验的论文不断出现在专业刊物上，还有一些专门的女性研究的新刊物出版发行，其中最为知名的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 1975 年开始出版的《征兆》（*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 Society*）；其他刊物还包括：《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性别与社会》（*Gender and Society*）；和《女性研究国际论坛》（*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等等, 在包括女性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中, 这些刊物至今还有着重要影响。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有关妇女的学术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女性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获得合法化资格和争取发展空间的问题, 而是它本身在整个教育课程设置中的地位问题。这时各种各样的教育计划试图把女性研究领域所形成的新知识、新思想与所谓的主流课程进行整合, 以达到启发所有学生 (包括男生和女生) 的目的。这种工作不仅仅是在课程中加入新的材料, 还包括新的观点的引进, 以便挑战学科原有的假设与方法。例如, 在历史学教学与研究中, 女性学者就指出传统历史学中的历史分期和概念标识上所表达出的明显偏见, 美国著名女性历史学家琼·凯利-加多在她的颇具影响的文章中就这一问题写到: “我仅想指出, 如果我们引用傅立叶的名言——妇女的解放是衡量一个时代人类解放的尺度, 我们对所谓进步发展的认识, 如古典的希腊文明、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 将会得到令人震惊的重要评价。对妇女来说, 雅典的所谓进步, 意味着纳妾制和对公民妻子的囚禁; 欧洲的文艺复兴, 意味着使资产阶级的妻子们专事家务, 以及对女巫愈演愈烈的跨阶级的迫害; 法国大革命也明显地把妇女排斥于自由、平等、‘博爱’之外。突然间, 我们以新的双重视角来重新观察这些历史时期, 眼前呈现的是不同的画面。”^① 同样的, 在经济

^① [美] 琼·凯利-加多著, 闵东潮译: “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含义”, 载于王政、杜芳琴主编: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 第 85 页, 三联书店, 北京, 1998。

学领域，女性研究学者观察到男人与妇女在参与社会劳动上的差别，并发现他们对工资变化的反应要比教科书上所讨论的复杂得多。女性研究的学者不仅仅影响着主流学科研究的内容，它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这一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这在以后的有关章节中将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与实践的领域，女性研究在美国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是1981年召开的由美国大学院校协会（AAC）发起的会议，它将美国各大学院校的管理者与女性研究的学者集合在一起，共同考虑新的学术成就对自由教育的传统目标与设想的意义，以及它对课程与机构变化带来的可能性和迫切要求。

二、多样性的发展与生存状况 ——欧洲国家女性研究发展概况

1988~1989年，前欧共体曾发起一个计划，对当时欧共体12个国家的女性研究的情况作一个调查。这是第一个试图获得对欧共体国家女性研究状况总体认识的计划，它的重要目的还包括搜集每一个国家的相关数据，以便为欧洲女性研究数据库的建立奠定基础。调查结果显示，正如计划事先所预料的那样，女性研究在不同国家中，其形式、发展和所获得的支持也是不同的。

首先看一看英国的情况。英国有着长期的妇女运动的传统，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它与美国的联系与交流也更为便利和紧密，因此在欧洲，英国的女性研究一

直处于前沿地位。与美国略有不同，在英国，最初的女性研究课程不是建立在大学中，而是在高等学府之外，通过由 20 世纪 60～70 年代妇女运动高潮中产生的妇女社会主义活动，成人教育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妇女研究活动而开展起来的。当时由妇女运动而形成的一些妇女小组经常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与妇女有关的问题，参加者有一些学术界的女性，更多的则是地方社区的代表，她们讨论的有些问题后来直接成为大学中女性研究课程的主题。类似的小组活动逐渐演变为工人教育协会（WEA）的各个地方分支机构中女性研究课程的出现，1976 年，曼彻斯特一个成人教育机构主持了第一次全国女性研究大会，到 1977 年，英国工人教育协会已经管理着遍布全国、为数众多的女性主义课程，并因此而创立了定期的《女性研究通讯》（*Women Studies Newsletter*），以便与众多的参加者保持联系，可见成人教育在女性研究课程发展中的地位。

9

在成人教育机构开设女性研究课程（1968～1969 年）的几年之后，英国高等学府中的女性研究课程才得以确立。因为女性学者在大学中地位相对较低，因此这一课程的开设颇费周折。女性研究学者吉尔·柯卡普曾经描述当时的课程设计小组为这一课程的开设所确定的策略和理由，^① 其中包括：要充分说明需要建立独立的女性研究课程，要使课程成为跨学科的，同时可以对每个学科产生影

① Kirkup, Gill, 1983, "Women's Studies 'at a Distance': The New Open University Course", 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No.6, p.278.

响并补充准确的信息，教学方式要尊重个人经验，还包括不依赖于传统学术模式的评价方法。在这些学者的不懈努力下，1973年，兰开斯特大学设立女性研究课程，这是首批女性研究的大学课程之一。此后，到80年代初期，在几所大学和综合性工科学校中又开设了与女性研究相关的硕士一级的研究生课程，1980年肯特大学颁发了第一个女性研究的硕士学位。1989年夏，约克大学的一名学生成为英国第一位女性研究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同时，肯特大学、兰开斯特大学、约克大学等大学和学院，相继成立了10所女性研究中心。此外，大学一级的女性研究教学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开始出现，到80年代末全面展开。随着教学与研究基地的增多，女性研究的出版物，包括专业期刊和系列图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10

为了突破单个学术机构对研究发展的局限，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国家级的女性研究与资源中心成立，它掌握与协调女性研究的进展情况，组织相关的讨论与会议，出版这一领域的论文。1989年3月，为回应广大研究工作者的呼声，英国女性研究网络（Women's Studies Network UK）正式建立，其宗旨是促进女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作为信息交流的渠道，另一方面，它团结广大女性主义学者，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以期获得资源共享的保证，从而使研究工作得以延续。

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女性研究者主要致力于在高等教育和学术领域中开展女性研究，创造自己的学术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日趋完善，女性研究理论本身也得到了

发展。

除英国之外，原欧共体其他国家中女性研究的发展参差不齐，情况不尽相同。女性研究发展得较有声势的国家有荷兰，在这样一个国土面积相当小的国家中就建立有两个主要的女性研究档案馆，大约有 200 名学者从事女性研究，女性研究的课程遍及所有大学。而在意大利，女性研究尚未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谋得一席之地，其主要的研究活动都是在大学之外进行的。比较起来，丹麦的女性研究学者处于最令人羡慕的位置，她们在丹麦所有的 5 所大学之中都设有女性研究中心，研究项目还可获得相应的经费支持。在西班牙，女性研究正在慢慢地被接受和认识，而在一些诸如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科系中，女性教师在她们的教学中已经将女性研究的观点贯穿其中。比利时的情况由于其法语社区和弗莱芒语社区获得资源的情况不同而略显复杂，尽管如此，在这个国家中长期的女性研究项目仍得以确定。在法国，1982 年政府曾拨款支持一个鼓励女性研究的启动计划，在其四个主要城市中都有活跃的女性研究中心存在和活动。在爱尔兰，女性研究在学术界内外都取得了蓬勃发展。前联邦德国的女性研究有着相对稳固的组织基础，它生机勃勃的活动一方面是由于大量妇女的参与，另一方面要归功于它为女性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出版条件。希腊的情况显得较为落后，由于整个教育体系都处于资源不足的状态，所有的研究工作都受到牵连，并且妇女的权利问题在这个国家是一个相对新的问题，因而女性研究者仍然在为确立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而工作。葡萄牙又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尚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

动，因此女性研究也就没什么发展，虽然葡萄牙有一个政府部门负责有关“妇女地位”问题，然而在学术界，女性研究的地位非常低并被认为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卢森堡的情况更为特殊一些，这个国家的学生要在法国、比利时或德国完成其学业，因此它的女性研究在学术与教育领域的发展也必然受到限制。

， 上述国家中女性研究的不同情况与其国家的社会政治环境是紧密联系的。例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处于军事专制时期，它们的妇女解放运动必然无法与其他国家那样获得同时和同等速度的发展，妇女解放问题往往被归入由劳工运动和左派为主导的反抗斗争中，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妇女运动而得到鼓励和推动。其他对女性研究的发展构成明显影响的政治因素还有：双语社区的存在（如比利时），天主教社区和非宗教社区的分裂，在有些国家中妇女缺少获得离婚和避孕的相应权利基础等等。一般来说，女权运动与左翼政党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这种联系较紧密的国家，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反抗斗争的一部分，而另一些女性研究者则可能会否定这种联系。此外，在诸如堕胎、政府提供的托幼设施、影响妇女公民地位和就业的法律方面，前欧共体国家的政策也存在着巨大差别，这些特殊的国家环境都会对女性研究者所提出和面对的问题产生不同的影响。

不同国家中的经济状况对女性研究的发展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前欧共体国家间南北贫富的差别，在这些国家的妇女运动中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影响都是很明显的。而本国政府的态度更是对女性研究能否被接

受、支持，能否与国家教育体系结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丹麦、荷兰与德国的女性学者都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女性研究的广泛支持中获得好处，然而政府的介入又给妇女运动的自主性蒙上阴影，因此，对女性研究来说这永远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难解的结。

三、窥一斑而知全豹 ——荷兰女性研究的个案分析

(一) 女性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

在荷兰，女性研究是一个处于蓬勃发展中的学术领域。1976年格罗宁根大学为妇女研究设置了第一个正式的教授职位，这标志着女性研究在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的女性研究会议已吸引了将近4000名参加者，到1993年，有约300名女学者以及若干男学者参与了有关女性研究的教学或研究工作。到1995年，荷兰各所大学中共为女性研究提供了13个教授职位，此外，一些其他学科中的教授，在从事她们本专业的研究教学中也明显地包含有女性研究的成分。

在学科设置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荷兰的14所大学中有250多种大学生和研究生课程包含有女性研究的内容，其中几所大学设有系统的女性研究的硕士课程，还有一些校际网络为博士生提供有关课程。此外，一个全国的女性研究研究生院经过长期筹划，现已开始运行。

除了大学内的女性研究之外，一些职业学校也提供女

性研究的课程，由政府资助的妇女保健中心和帮助妇女就业的组织也开展相应的教育和研究工作。总之，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较，女性研究在荷兰获得了相当深入的发展和较大程度的制度化。

大学中的女性研究是与妇女运动紧密相关的。当代荷兰的女性研究同样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第二次妇女运动的高潮，这一运动旨在改变当时流行于荷兰社会的僵化的性别关系。1968年成立的“男性、女性、社会行动小组”是这一运动中的主要妇女组织。

当时流行于荷兰社会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第一次妇女权利运动所提出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目标已经实现，因此新的妇女组织不得不首先证明这一解放的过程并没有完成，第一次妇女运动所赢得的平等的权利并未给妇女提供平等的机会。“男性、女性、社会行动小组”的主要宗旨就是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机会、平等的发展权和自主权，并要求打破妇女的传统角色模式，为妇女创造拥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社会秩序。作为对这些妇女运动组织的响应，同时为给源出于妇女运动的见解与主张提供理论基础，1974年第一批社会主义女性研究小组成立，这是知识女性进入女性研究的开端，此后它逐渐地渗入荷兰的各个大学和学术领域。

女性研究在荷兰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4~1977年。这个时期各种妇女小组在学术机构中纷纷成立，而历史系和社会科学系的学生首先将妇女运动提出的问题介绍到学术界。这些问题包括：我们对妇女的生活究竟了解多少？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是由哪些社

会结构和历史过程造成的？性别之间权利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因此，女性研究渗入学术领域的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对流行理论中固有的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探索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从1977~1981年为荷兰女性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期间，对传统学科中性别歧视的批判已不再是焦点问题，女性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对研究方法和女性研究的学科边界问题的探讨。女性研究对妇女解放运动作出过贡献，但是妇女解放运动对女性研究的要求是什么并不清楚，什么应该放在第一位，是政治斗争还是学术研究？女性是应该改造这个世界以便认识它，抑或在改造它之前首先认识它，这成为女性学者争论的中心问题，她们试图解析这一认识与改造的衔接问题，以作为她们思想体系的构架。

15

第三个阶段是从1981~1985年，在这个时期，女性研究的内容与主题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妇女受压迫这一主题进行阐明和澄清。压迫理论的整体性质使它在分析复杂多样的日常生活时力不从心，并难以作为解释男女之间多种形式的关系的基础，不利于进行深入的科学探讨。与此同时，女性研究开始向制度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第四个阶段始于1986年。女性研究在这一阶段开始巩固自己的领域，女性学者们试图为自己的学术成就打上特别的烙印，并在制度上和组织上成为一个正规的学术分支。女性研究不再首先听凭于学术界之外力量的评判，而是认识到自己在现有学科中的创新作用，或者说女性研究

在这一时期已经学科化。

（二）主要的学术批判与理论论争

荷兰女性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争论和对传统学科的批判具有它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也可从中看到整个西方女性研究理论发展的脉络。

对性别歧视的批判

在女性研究向学术领域发展的初期，对传统学术界中性别歧视的批判成为她们的主要任务。当时性别歧视在各个学科中有着不同形式的表现，除了明确地将妇女排除在研究课题之外，还有许多十分微妙的表现途径。例如，在一些相关学科中，“劳动”一词即是指有酬的专业工作，而妇女所从事的无酬的家务劳动则被忽视或被遗忘。

荷兰女性研究学者对性别歧视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首先，在学术界有关“人”的讨论中，妇女的实际存在被忽视，学术理论从未将性别之间存在的差别作为研究中的一个因素对待。对妇女的传统印象还包括，让妇女总是以母亲或妻子的形象出现在画面和传媒中，即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中，而不是作为独立的人而存在。女性研究学者在这一点上提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是具体的男人和女人。第二，有关妇女家务劳动的研究和对其性生活的研究，只是当时家政学和性科学的研究课题，而且仅仅是从现有的有关性差别的思想观念出发进行研究，而女性学者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构成一个特定学科的重要领域。第三，研究妇女问题的角度，她们认为应将妇女作为与男性同等的独立的客体进行

研究，而不是将她们视为从男性范畴中划分出来的，相对于男性的“他人”来研究。

对妇女地位的考察

妇女在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种地位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必然关注的问题，由女大学生和部分女教师所组成的研究小组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初的探讨。她们运用生物学观点中的“性别”（sex）和表示人的历史与文化构成的社会“性别”（gender）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阐明妇女的位置，使用这一方法，她们有可能在社会结构基础上分析男女之间的差别。

对妇女之所以受压迫的分析，首先集中于社会中劳动的性别分工问题上，最初的劳动的性别分工——男人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妇女则是家庭的主妇——被视为造成性别不平等的最重要原因。从这一观点出发，诸如家庭、家务劳动以及妇女在劳动市场中的位置，这些学术专题得到重新的观察与思考。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为研究妇女受压迫问题和妇女解放的战略提供了有效的观察手段。

在对妇女地位的考察中，女性研究学者们还频繁地运用社会化理论，来认识妇女的传统角色世代相传的途径与原因。例如，家庭中最初的社会化过程被视为劳动分工再次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教育系统和传媒体系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被高度关注的研究课题。与此同时，妇女运动的实践经验使女性学者认识到，单纯依靠经济因素的分析，不可能对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作出全面的解释，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父权制、社会的传统结

构也是决定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这一观点将妇女地位研究的重点从“经济—政治”引向了“身体—政治”，强调男女两性的直接关系，人体与性欲被引申为政治实践的目标。当时对异性恋和同性恋的讨论对这一转变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女性学者认为，异性性行为也是造成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果她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妇女，她就必须与一个男人有关系，并理所当然地照料他或他们的孩子。围绕着异性恋规范的复杂社会惯例便由此诱使妇女进入了第二等级的地位，而男人则充任着重要的角色。不管这类观点正确与否，讨论本身给予女性学者很大启发，她们开始挖掘妇女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结构，以及隐藏在婚姻、家庭、工作和社会服务等范畴中的权力关系，作为这些探索的结果，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便以学术的方式表现出来。

关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争论

荷兰女性研究的学者认为，要打破传统的性别歧视，首要的任务便是揭示妇女生活的现实，其中对妇女生活的重新观察以及她们自身的第一手经验，是研究者认识妇女过去与现在经历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妇女的经验在这里成为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为了防止这些经验被一些彼此独立的学科搞得支离破碎，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根本途径，这一观点受到多数女性学者的认同。但是，在有关女性研究的地位与目的的认识上，女性学者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分歧。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荷兰女性研究领域的辩论集中于以下问题：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基于经验的知识与理论概念的联系以及适宜的研究方法。

一些女性研究学者对学术成就的“客观性”进行批判，她们认为理性知识不是天然形成的，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学术成就、学科知识的合理性是由相关的社会所规定的。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认为，脱离了价值判断的学术成就，结果往往是加强了现存的社会权力关系，理论的见解应有助于社会变革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确立战略的先决条件。她们提出女性研究应该与妇女运动的总体目标和战略需要联系起来，研究者应该认识到她自身也是一个研究的客体，研究应促进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觉悟的提高，研究的结果应该直接有益于被研究的妇女。

但是，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能接受将妇女运动的需要置于女性研究首位的观点。1980年，A. 布莱希等三位学者在她们的“颂扬理性”一文中，便阐述了她们要求恢复学术客观性的观点。“如果你想要改造世界，你必须了解世界”。^①她们认为学术成就首先是在论证基础上的知识生产，并往往带有政治色彩，但学术介入阶段要独立于政治，并同一般的学术实践相同，应该尽可能地客观。更多的女性学者则选择一种中间的立场，她们对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给予相同的重视，并强调不同研究角度的互补性。

在这段时间的辩论中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研究结果的期望分配。女性学者普遍认为，研究结果应该比一个单一研究小组的直接目标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其中一些结

^① Bleich, A., Jansz, U. and Leydesdorff, S., "In Praise of Reason", 转引自 Brouns, Margo, 1990,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tudies—A Re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p.18, Gravenhage, STEO.

论可以直接用于对政府或社会机制施加压力。

阐明妇女受压迫的假说

尽管在荷兰女性研究的发展中产生过各种各样的争论，“妇女受压迫的地位”却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不过这一提法的科学性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受到了首次挑战。

随着女性研究的发展，妇女受压迫的假说在理论上和内容上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这一概念在内容上的局限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简化了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概念；二是假定妇女的经验具有一致性。从这一假定出发，妇女的经历只能用“压迫”和“反抗”的概念来解释，男人和妇女之间的关系也被简化为单纯的权力关系，妇女永远充任男性统治的受害者的角色。对这一概念提出质疑的学者认为，妇女的生活是有差异的，社会现实是复杂的，而“妇女受压迫”这一概念过于笼统，不能运用它对妇女经历的差异性以及性别之间的实际权力关系作出判断。妇女地位的研究必然要求对男性的社会地位进行考察，而社会中的性别体系亦不是跨越历史、持久不变的基本条件，而是应该作为历史中的一个特定变量来研究。

虽然仍有些研究者坚持将“压迫”概念作为研究的理论假设，但是，一般来讲，研究分析的主题逐渐转移到了性别之间不对称的关系方面。鉴于社会状况会赋予性别差异以特定的意义，那么男女之间关系的多种形式也会以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作为背景，这种情况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得到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总之，荷兰女性研究领域产生的一些理论争论既具

有其国家和社会结构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女性研究领域从形成以来所出现过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后各章中还将有进一步的描述，这一小节所阐述的内容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为了解西方女性研究的全貌提供一个比较直观和感性的认识。

※ ※ ※

女性研究是西方国家中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的产物，它最先形成于美国，并快速传播到北美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女性研究在各个国家的形成过程、发展特点和理论探讨的重点略有不同，但其研究的指导思想、宗旨和目的却是共同的，都是以女权主义理论为指导，致力于妇女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上面一章大致介绍了西方女性研究在不同国家兴起与发展的情况，并作了个案介绍。以下各章将就女性研究的主题、成果和方法等问题进行具体的评述。

第三章 让沉默者讲话， 为无言者立言

——西方女性研究的内涵与主题

为女性研究领域进行明确的界定是有一定难度的，一方面是因为女性研究的理论与立场中存在着诸多分歧，另一方面，将它和其他主题进行简单的类比有走入误区的危险。尽管如此，许多女性学者仍尝试通过描述与限定女性研究，来说明它存在的必要性，如 D. 斯彭德在她编辑的《修改男性的研究：女性主义对各学科的影响》^①一书中就指出：对女性主义至关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认识妇女一直被系统的知识所遗漏，而在这个知识体系中男性就他们自身进行系统的阐述，而通常使妇女隐而不见或是将其归入异类。妇女作为独立存在的人一直被学术界所忽略，而对这一事实的描述与分析是女性研究所做出的最具重要意义的贡献之一。

① Spender, Dale, 1981, *Men's Studies Modified: The Impact of Feminism on the Academic Disciplines*. Oxford, Pergamon, 转引自 Robinson, Victoria, 1993,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in Richardson, Diane and Robinson, Victoria (ed.)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 Feminist Theory and Practice*, p.2, London, Macmillan.

一、女性研究的内涵以及相关问题

(一) 什么是女性研究

在众多的女性主义学术著作中，女性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女性研究进行定义，这些定义多侧面地反映了女性学者期望通过女性研究所要达到的学术目标和政治目的。

如果要对女性研究做最简单地描述，不妨援引 B. 马多克-琼斯和 J. 科茨在《女性研究入门》一书引言中的论述，她们指出：女性研究首先是对妇女的研究（about women），女性研究在学术界的出现，一个主要动力是工作于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妇女，她们作为女性主义者，认识到有关妇女的学术知识一直受到冷淡，因此女性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妇女。但是这还不够，女性研究还不仅仅是有关妇女的研究，它还是为了妇女的研究（for women），参与女性研究本身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寻找属于妇女的知识有着其政治含义，它通过对公认的传统知识观点提出挑战而推动了变革，它增强妇女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动力量，它赋权于全体妇女，引导她们改变自己，也改变社会。^①

除了这种“关于妇女”和“为了妇女”的直截了当的解释以外，还有这样一些侧重点不同的论述，如：女性研

^① Madoc-Jones, Beryl and Coates, Jennife, 1996, "Introductory", in their (eds.) *An Introduction to Women's Studies*. p.3,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究是对权力关系和性别关系的研究；女性研究与大学高墙外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有关，它通过对学术知识的所谓客观性提出质疑和解构它的假设，来批判传统学科对妇女历史和经验的忽视；还有的学者认为，女性研究是一种致力于变革的教育战略，它有着双重的目标，即揭露对妇女的压迫并改变它；女性研究是妇女运动的知识武器和研究工具，它旨在改变教育的所有领域，包括课程、研究、写作与教学，并为妇女作好变革社会的准备。女性学者指出，对性别体系的系统思考是充分分析和认识当今世界的基本条件，女性研究有着改变所有知识性质的潜力，它将学术的注意力从男性为中心的模式中转移出来，给妇女的观点、经验、需求和兴趣以正当的地位，由此形成新的教与学的基础。

24

在与传统学科的关系方面，女性研究学者指出，不应将女性研究想象成为是将各个学科进行相加，而是一种自觉的论证工作，目的在于证实，现存知识的内容与形式是与社会权力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有关的。女性研究可以改变现存知识中男性中心的弊端，并从妇女的观点看待人类的经验，使妇女获得充分的自主。

（二）女性研究与女性主义理论

什么是女性主义，简单地讲，它是指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力和机会的一种信仰和行动；或者说它是一个社会变革的建议，以及一个力求结束妇女压迫的运动。女性主义者是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的人，这种观点认为，妇女由于她们的性别面遭受歧视，她们的特殊需求仍然被忽视或未予满

足，而为了满足这些特殊需求，需要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中进行激进的变革。

女性主义在英文中是“Feminism”一词，起源于法国，法国社会主义者 Ch. Fourier 曾用它来表达一种有关妇女解放的新观点。^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女性主义”开始在英美等国家流行，最初是用来描述当时的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而这一词汇真正的发扬光大是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自第二次妇女运动的高潮以来，这一词汇被赋予了越来越丰富的含义。

有关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留美学者王政（美国斯坦福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研究学者）在她为《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一书所做的序中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她指出：“Feminism 有别于各种‘主义’，它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连贯的概念组成的一种固定不变的学说，更不是排斥异己、追求占据思想领域中霸权地位的‘真理’，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场所。它历来同时包括理论与实践。”^②

西方女性研究是妇女运动在学术界的延伸，而妇女运动正是在女性主义思想引导下，西方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旨在进行变革的社会运动。因此女性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女性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正是女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女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

① Rowbotham, Sheila, 1992, *Women in Movement: Feminism and Social Action*, p.8, New York, Routledge.

②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 8 页，三联书店，北京，1998。

以看作为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的研究，是具有女性主义观点和立场的女性学者所从事的研究，是女性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同时，女性研究的发展和成果又可以验证和丰富女性主义理论。

（三）女性研究和妇女运动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的妇女运动对女性研究课程在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确立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学术界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这一联系意味着这种课程的设立和教学本身就具有了政治意义，理论分析也和社会变革发生了联系，况且这一分析主要集中于对妇女所受压迫的认识与论述，以及如何改变妇女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地位。

女性研究是妇女运动的一种延伸，是妇女运动的学术武器，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它现在是否完全脱离这一运动了呢？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学者认为，目前即使在意识形态上没有脱离，那至少是在组织上已经脱离了妇女运动。对于这一点曾经有过不少争论。应该指出，女性研究与妇女运动的联系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有所减弱，但是多数女性研究的学者仍坚持那些曾经作为妇女运动中心概念和在形成与发展女性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原则，这些概念与原则包括：姐妹情谊的重要性、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公共范畴与私人范畴的观念、对妇女所受的共同压迫的认识以及女性因种族、民族、性行为方式、阶级、年龄和残疾程度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以及了解妇女历史的重要性和一个女性主义者觉悟发展的直接经

验与观念的重要性。尽管这些原则中的一些内容，如普遍的姐妹情谊、“妇女”作为一个类别的使用、差别与差异过分简单化的观念等，在当今的女性研究中正在引起争论和面临挑战。

（四）女性研究的课程及其与传统学科的关系

女性研究作为一个正规的研究领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美国形成，此后在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相继出现，那些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参加左翼政党和投身于妇女运动的女性学者，首先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背景下建立起女性研究课程，尽管面对不太友善的政治态度和窘迫的经济条件，女性研究或是作为独立的项目，或是作为某一课程的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学科中存在和发展，它还扩展到北美及欧洲的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洲以及阿拉伯国家。尽管许多课程常常面对资金不足、来自其他学者的对立和偏见以及要与现存的体系进行斗争，然而女性学者仍然寻求通过女性研究课程的确立来改变学术传统和妇女的生活。

女性研究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学科的主题与结构进行解构。由于它对传统知识自我标榜的“客观”和“真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倡导经验与理论的结合，因此其学习、教学和研究的方式都有所改变，女性研究的参与者还尝试提出反映女性主义中心与原则的理论与概念。尽管有这样的共识，即科学与技术也应从妇女的生活出发重新进行概念化，然而应该客观地讲，多数女性研究课程与工作仍集中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领域。

女性研究的主导思想是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学科的知识都是无视性别的，它们将男性价值标准与经验作为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予以表现和描述，而女性研究正是要纠正这种偏向。涉及到具体步骤方面，可以以社会学家 P. 艾博特和 C. 华莱士^① 的观点为例，她们指出，在社会学学科中用女性主义观念进行知识的改造需要三个步骤：首先是结合，即将妇女包容进来以弥补现存知识的缺陷；第二步是分离，它需要由妇女来为妇女构筑新的社会学理论；然而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主流社会学仍然可以冷待对妇女的研究，学科本身仍没有被女性主义的学术批判和研究所触及。因此，第三步便是强调知识革命是必要的。她们认为现存的社会学理论是性别歧视的理论，而女性研究实质上是挑战男性主导的研究所产生的假设与概括，而这足以构成对社会学进行彻底变革的理由。其他的女性学者也曾指出，在她们所处的不同的知识框架中，女性研究的学术批判被接受的程度是不同的。同时，现存的知识范型接受女性研究学术批判和学术成就的影响，并对其作出的反应也是不同的，但是，即使是在诸如文化研究和社会学这样的领域中（其中女性研究不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提出了有关妇女及其与文化和社会的关系中隐

① Abbot, Pamela and Wallace, Claire, 1990,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转引自 Robinson, Victoria, 1993,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in Richardson, Diane and Robinson, Victoria, (eds.)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Feminist Theory and Practice*, p.5, London, Macmillan.

而不见的和被冷待的新问题)，涉及主题范围的概念、观点和方法的完全的知识革命还远远没有实现。通常，人们用增加有关妇女的讲座和在研讨会中简略地提及性别关系问题等方式，作为对女性主义观点的象征性接受，然而“性别”、“民族”和“性行为”在作为观察世界和分析问题的概念方面，仍不具有“阶级”一词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中所具有的地位。虽然从更积极的意义而言，就算是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在制度化的背景中已经存在了30年，那么它所引起的主流学术思想的某些变化，也仅仅可以说是变革男性学术偏见和学术权利的开始。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妇女置于理论话语的中心，由此产生出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新问题与新方法，但是单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不足以回答和处理这些新的问题，超越理论的界限——多学科、学科间或跨学科的方法，允许从多种不同的知识角度对某个问题或领域进行探讨和考虑，是最适宜于女性研究的。在这里，也有些女性研究学者对是否可能真正存在一种学科间的研究方法持怀疑态度，并指出这种方法对仅接受过单一学科训练的学者的潜在困难。

29

（五）女性研究是否应成为独立的学科

这是女性研究自形成之初就争吵不休的一个问题。曾有人提出过，鉴于需要形成和发展知识以及在传统教育制度中生存，女性研究本身应形成一个学术科系，而另一些女性学者则不希望看到女性研究被一个科系所局限，而宁愿将其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学术界中的一些非女性主义

学者认为，女性研究尚不足以成为一个有明显特征的合法的主题领域，然而教授女性研究课程的学者，和选修女性研究课程的大学生、研究生或博士生则持相反的看法，她们以自己学习与研究的成就为女性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

女性研究始于弥补缺陷和为无言者立言，为没有从女性研究角度系统阐述知识的学科中补充进妇女问题。虽然这一“增加”的观点是不充分的，然而它对于发展自主的女性研究却是必要的，这个自主的女性研究强调在女性主义基础上发展理论和方法论，强调对于限定知识与实践的男性权利要有所认识，这不仅仅是在家长制的拼板中加进新的一片，而实际上，女性研究在个人和结构层次上发起了一场个人的、教育的和政治的革命。

二、女性研究的参与者——教师和学生

一般而言，参与女性研究课程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是女性教师和女性学生，这首先是由于女性研究本身的目的与特点所决定的，即使有个别男性学生加入进来，他们的主要动机或是出于好奇，或是希望以此课程来开阔思路，将其作为一种选择而已。

西方女性研究在其各级各类的教育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由于这种妇女集体的力量，使个人的经验，特别是妇女个人受压迫的经历能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并进而形成一种压迫与斗争的集体的观念。女性学者将这一研究看作既令人振奋又使人痛苦，既具有启发性而同时又令人

困窘的过程。那么是些什么样的教师与学者投身于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她们在这里寻找和获得了哪些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答案与启迪呢？

长期以来妇女总是被排除在教育之外，这里有思想意识的原因，也有实践方面的原因，比如托幼设施的缺乏等等。然而就知识的角度而言，其教育主题与妇女的经验和生活经历无关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传统的学科研究思想始终是“关于妇女”的（如果它不得已涉及到妇女时），而不是“为了妇女”的，它一直停留在从男性角度对妇女进行简单地描述这一层次上，而女性研究正是要矫正这一传统。女性学者认为，妇女作为工作者、母亲和生活照料者的经历不应被置于课堂之外，与所谓严肃的理论化工作相脱节，因此学习应与妇女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们的性生活和情感生活相联系。

女性研究课程最初的参与者有着较强的政治意识，她们来自不同的种族、阶级、民族、国家、年龄层，有不同的性生活方式的偏爱，她们中一些人与妇女运动及某个派别的女性主义观点有联系，也有些人并不将自己看作或定义为女性主义者，然而在谈到她们参与女性研究课程的理由时，她们无一例外地指出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和妇女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资历。她们中有的人已经有了较高的学历，然而在此之前的教育中，她们感受不到与她们生活直接相关的东西。尽管有些人对女性研究的学生以及教员抱有成见，然而正是女性研究的课堂为具有不同观点的妇女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她们对比妇女生活的差别，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进行创造性的探讨。

随着女性研究在教育体制中不断地向主流渗入，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学生开始像选择其他课程一样选择女性研究，而不是将它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行为和探索方法。这种趋势可能会造成一种局面，即在女性研究课程中，自觉的女性主义者会成为少数，女性主义者所坚持的一些政治观念也会变得模糊不清。学生对这一课程的选择可能会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并从这一经历中企盼不同的东西。她们或是有着根本的政治理由，而并非对女性主义好奇；或是为了一纸文凭，藉此反对工作中的性别歧视；或是对这一课程感兴趣并将其作为一种知识实践活动；一些学生利用课程以提高觉悟，而另一些则将它作为对妇女地位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机会。有些学生在一开始可能对女性主义观点抱有敌对情绪，然而在课程结束时，她们会认同这一观点。一般来讲，学生通过女性研究会找到新的自信并更长于表述，她们可以从女性主义角度对自身的角色和周围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对自己的自我知觉和价值准则产生根本的影响。在女性研究的课堂上，教师出于自身的局限，也可能会带来自身对若干问题的具有个人色彩的态度，如反对同性恋和种族歧视的态度，以及作出一些不恰当的假设，因此，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需要承认问题的存在和探讨它们的潜能。女性研究的课堂上会充满不同的情绪与感受，伤害、愤怒、热情和意外，这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中的不曾有过的，女学生感到她们可以用在传统学科中难以想象的方式提出要求、宣泄感情和揭示问题，这对学生的学术发展定会更有裨益。

女性研究的教师是从不同的学术道路到达她们今天所处的地位的，她们通常面对着一方面在本学科教学，而同时又要在知识与实践意义上推动女性研究发展的双重重担。从事较高层次的女性研究课程工作的女性教师，很乐于将自己看作女性研究的学者，而不是对女性主义理论有特殊兴趣的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而那些短期的或兼职的教师，介入教学决策和获得研究资源的机会十分有限，她们对于参与这一既无地位又难于获得支持的领域则犹豫不决。与学生一样，教师的社会背景也是不同的，她们也要与自己的或他人的歧视与偏见作斗争，因此，教师的个人身份，体制的束缚，以及与学生经历的相互作用，都为女性研究的课堂带来了活力。

虽然女性研究在学术领域中显得十分激进，但妇女运动中的一些活动者却指出，在女性研究逐渐获得制度的支持后，从事女性研究的教师们，在其政治观点和她们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联系方面看来，已变得不那么激进了，她们已被男性统治的等级制所收买，被要求屈服于父权制的正统观念，并被视为具有野心和追求名利的人。对于妇女运动而言，她们仅仅是一些象征性的女性主义者。这种说法虽然过于偏激，然而它代表了一部分女性主义者对于妇女运动向学术界延伸的两难心理。同时，也有必要认识到学术界中“脸面”的问题（即追求理性的威望，希望得到男性学者的接受与承认等）必然要影响到一部分女性学者的政治原则，使她们对在制度中生存仍然需要的政治活力有所忽视。

三、与传统学科有明显区别的女性研究教学方法

简单地讲，女性研究是从女性主义观点出发，在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领域中开展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活动。如果从女性主义观点出发的教育意味着对课程表的激进变革，那么同时对教与学的方法进行反思和变革也是必要的。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女性研究的课程确立之时，女性研究的教学方法就被提到了日程中。例如，1983年美国女性研究学者G. 鲍尔斯与R.D. 克莱因在她们编著的《女性研究理论》^①一书中就收有数篇论及女性研究方法论的文章，其中“学习女性研究”和“如何做我们想做的：有关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思考”中都涉及了女性研究中的教与学的问题。

鉴于女性研究要尽可能全面和综合地考察妇女的经验，并揭示它们的相同与差异，因此，从理想的角度而言，女性研究的课堂应创造一种气氛与环境，在这里学生要学会运用女性主义的原则来分析问题，学会倾听和尊重别人，学习使自己发展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学者。然而要排除每个人所固有的偏见，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执，改变以前教育实践所形成的定势，协调教师与学生在期望方面的差异，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工作。

讲授女性研究的课程同样是一种挑战。教师是无所不

^① Bowles, Gloria and Klein, Renate Duelli (eds.), 1983,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知的专家，他们将智慧的明珠撒向人间，这种观念早已受到批判。女性研究的课堂应该是民主的、合作的、从经验出发的，既有认知方面的学习也有情感方面的学习，赋予学生个人创造和变革社会的能力。英国女性研究和社会史学者 C. 卢贝尔斯卡在她的“女性研究教学方法：挑战主流”^①一文中对女性研究的教学提出了若干建议，她的建议比较全面地代表了女性研究教学方法与传统方法的区别，反映了女性研究对教学法的特殊要求。这些建议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女性研究要求一个激励与合作的学习环境，在允许的情况下它应该包括一些学生小组，最好是有一名以上的教师参加。要尽可能多地组织研讨会和以课题为基础的活动，而将讲课限制在最低限度，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受到资源、制度和学生期望的限制，但是至少应尽可能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二，在探索妇女的经验时，教师与学生需要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证据，在关注妇女经历的前提下重新对一些资料进行评价。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发现，学术界中的“不予考虑”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将这些材料从记录中排除掉的。鉴于这些材料中包括有关妇女屈从地位的例证，学生可以明白为什么妇女不存在于主流之中，以及这些例证在妇女所受压迫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如何从怀孕期和分娩的经验描述去揭示知识与权力的父权制结构，以及父

^① Lubelska, C. , 1991, "Teaching Methods in Women's Studies: Challenging the Mainstream". in Aaron, Jane and Walby, Sylvia (eds.), *Out of the Margins*. p.45, London, Falme Press.

权制怎样使妇女保持沉默、控制她们的身体和她们生活的方式。除了关注传统上被忽视的资料以外，教学中还应该从以妇女为中心的观点出发对传统的材料进行重新考察。例如，可以从妇女的经历和女性主义理论出发，对涉及性骚扰、同工同酬、精神健康、身体和性虐待、或色情描写等问题的政府社会政策、法律和传媒进行跨学科的分析，分析结果将有助于形成对压迫妇女的结构、过程和思想体系的深入认识，并提出对其进行挑战的战略。

第三，女性研究要探索适宜的方法论，在这方面应富于冒险精神。女性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应可揭示妇女的经验，因此，需要对已有的方法进行选择、评价和重新定义。而对学生而言，掌握研究方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体验和运用这些方法，作为未来的研究者，学生在其研究实践中的第一手材料可以丰富资料来源，教师和学生可以对这些材料进行评价、分享和学习。在这种背景下，教师与学生、专家与初学者之间的分界不再是分明的，此前教学环境中的一些习以为常的规定与特点也受到怀疑。

第四，女性研究课程的教师多数来自其他专业，有些仍担负其他科系的教学任务，她们参与女性研究或多或少地受到自身学科的影响。一方面她们乐于在女性研究工作中应用这些学科的观点，另一方面女性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也要求更多的新鲜观点与方法的介入。女性研究的课程设计由来自各个学科的女性学者共同进行，而且通过共同教学使教员熟悉更多的学科知识，通过主题研讨会吸引来自多个学科的妇女共同探讨一些介于学科间的问题。

第五，女性研究的评价方法应该反映学生们所处的学

习环境。假如这一课程强调共享资源、课程合作、学生研究、每个学生技能和经验的价值，那么就需要探讨评价它们的适宜的方法。合作完成的作业和论文、同辈群体的活动、口头的和持续地评价，这些方法与传统考试和个人论文相比，可能是检验女性研究目标成就的更适宜的方法。女性研究的教师还应对她们所要进行评价的对象有清楚的认识，因为，学习女性研究课程只是一个可能永远不会结束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对有些学生而言，这种学习还是一种个人色彩极为浓厚的经验，教师有必要给她们尽可能多的余地，以便她们设计自己的课题和作业，通过灵活的作业形式鼓励她们明确表达自己对知识的理解 and 自我发展。

最后一点，女性研究的教师应该使自己和学生一样成为学习过程中的一名参与者。教师应明确下述原则，即：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并很可能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乐于试验新的方法，我们就必须根据新的发现而随时改变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的学生被鼓励去参与试验并提供她们的经验，那么我们就应准备向她们学习；如果这样做，将会有助于赋予学生知识并扩大我们自身经验知识的界限。

以上有关教学方法的观点可以说是卢贝尔斯卡对女性研究教学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总结，它既揭示了女性研究教学的特殊性，也为传统学科的教学方法提供了比较和借鉴。

※ ※ ※

总之，女性研究既是女性主义批判和女性主义学术的同义词，也是致力于推进这一学术的诸多组织的代名词，

这些组织包括大学中的系、研究中心、专业组织、杂志、出版物、会议及其他学术单位。女性研究常常被称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学术武器”，不管是在传统教育机构之内，还是之外，女性研究领域都被视为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的“安全空间”，有利于参加者的个人成长和学术发展，并在总体上挑战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女性研究的中心任务是探索和传授有关妇女的知识，结束各级教育领域中的性别歧视，将女性主义行动与女性主义思想相结合。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女性研究扩大着自己的学者和学生队伍，形成了自身的教学特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研究和实践领域。

第三章 赋予灰色的理论 以生命的活力

——女性研究的理论发展

女性研究是一个与妇女运动相联系的（尽管女性学者对这一联系的概念与理解有所不同）、不断发展变化和富有生气的、包含多种政治立场与目标的研究领域，它还是一种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活动的政治行为，那么应以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这种研究，这一直是西方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们所探讨的重要问题。

在女性研究确立自己的理论时，她们必须面对的是妇女与理论的独特关系，这种关系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对有些妇女来说，理论与自己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它是男性的专属；另一些妇女则对理论抱有敌意，因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一直被用来压制妇女；此外，少数具有精英教育背景的妇女所从事的理论化工作又是广大妇女所不可企及的。然而理论对于妇女研究来讲又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会随着女性研究知识的形成与发展面发生变化。女性研究的理论必须结合客观事实和主观感觉两个方面，以便更为全面地揭示妇女的经验。不仅如此，这一理论必须有助于行动，即用以妇女为中心的理论来促成变革

战略的形成。显然，这样一种理论的概念与学术界理论的标准定义是相去甚远的。

女性主义学术成就最初的宣言之一就是，以往有关妇女的理论是有偏见的。而作为女性研究的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也必然有其立场的偏向，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女性学者D. 斯彭德就在她的“对理论化的理论说明”^①一文中指出，应该认识并接受所有“真理”——其中也包括女性主义真理——的相对性，所有的意义都有武断的性质，女性研究的理论也总是处于变化中，因此我们必须容忍其中的矛盾，我们必须期待其他妇女的其他理论的合法化。

尽管女性学者在女性研究的总目标上有着基本的共识，但在涉及具体的理论问题时，女性研究内部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息过。在女性研究内部有这样两种观点，一种主张积极地解读理论，将它看作富有生气的，并可运用它来挑战现存的学术知识和学术实践的形式；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理论往好里说也是干瘪的、乏味的和与妇女不相干的；往坏里讲，它浸透了父权制的传统，染指理论无异于对妇女进行压迫的同谋和共犯。

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经常展开争论，前者通常批评后者对理论的拒斥，指出女性研究需要发展精确的分析和对妇女所受压迫进行说明，而不应仅仅局限在教育机构之外进行一些旨在提高觉悟的讨论。她们还指出，如果我们作

① Spender, Dale, 1983, "Theorising about Theorising", in Bowles, G. and Klein, R.D. (eds.)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p.27,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为女性研究领域的学者而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我们将仍然被现存的父权制的知识形式定义，被局限于自然或家庭的领域中，或是男性追求的性对象。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持第二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前者过分沉湎于理论，而这将会在学术女性和普通妇女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她们认为，与其提出若干假设和一般化的主张，不如从事有关妇女生活的研究，这才是向妇女所受的压迫提出挑战，才是与改善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直接相关的工作。

这种两边倒的分歧显得是老一套，但它的确是女性研究中的一种现象，有关理论的对立态度是女性研究与妇女运动、与女性主义政治的关系中存在的广泛分歧的一部分。女性主义理论与其他一些理论不同，它与政治运动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在这种运动中妇女经验通常是激进的行动主义和寻求变革力量的基础，鉴于对这种个人经验的偏重，理论的作用在女性研究中必然成为有争议的主题。

尽管对理论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既然是一个研究领域，女性研究学者就必然与理论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正如王政在她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尽管绝大部分女性主义学者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但是她们是在女性主义理论争辩的刺激下思考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以自己的学术成果来丰富和拓宽女性主义理论。……若没有广泛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就不可能有女性主义理论变化多端的发展；同样，若没有理论上的探究和交锋，学者们的思维便难以活跃，视野也难以开阔，要创造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

是难以想象的。^①

“女性主义理论”一词通常指一个知识主体，它要对性别概念和性别差别的含义进行哲学的分析，对妇女的从属地位进行批判性的解释。所谓批判性的解释，是指它不寻求加强这一地位或是使其合法化，而是要挑战它、揭露它和动摇它。这一知识主体还倾向于超越单纯的描述或就事论事，而是运用类别分析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以及从个案升华到一定程度的概括。依据《女性研究百科全书》，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任务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对性别是由生物学直接决定的主张进行批判地评价；第二，探讨性别歧视的假设是怎样曲解性别的意义，并由此埋没或低估妇女的经验；第三，对科学的真理性提出挑战，同时指出人文学科的理论基础是性别歧视的；第四，提出选择性的、范围更广的认识论框架。^②

要对女性主义理论有更具体的认识可以有几个途径。其一是阅读有关的著作，几代女性主义学者通过她们的著述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包括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1792年）和英国杰出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年），以及法国杰出的存在主义女权作家和学问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年）等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另一个可

①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6页，三联书店，北京，1998。

② Tierney, Helen (ed.), 1991, *Women's Studies Encyclopedia*, VII, p.139,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供选择的途径是通过对具有不同立场的女性主义思想的了解来认识。代表这些不同立场的是几个主要的女性主义思想流派，如激进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自由的女性主义，还有此后出现的如生态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等等。简略地讲，三个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流派的主要特点是：激进女性主义将重点放在男性对妇女行为和生育行为的控制上，视男人为妇女受压迫负有责任的群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妇女所受压迫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联系起来，将妇女的有酬与无酬的劳动与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自由的女性主义之理论根基主要是个人权利、公正和自由的启蒙思想，认为妇女只要被给予平等的民权、教育和就业机会，就可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发展和地位，因此她们主张通过法律和教育的途径来改变社会的不公正。

这一对理论认识的途径也有其不便利和局限性，首先它排斥了许多不具有这些明显特征的女性主义思想；其次它将女性学者和思想家都归为一类，却忽视了她们学术思想与成果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一点在以后有关女性主义思想发展趋势的论述中还将涉及到。因此除上述两条途径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对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中最有争议的问题的了解，来对这一理论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以下就对女性研究理论发展中几个突出的理论争论问题作一个大概的介绍：

一、女性主义理论中有关父权制的讨论

女性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探索妇女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并指出怎样对性别不平等进行挑战和进行政治方面的变革。无数学术界的女性学者在她们的文章和著作中谈到妇女的被排斥、被冷待以及妇女的精神和劳作之苦，她们一直在寻找妇女受压迫的元凶。女性主义学者对此有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同样也因为这些不同的解释而在女性研究领域引起广泛的争论，父权制就处于这一争论的中心。

父权制的概念最初是用来描述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的权力，它在新妇女运动中作为一个斗争的概念被重新挖掘出来，因为运动需要一个术语对影响妇女的压迫和剥削关系、及其制度特征进行总体的表述。对于多数女性学者来说，父权制一词为研究妇女受压迫问题和分析这一压迫的系统组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化概念，它还为社会中男性为主导的性质提供了概念形式。

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父权制从未以简单一致的方式被使用，对它的定义不一而足，且具有不同的强调点。K. 米利特在她的《性的政治》^①一书中对父权制的论述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的任何文明一样，是一个父权制的社会。只要稍稍回想一下，军事、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和财政，一句话，这个社

^① Millett, Kate, 1970, *Sexual Politics*, p.25, London, Abacus.

会所有通向权力的途径，包括警察当局的强制权力，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事实也就不言自明了，……如果一个社会以父权制做为制度基础，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就由人口的另一半的男性所控制。

就像父权制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一样，女性研究学者在运用这一词汇来分析妇女的压迫时，其用意也有所不同，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历史的、唯物的和心理分析的。首先，将父权制一词用于历史分析的女性学者主要有 G. 勒纳、M. 米斯、K. 米利特、K. 扬、O. 哈里斯和 M. 戴利。尽管方式不同，然而她们全都对男性占主导制度的形成历史感兴趣，追溯和研究这一制度的起源和出现的背景。依据 M. 米斯^①的论述，与“性别不平等是天然”的这一观点相反，父权制一词意味着妇女与男子之间不平等的特殊形式的历史构成。也有女性学者不接受对这种男性主导的解释，她们寻求通过与以前更平等的社会，甚至母系社会的对比，来解释父权制社会的形成。

对父权制起源的探索引导许多女性研究学者重温恩格斯的著作，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妇女失去权力是由于生产（工具、食物和用于交换的商品的生产）的重要性超过了繁殖的重要性这一历史变化。除此以外，女性学者认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比如，为什么是男子，而不是妇女应该首先从生产领域的剩余商品中获得好处，妇女对人

① Mies, Maria, 1986,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p.38, London, Zed Books.

类繁殖所负有责任的理由是否过于简单等等。然而不管怎样，恩格斯的著作和女性研究学者们提出的问题，对父权制形成的历史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坚持这一探索的学者认为，如果不了解造成妇女的从属地位的原因，那么也就谈不上改变这种地位。

第二，在唯物主义框架中探讨父权制问题，与前面谈到的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只是这一探讨更偏重于通过男人和妇女在社会中的不同活动，来详尽解释父权制的运作。这部分女性学者频繁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对话，并就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争论，如社会学家 H. 哈特曼和 Z. 艾森斯坦^①在她们的文章和著作中，就曾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怎样使妇女所受的压迫不断延续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过讨论。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 C. 德尔菲的著作^②，她的一个很有影响的论断是，有一个独立存在的父权制控制体系，这个体系限定着妇女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她对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性学者的工作提出异议，认为她们只是关注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不平等所导致的对妇女的压迫。德尔菲提出一个“在理论上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父权制模式。德尔菲在分析中仍然强调劳动和生产方式，保留了马

① Hartmann, Heidi, 1979,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in Eisenstein, Zillah R.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② Delphy, Christine, 著有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1984, London, Hutchinson) 等一系列文章和论著。

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但她将其应用于分析家庭中丈夫对妻子劳动力的剥削。在德尔菲看来，存在着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工业的生产方式，属资本主义剥削的范畴；另一种是家庭生产方式，其中妇女的劳动力被男性所剥削，男人从妇女所提供的各种家庭服务、不要报酬的照料子女，以及一些日用品和交换商品的生产中获益，正是男人对妇女在家庭中的繁育和生产活动的剥削，构成了妇女所受压迫的重要形式，因此父权制的剥削被看作是对妇女的共同的、特别的和主要的压迫。

对德尔菲提出的这一模式许多女性学者持不同看法，她们指出其中的问题，包括错误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根据对法国农民家庭的概括来解释父权制理论，将婚姻降位于一种劳动合同，而忽略了在妇女婚姻决定中爱情所起的作用等等。尽管如此，德尔菲的著作仍对女性主义有关父权制的争论具有重要影响，并有其独到之处。

另一个对这一争论有影响的人物是S. 沃尔比^①，她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父权制的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六种父权制社会的结构，即就业、家庭生产、国家、性生活、暴力和文化。她的这一分析暴露出更大的局限性，也引起了女性学者的更多争议。然而其中成功的一点是没有陷入过于一般化的父权制理论的局限，提出了特殊时期和特殊形式的父权制模式。

第三，在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理论的重建中，女性学者

① Walby, Sylvia, 1986, *Patriarchy at Work: Patriarchal and Capitalist Relations in Employ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Walby, Sylvia, 1990, *Theorising Patriarchy*, Oxford, Blackwell.

也运用和分析了“父权制”这一概念。一些女性学者，如 J. 米切尔、J. 罗斯、J. 塞耶斯、N. 乔多罗和 D. 迪内斯坦^①，她们主张对心理分析进行重新评估，不要对其一概否定或不予考虑。她们认为，心理分析可以通过对无意识的认识来帮助解释父权制的根深蒂固。心理分析理论不是孤立地将父权制看作一系列压迫妇女的社会结构或制度，它还在一种心理的以及社会的层次上分析父权制的运转。

从心理范畴论述父权制的女性主义著作，探讨了在个人身份形成的亲属关系中，社会结构发挥作用的方式。有学者指出，社会中男人之间交换妇女的父权制影响，在个人心理中被复制，使它不仅仅是通过社会化而接受的一种自觉的信念，而且在性别身份的形成中，通过无意识及有意识的过程而内化为社会共有的认同。

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理论的重建工作形成对父权制文化的认识，它还批判了这一理论漠视历史和一般性的倾向。总之，对父权制概念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运用，其目的都还在于说明妇女的从属地位。它们的方式不同，结论也不同，但都

① Mitchell, Juliet, 1974,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Penguin, Harmondsworth.

Rose, Jacqueline, 1982, *Feminine Sexuality: Jacques Lacan and the Ecole Freudienne*, London, Macmillan.

Rose, Jacqueline, 1986, *Sexuality in the Field of Vision*, London, Verso.

Sayers, Janet, 1986, *Sexual Contradictions*, London, Methuen.

Chodorow, Nance,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innerstein, Dorothy, 1977,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Sexual Arrangements and the Human Malais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对父权制是怎样构成的和其中权力关系的形成进行了分析。

二、对普遍论和差异性的讨论

女性主义学者对父权制的讨论同时引发了女性研究中对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即妇女的从属地位存在的普遍程度，妇女是不是在所有社会中都只拥有比男性低得多的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社会中有什么共同的特点？此外，在不同社会中父权制是否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果是，在这些社会中可以超越时空界限而寻找到某些共性吗？

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女性学者们有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普遍论者，她们寻求跨文化的共性；一种是文化相对论者，她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对一种特殊文化而言的文化含义和组织特征，这种分歧在其他的一些女性研究理论的探讨中也同样存在。许多早期的女性主义论著，由于与妇女运动的联系紧密，从团结妇女，启发妇女觉悟的角度出发，一般更强调普遍论的观点，论证所有文化背景中的妇女都比男性的权利少，并从属于类似的父权制的控制形式，这些寻求确立一般性观点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有时也使用跨文化分析得出的证据来证明妇女普遍受压迫的情况。例如，M. 戴利在《妇科学：激进女性主义的元伦理学》^①一书中提到15世纪欧洲

^① Daly, Mary, 1978,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Beacon Press.

的焚烧女巫、中国妇女的裹脚、非洲妇女的割礼和美洲的妇科学等父权制对妇女身体、性行为 and 身体运动进行控制的类似形式，她分析了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文化中的对妇女进行侵害的方式。尽管她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父权制对妇女进行控制形式中的类似之处，但却受到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和一些黑人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人类学家认为不能脱离了特定的文化背景来理解一种文化实践活动；黑人妇女则不同意仅仅是为了证实压迫而将黑人妇女包容进去。在她们看来，单纯地认为只要是妇女就忍受着同样的压迫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有碍于对父权制所拥有的形式和不同压迫手法的认识。

50

有关普遍与特殊的问题不仅仅与看待妇女的从属地位有关，它还是有关妇女反抗父权制控制的争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和19世纪的女性主义思想之间有什么类似之处？今天女性研究者有关色情文学的观点是否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性道德规范的争论有关？妇女是不是始终反抗父权控制？如果是，她们的反抗是不是采取了相同的形式？如果形式不同，是什么特殊的历史力量形成了妇女的反抗？这些问题的讨论，或是证明了妇女地位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持续性，或是凸现出某一时期性别关系特殊构成的历史特点，都为普遍性与差异性的讨论增添了内容，有助于对妇女地位进行纵向的考察。

除了纵向的比较分析所引发的讨论，学者们还将妇女的反抗问题进行了横向的、跨国界的研究，例如，S. 米蒂

在她的《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束缚，全球经济中的妇女》^①一书中强调，由于劳动的性别分工是与国际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妇女集体行动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在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中，妇女都被跨国公司视为廉价劳动力，她们的工作条件恶劣，同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还有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也强调不同社会中妇女地位的相同点，指出另一些女性学者分析中的狭隘性，忽视了妇女反抗的国际范畴。

与这一理论上的争论相关的一个讨论主题涉及妇女之间的异同。早期的女性研究对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概括因其忽视了妇女之间在种族、民族、国家、阶级和性行为偏好方面的差别而受到批判。在这方面，黑人女性主义者是最突出的一支力量，格洛里亚·T和赫尔等人编辑的《所有的妇女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性，但是我们有些人是勇敢的：黑人女性研究》^②则是其代表性的著作。鉴于主流女性主义理论更关注的是白人妇女在社会中的位置，黑人妇女的特殊问题在女性研究中通常受到冷遇，因此，黑人女性学者对现存的女性研究的日程提出挑战，指出在女性主义争论中，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对黑人妇女来说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她们从质疑诸如“繁殖”、“父权”和“家庭”这样一些特定类别的普遍应用，到重新思考有关工作、暴力、性行为和生育的女性主义理论，黑人

① Mitter, Swasti, 1986, *Common Fate, Common Bond, Women in the Global Economy*, London, Pluto Press.

② Hull, G. T., et al. (eds.), 1982, *All the Women Are White, All the Blacks Are Men, But Some of Us Are Brave: Black Women's Studies*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女性主义者的工作对白人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和排他性提出了尖锐批判。

在挑战白人女性主义理论的同时，黑人女性学者还记录她们自己的备受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害的“隐藏的历史”。根据在社会历史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妇女之间的权力差异构成了男女之间权力差异的新的横剖面，这不仅仅是来自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黑人妇女的挑战，还被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提出来。而此前，这些妇女一直是白人女性主义者研究和写作的客体，却没有机会提出和发展她们自己的受压迫理论。

另一个对女性研究有重要含义的政治问题，是妇女在性行为方式选择上的差异。在西方女性研究中，这方面的争论日益增多，女性研究的理论中使用的一些“妇女”的概念，正因为其是异性爱的基础而受到挑战。西方国家的妇女运动为许多女性同性恋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她们不仅仅可以从隐晦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而且可以感受到对自己性行为方式的肯定与积极的态度。甚至一些异性爱的妇女，她们在生理与心理上并无同性恋的需求，但由于与男性关系的复杂难处，也开始寻求建立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并将其看作一种积极的选择。这样，同性爱与异性爱妇女之间的差别，由于二者的划分并不固定而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和政治意义。而且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异性爱女性学者研究异性爱的论著，作为一个主题它主要由同性恋的女性主义学者所提出。在许多女性研究的学术论著中，女性同性恋者的文章日渐增多，她们都毫不隐晦自己女性同性恋者的身份，并站在这一角度对女性主义理论问题进行积极地探索与争论。不管她们的观

点正确与否，她们实际上已经构成为西方女性研究领域一支引人注目的独特的力量。

妇女之间的阶级差别也被引进女性研究，成为对妇女受压迫的普遍性理论进行批判的一个角度。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论化而言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特别是西方已婚妇女，她们的阶级地位往往要根据她们丈夫所从事的工作类型来决定。在这方面，对女性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它的中产阶级的假设，例如，这一理论设想进入有酬工作领域，或是让妇女生活在独立的核心家庭中，就会实现妇女的解放。早期对妇女生活的概括和妇女受压迫的普遍性结论，是顺应妇女运动的政治背景，它需要对妇女生活共性的强调。而目前对妇女之间差别的关注似乎动摇了这一运动的动力基础。同时，这一争论中还包含有更多的复杂问题，并对妇女运动所需的政治和理论活动产生消极的影响。试想，强调差别会进一步将个人的经验放在女性研究的中心地位，可能会引起对于谁有权讲话和为谁讲话问题的紧张与忧虑。对女性研究中一些早期的理论模式的挑战，如对“我们（妇女）”中究竟包括谁的质疑，在某些方面导致某种形式的“身份政治学”的出现，即由于身份的限制没有人可以论及其他人，谁也不能作出超越了个人受压迫经验的分析。同时还会出现一种趋向，即对阶级、种族、民族、国家、性行为和其他妇女身份的考虑，可能会妨碍作出任何有关妇女的概括论断。因此，差异问题是摆在女性研究面前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与其将它视为一种威胁，不如正视它；与其让它造成分离和混乱，不如使它成为一个出发点，多角度、多侧面地分

析妇女的生活状况，为女性研究理论的发展提供契机。

三、对妇女范畴的争论

除了有关妇女之间差别的政治问题之外，在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中也有一个相应的有关妇女类别意义的争论。J. 亨里克斯等人撰写的《变化中的主题》^①和 C. 威登的《女性主义实践和后结构主义理论》^②等论著对于这个问题都有过论述，她们的观点对女性主义的一些研究工作，如对文化表现、性行为和身份认同的分析等有着重要影响。

这一争论与哲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在一些学者的眼里，所有的认同概念都变得不固定了，都处于被怀疑的情况下。由此类推，“妇女”作为一个类别，也就成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具有多重意义的标识，它在女性主义分析中失去了可靠性，而具有了跨越时间、地点和背景的流动性。妇女，作为有着共同的利益，分享集体的身份认同的一个群体突然消失了，这样一来，妇女的集体行动失去了基础，女性主义的分析失去了前提和假设。

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将对认同和主观性的分析置于中心地位。“主观性”一词用在这里并不是它通常所表示

① Henriques, Julian, et al., 1984, *Changing the Subject*, London, Methuen.

② Weedon, Chris,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的感受或感情反应，而是指人们对作为由话语和意识形态所定位的主体自身进行认识的方式。认同和主观性是部分重叠的两个概念，但是认同更多地代表诸如性别、阶级、民族、种族、地区、宗教等等普通的人群，而主观性则是这些社会和文化认同在一个人身上的特定构型。

客观地讲，女性主义理论有着它自身的局限性，特别是它所使用的主体性模式未能回答一些关键性问题，限制了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中一些矛盾和复杂性的认识。比如，为什么妇女“接受”她们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许多女性主义者典型地给出了两种答案，其一是，妇女是被暴力或威胁所强制；其二是，妇女通过社会调节和角色模式而学习接受她们的地位。社会调节曾经成为对妇女受压迫现象之所以长期持续和不断再造的万能解释。根据这一模式，家庭内部和传播媒体对男子气质和女子气质的展示、学校教师和课本中对男女生的合乎性别身份的行为的赞扬，以及对相反行为的惩罚，都使妇女安于她们的从属地位。社会角色理论虽然是对男女差别的生物学解释的最明确挑战，但它仍有若干局限，例如，它不能解释社会中存在的女性气质的诸多形式，不能解释某一妇女生活中的变化，和这一生活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内的变化。而且，如果说所有妇女都顺利地完成社会化过程，进而接受了从属地位，也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妇女的女性主义反抗运动的出现。因此，对差异、变革和反抗的关注引导许多女性研究的学者不满足于这种模式的解释，她们为自己所思考的问题探索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和回答。

有些女性主义者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有关权力、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的理论。这一理论提出了社会运作的更复杂的模式。在后结构主义中，主体性被看作流动的和不断变化的，由此“妇女”类别的使用就被作为本质论而受到批判。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不是制造“妇女”类别的想当然的和固定的意义，而是提出对这一类别的解构，清理混乱交叉的女子气质的不同意义，由此揭示出这一气质由父权制文化所构成的方式，她们指出对“妇女”类别的不加思考的使用，事实上会加强本质主义的信念，即男女之间的差别是特定的和固定的。

丹尼斯·赖利曾在她那非常有影响的论著《我叫那个名字吗？女性主义和“妇女”的范畴》^①中考察了妇女范畴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使用，她反对不分历史时期地使用这一范畴，似乎它在整个历史中都有着相同的意义，她提出一种解构主义的立场，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妇女”类别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广义上的“妇女”经验是不成立的，既不能假设了解这一经验，更不要提分享这一经验。因此赖利提倡在不同历史背景中探讨这一范畴的含义。由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运用，解构了女性主义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中心范畴，因此赖利和其他一些学者提出，应战略性地运用“妇女”类别，但前提是永远突出它的构成性和它的不同的意义。

① Riley, Denise, 1983, *Am I That Name? 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 in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四、社会构造论和本质主义的争论

在众多女性主义研究论著中，“社会构造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这两个术语已经成为对重要的理论倾向和政治分歧的简略表述。这两种观点的明显区别之一，在于它们对性别和性行为的分析。在这里，本质主义求助于那些生物学的、或遗传决定论的、普适性的观点，或是基于天性或本质的观念的解释。而社会构造论所取的观念则否定本质的、固定的或普遍的说法，强调每个人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特殊性。相对于本质论的解释倾向于对现存状态的接受与维持，社会构造论强调变革、不连续性和矛盾。

一般而言，多数女性主义者总是认为自己是站在社会构造论的立场上，和生物学的本质主义相对立。在女性研究领域之外，对男人和妇女在社会中地位差别的最通常的解释是生物学的，常常追溯到妇女的“繁殖能力”，通过将现存的不平等固定在生物学的不能改变的自然事实中，来为不平等进行辩护。正是为了对这种生物学解释提出批判，女性研究学者才寻求以其他方式解释它。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知识为女性主义提供一些方法，使她们有能力去动摇对性别差异的生物学模式的一成不变的解释。相对于生物学的话语，女性主义者提出，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经由某些特别的社会和文化力量所确定的，而这种社会与文化力量是可以被挑战和改变的。

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社会构造论观点逐渐取代生物决

定论的信念体系，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对本质主义问题的争论，已经超出了对性别和性行为的生物决定论的父权制话语的简单否定，渗入到了各种类型的女性主义理论中和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内部争论中。在女性主义学者中，因生物决定论观点而受指责最多的是 S. 费尔斯通，她在其早期著作《性别的辩证法》^①中，认定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人类繁殖的组织，妇女因她们在人类自身再生产活动中所承担的角色而在社会中沦于从属地位；她认为，如果通过技术的运用将生物繁殖进行重新组织，妇女就可以从生物学为她们指定的角色限制中解放出来。费尔斯通受到指责正是因为她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固定在生物学本身，而这恰恰是典型的本质主义的观点。

另一位因完全不同的本质主义形式而受到批评的，是颇具影响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 L. 伊里加雷^②，她的理论特点是在女子性行为（相对于男子性行为模式而言）和妇女身体特征的基础上，重新讨论性差别的意义，她试图以妇女身体的特征来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文化作基础，而正是由于这一方法，使她的理论复归于本质主义的窠臼。

在女性主义理论中，除上述形式的生物本质主义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比如在有关妇女的压迫何以历史地和跨文化地延续的论证中，就可以看到许多本质论思潮的表现。首先受到批判的，是那些强调妇女受压迫普遍存在的

① Firestone, Shulamith, 1971,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London, Jonathan Cape.

② Irigaray, Luce, 1985,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理论家，从她们的立场出发，男性统治的范畴明显地被普遍化，并贯穿于整个历史，没有了历史的与文化的特性，让人感到变革的希望微乎其微。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也受到指责，她们将男性处于统治地位的原因局限在社会体系中的男女差别之上，认定这个社会体系是严格的父权制的，它使妇女除了被动的受害者这一角色以外别无选择，她们的本质论还明显地表现在她们将父权制社会的模式固定化，将所有妇女归于受压迫者，而所有男子都是压迫者，而这种认识问题的思路，使她们难以认识到在这些范畴中差异与变革的可能性。

上面提到的只是女性主义理论中本质主义思想的一些例证，通过仔细地考察和分析，肯定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列举这些不同的例子有两方面的目的，首先，它使我们了解到，“本质主义”一词除了它的生物学含义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意义，第二则表明，“本质主义”的标签本身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社会构造论和本质主义并不是两个僵死的立场，理论家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用其中之一来标榜自己，同时它在理论家的自身立场和别人的指认之间也会造成差异。比如从后结构主义观点看来，许多使用“妇女”类别的马克思主义女性理论家应被归入本质主义范畴，然而这些理论家自己却认为，她们的工作包含更多社会构造论的传统。同样，许多有关父权制的研究，认定自己没有陷入生物决定论的泥淖，而作出了社会构成的解释，也仍然被许多马克思主义女性学者视为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者。因此，一些女性学者认为，所有试图提出政治变革问题的理论都要与某种本质论问题打交道，回避几乎是不可能的，在 20 世

纪 90 年代的女性研究中,更重要的是防止将某些工作机械地归类,而忽视了其中的合理性和可借鉴的东西,并在这种僵硬的两者对立之外,重新构筑一些关键的论题,从而将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引向新的阶段。

※ ※ ※

以上介绍了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关键辩论,这些争论对于了解 20 世纪 70—80 年代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政治活动的历程是十分重要的。随着女性研究在学术领域的发展,女性主义理论必然受到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从而使理论与政治,以及与妇女运动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因此,不少女性研究的学者认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研究究竟应和女性主义政治保持多么紧密的联系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随着女性研究在高等教育中获得发展和不断制度化,它和政治的关系也会日益脱节。随着女性研究学者的工作越来越令人瞩目和逐渐被纳入教学大纲,它可能会成为学术主流的一部分。此外,女性主义行动主义的性质不断变化,也会影响到理论与政治关系,在 90 年代,妇女运动的某些政治形式依然存在,有些则已经萎缩,比如运动和示威。面对新的情况,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寄希望于通过更广泛的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女性研究课程,来使广大妇女了解和接受女性主义思想,虽然这些课程不能取代政治行动的地位,但是在明显缺乏政治选择的情况下,至少可以将女性研究看作女性主义的代表或是表现。同时女性研究课程的激增也可以成为一个适宜的论坛,在这里讨论女性主义理论的作用,讨论有关理论与政治今后不断变化的关系。

第四章 吸收、对抗、 丰富与发展

——女性研究的方法

女性研究是一种全方位的研究实践，是将各种各样的妇女的声音和经验进行收集、分类和考察的工作。它强调主观性与个人经验的价值，它既寻求在某些学科传统中工作的途径，又旨在进行突破这些传统的知识革命。正是由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多重性，女性学者们在有关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等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分歧。

文献研究表明，女性学者有关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这样四个基本问题，即：有没有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如果有，它的构成是怎样的？应该有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吗？以及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曾任美国重要的女性主义社会学杂志《性别与社会》编辑的朱迪思·洛伯曾经评论道：虽然妇女所面对的现实与男性不同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仍怀疑“从事研究的特殊方法——女性主义方法论——是挖掘和认识妇女现实的惟一途径”。^①

^① 转引自 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p.1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些女性研究学者指出，在女性研究和某种研究方法之间不存在特殊的亲和力；另有些学者主张女性研究应运用解释和定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实证与客观的方法，或是对这两种方法的结合给予高度评价。此外还有许多对方法运用的建议，诸如“使用那些可操作的”、“运用你所熟悉的”及“使用可以让人信服的”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女性学者在研究中总是希望寻求或运用与现存方法不同的、有所区别的方法，然而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迄今仍没有人能够作出明确的说明，因此，对于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认知不妨放弃那种对“步骤与过程”的收集和整理，转而倾听从事研究的女性学者的声音并接受她们的差异，传达有关她们实际工作方式的信息似乎更为可行和更有意义。

一、女性学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运用的主要方法

（一）女性研究中访谈方法的运用

“利用半结构式访谈已经成为女性研究学者寻求获取她们的回答者在解释有关其生活数据方面积极参与的主要方法”。^① 半结构式或非结构式访谈是一种定性的数据收集技巧，它不同于人种史研究中的访谈，需要研究者长期参

^① 转引自 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p.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与被访者的生活；它也不同于调查研究或结构式访谈，因为非结构式访谈中研究者与被访者自由地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包容了解释与讨论的机会，而调查研究则典型地排除了这种机会。开放式访谈研究探索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从而使研究者形成理论，它以这种方式补充了偏重定量的、试图验证某些假设的封闭式访谈研究的不足。

开放式的访谈研究提供了许多非标准的信息，例如，除了使研究者了解到人们之间的差别外，还可以使研究者听到人们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观点、思想和回忆，这一点对妇女研究尤为重要。因为这形成一种了解妇女的方式，打破了数百年来完全忽视妇女观点，或是由男人为妇女代言的状况。访谈研究还在避免对其他人进行控制和发展与人民相关联的观念上与妇女的利益相一致。

历史地讲，最初女性学者使用访谈的方法，主要出于社会变革的目的。例如，美国学者 H.S. 坎贝尔(1839~1918)在她对糖果店女工及其与男性雇主关系的研究中就使用了访谈的方法，并将统计数字写进她在 1887 年出版的著作《贫穷的囚犯：妇女雇佣劳动者，她们的职业和她们的生活》^①和 1893 年出版的《妇女雇佣劳动者》^②中，为了将自己的著作推向更广泛的公众，她将一个个访谈的内容用讲故事的手法写出，正是这些故事打动了公众的心，引起了社会的反响。美国社会学家 M. 科莫罗夫斯基也是一个将访谈

① Campbell, Helen Stuart, 1887, *Prisoners of Poverty: Women Wage-Workers, Their Trades and Their Live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② Campbell, Helen Stuart, 1893, *Women Wage-Earners*. New York, ARNO Press.

研究运用于女性主义目的的典范,从她早期的萧条时期失业对家庭生活影响的研究,直到她最近的有关学院中妇女的社会心理发展研究,她一直采用访谈的研究方法。^①

目前女性学者将访谈方法运用于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其主题涉及家务、母亲、宗教经历、暴力经历、性虐待与性骚扰,以及有关堕胎和生育问题的个人决定等等。访谈的细节也是十分不同的,在每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都必须考虑到访谈持续的时间,问题的数量和提问次序,是采用封闭式、开放式还是二者兼用,被访者是否有机会提问访问者,访谈是否需要标准化,以及有关特殊主题访谈的伦理学问题等等。

64 除此之外,女性学者们还考虑到一些非常细节的问题。比如,访谈地点的选定,怎样记录访谈信息,作笔记、录音还是录像,是面对面访谈还是采用电话方式,谁应该在访谈中做主要发言,访谈采用个人形式还是小组形式,访谈的双方是不是需要在事先互相认识 and 了解,被访者是否可以阅读研究结果甚至参与研究说明的修改。女性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甚至对于被访者是一个参与者,还是一个研究对象,或一个资料提供者这样的基本问题,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这种不同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性研究方法既植根于主流学科又表现出反抗的一面,如,她们用“参加者”(participant)这种非传统词汇代替“对象”(subject)这种规范词汇就是一个标志。这

① 转引自 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p.2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等于宣布研究者是在女性主义框架中进行操作，这一框架有着命名和重新命名的权力，它反对僵死的组织计划，允许研究问题引导项目的发展，并鼓励创造性。

在女性研究学者看来，一个社会研究项目要了解妇女，那么妇女对妇女的访谈是最适宜的。女性学者常常讨论一些远离公众事务和学术话语的问题，避开男性活动和社会科学的范畴，这对被访妇女十分重要。而且一个妇女耐心与细致的倾听可以使另一个妇女运用自己的语言来发展观点，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她们生活的故事。女性学者还相信，跟随被访者的引导可以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就要求所有的注意力不是单纯集中于要求回答的问题上，而是更多地给予对方理解，营造放松的气氛，相信她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有关信息。

与传统的社会学访谈有所不同，一些女性研究者还提倡采用自我表露的做法，特别是当研究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时。如对衰老的恐惧和遭遇强奸后的感受等，在这种时候，有些女性学者往往主动谈到自己的恐惧感和自己曾经有过的被强奸的经历，这种表露使气氛一下变得放松了，她们使访谈变成了一种真实的对话，使参加者成了“合作研究者”。对于这种方法，女性学者中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些社会工作研究者在对一些访谈进行观察和研究后指出，被访者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受到访谈者自我表露的限制，她们觉得自己重复着访谈者的想法与感受，随即揣测访谈者希望听到的是哪些想法，而不是自由地表达自身的观点，妨碍了自我的确立，而更多的是一种感受的共享。

尽管有这样一些问题，女性学者还是经常地采用访谈

方式以达到自己的学术目的，她们还重视在访谈前与被访者建立起信任关系，在访谈之后与访谈对象建立起长久紧密的联系，在需要进行重复深入的对话等等这些很细致的问题。总之，从事访谈研究的女性学者修改了社会科学旧有的方法，使它更有利于对人群的观察，通过倾听妇女的谈话，了解在特殊社会体系中妇女的处境，她们揭示了从前被忽视和误解的经验世界。

（二）人种志方法的运用

当代人种史或田野工作属多元方法研究，它通常包括观察、参与、档案分析和访谈，并由此结合了每一方法的长处和弱点。在女性研究学者进入学术领域的最初阶段，她们就曾批判地指出实证主义方法以一种男性中心的或偏重男性的方式曲解知识。出于这一理由，她们认为选择的，或非实证主义的方法，尤其是开放式访谈和人种志方法应在女性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选择的方法偏重于解释，依赖于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环境中去，目的在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两个主体之间的理解与认识。

在女性研究者看来，运用人种志方法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记实性地描述妇女的生活和活动。女性学者发现，在以前的社区研究中，妇女对于那些男性观察者来说仅仅是简单的存在物，人种学家没有看到妇女在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女性研究的偏重点恰恰是揭开这些障眼物，使参与性观察者将妇女作为她们社会中、经济活动中和政治世界中的正式成员来看待。第二，从这些妇女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她们。长期以来人种学家们

对妇女的讨论仅仅是依据理想或价值的标准来分析她们与男人的关系，认为妇女的活动和思想是琐碎和浅薄的；或是从这一社会中男人的立场出发来描述妇女，而从未有人问一问对于妇女自身来讲她们的存在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在西方文明和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有人指出，这是西方文化中的所谓厌女情绪在社会科学中的反映。而女性研究中运用人种志方法的目的之一也就是矫正以前传统的参与性观察的主要偏见，从妇女的立场出发来研究妇女。第三个目的是在社会背景中认识妇女。持女性主义立场的人种志学家试图将妇女行为视为社会背景使然来描述，而不是脱离这一背景或在解剖的、个性的和社会阶级的基础上来解释妇女行为。

尽管女性学者在运用人种志方法开展研究时，在其研究目的、观察方法和背景的确定等方面，与传统的人种志方法不同并有所改进，然而她们在以下几个方面仍面对一些矛盾。首先，尽管女性学者试图从妇女的立场研究妇女，然而这些妇女并不总是相信她们，特别是当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存在社会阶级、种族、民族或性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别时，她们之间更易产生隔膜。如果女性学者未能赢得她所研究的妇女的信任，作为研究者和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的学者，她会有一种双重失败的感受。第二个矛盾是在参与性观察中普遍存在的，即接近被研究者，还是保持一定距离以坚持客观性和研究者的独立身份，对此多数女性研究学者都主张，接近妇女是了解她们的先决条件。第三点涉及完全的观察者和完全的参与者这种角色之间的矛盾，许多女性研究学者都论述过将自身与工作相结合在道

德方面和认识论方面的重要性，以及缩短主体与客体之间距离的重要性，她们相信在参与性观察基础上得到的认识会由于完全沉浸于所研究的社会而得到补充和加强。

(三) 调查研究和其他统计形式

调查研究是一种最严谨和最具科学意味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界和公共领域里，人们对调查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是广泛接受的。因此，政府或相关组织频繁地使用调查研究方法，为社会迫切关注的问题提供答案。

女性研究学者也充分意识到这类数量方法对女性研究的价值，她们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对性别歧视的研究普遍运用的是定性的研究方法，而定量方法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好的定量研究成果既可以对整个学术界产生影响，也可以为其他女性研究课题提供借鉴，从而有助于实现女性研究的共同目标。正如心理学家 T. 杰亚拉特尼在她的“数量方法论对女性主义研究的价值”^①一文中指出的：一定要有适当的数量根据来抗衡社会科学中不断出现的广泛而又流行的性别歧视的数量研究，而女性研究者正好当此重任，如果生产所需数据的传统步骤中某些方面与我们的女性主义准则相悖，那我们必须相应地改变这些步骤。在改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应该记住在政治背景中检视我们的研究，我们还要相互支持以抵抗学术和专业压力对我们标

^① Jayaratne, Toby, 1983, The Value of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for Feminist Research, in Bowles, Gloria and Klein, Renate Duelli, (eds.),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pp.140 ~ 161,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准的损害，我们越是从事高质量的研究，这一研究对别人的影响就越大，并最终有助于她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调查研究有这样一些优势，可以为女性研究提供帮助。首先它可以使一个问题变得更广为人知，从一个小群体人们的经验可以归纳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焦点问题。例如有关性骚扰的统计信息，促进了美国大学和公立学校体系中性骚扰委员会的建立，并实现了为个人提供法律帮助的目的。调查数据可以揭示在不同人口群体中存在的不同问题，这种问题的分布情况可能恰恰表明了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通过分析还可以找到防止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统计研究还有助于确认群体间的差别和这一差别随时间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如劳动统计证明了基于性别的就业范型，妇女聚集在以低地位和低收入为特征的工作中，根据这一范型引申出的以性别为基础的收入统计揭示了鲜为人知的事实。统计数字除了显示性别之间的差别外，还可以表明妇女之间的相似与区别，如对第三世界妇女的调查就显示出她们在孕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堕胎的合法与安全方面与发达国家妇女的差距。调查统计还被一些女性学者用来检查理论，她们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验证或是推翻此前作出的论断。

人口统计还可显示出某一问题是否日益突出了，或是向新的人口群体扩展，以及它在人口中呈现怎样的不均等分布状况，建立在这一类数据上的研究在证明女性研究的社会批评之正确性上是大有助益的。例如，197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两名法律系学生 S. 艾森伯格和 P. 米克洛，通过警察和负责离婚事务的法官收集了地方上殴打妻子普遍程

度的数据，并将结果写成文章发表在 1976 年的妇女权利法律报告（*Women's Right Law Reporter*）中，她们的研究有助于证明殴打妻子在美国是一个广泛的“社会事实”，而不仅仅是某个特殊阶层或群体的问题，这些数据对于认识殴打妻子是针对妇女的暴力，并已成为更普遍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作出了贡献。^① 社会调查研究者和许多社会机构建立了广泛和有力的联系，如医疗、政治、经济和政府部门，这种联系对于女性研究中改造社会的政治目标也是至关重要的。

统计数字简单、扼要、明了，因此极易传达到寻求信息的报告人和立法者手中。统计数字还具有法律的力量，它在有关性别歧视及其他对妇女不公正事件的诉讼案中作用重大。统计数字便于领会和记忆，还可以通过图表形式展示给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们，对于解释理论和提高妇女觉悟十分有利。此外调查研究往往与政府机构有联系并且代价昂贵，这一事实也使它在公众和研究者眼中具有较高声望。

女性研究学者在运用调查研究这一方法时，还表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如“二次数据分析”，女性学者既开始新的调查也分析别人收集的数据，此前的一些相关调查和数据分析都可以为她们的研究服务；“杂志调查”即向某种杂志的读者发放问卷，从事女性研究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频繁使用这种方法，以探索妇女的行为和观点倾向。

^① 转引自 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p.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态度调查”是对传统调查的一种补充，例如，在有关性别歧视的研究中，女性学者认为仅有证明不平等的统计数字是不够的，只有当歧视的意图被证明之后，研究的结论才更具有说服力。

女性学者还指出调查研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可能导致对问题的程度估计不足，产生对妇女不利的结果；统计信息也可能被用来掩盖某种现象，或被人为地利用，当数字不利于自己的观点时就被漠视等问题。最后，女性学者对使用调查研究也具有矛盾的心态，或说是有“双重看法”，这种情况在女性学者运用其他方法时也是可见的。因此，可以说运用调查研究是女性研究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因为多数女性研究学者既受到社会科学的训练，也受到社会运动的熏陶，她们视自己的研究既是政治的，也是科学的，这是决定她们采用方法的前提。

（四）实验研究方法的采用

实验室实验在心理学界是一种规范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是自然科学和临床医学的重要研究手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主要社会心理学杂志中进行统计，采用这种方法完成研究报告的比例达 70% 以上。大量研究建立在实验方法的基础上表明，作为一门学科的心理学和作为一种方法的实验室实验这二者的融合，由此构成了学科中的主流研究方法。在公众眼中，实验室实验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本质。

女性学者也有着长期从事实验研究的历史。就美国而言，在最早一代的女性心理学家中就有运用实验研究的先

例。例如，1887年在威尔斯利学院开始其研究工作的 M. 卡尔金斯，就曾从事过证明女性与男性同样聪明的实验。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 H.T. 伍利于 1903 年在实验基础上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题为“性别的心理特征：男性与女性正常心理的实验研究”^①，她的研究为当代女性心理学家对过于强调性别差别而忽视男女之间相似点的批判提供了早期的研究例证。

然而对于女性研究来说，实验室实验也存在问题。首先，她们认为这种方法导致心理学对妇女认识方面的缺陷，指出实验所要求的对变量的严格控制与操纵是一种男性的、代理式的研究。其次，女性学者还指出性别歧视可以影响到实验进行的每个阶段，这些阶段依次为提出问题、考察文献、实施设计、挑选受实验者、收集数据和最后的数据分析、解释、汇集成文等。第三，对有关“实验者的影响”，主要指实验施行者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这些批判讨论了实验室行为和群体成分的“非自然”性质，有些学者指出，实验环境有效地防止了实验对象以某种行为方式取悦于实验者，而另一些人则指出这种环境正是鼓励了实验对象取悦于实验者。无论如何，没有理由相信在实验中接受实验者的行为表现了他们的“真实”感受，实验的处境削弱了实验对象作出不赞同反应的能力。这种环境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实验者可以控制受实验者，并由此最大限度地控制变量。女性学者认

① “The Mental Traits of Sex: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Normal Mind in Men and Women”. 见 Re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p.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为，实验室并不是“中立的”，在分析妇女的行为时实验不应当是孤立的，而应当与实验环境的描述结合起来，应该理解形成实验室研究结果的历史背景，同时还要注意到，社会背景中的普遍现象也会影响到实验室的结果。

鉴于公众普遍认为实验是一种客观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这种方法与心理学结合得十分紧密，也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学者，特别是女性心理学家运用实验研究方法，以期揭示某种现象并促进人们态度的变化。例如，一例有趣的心理学实验发现，人们更易倾听和记住男性发言人所传达的信息，不管他所讲的题目是什么。在学院中的实验也显示，尽管男性学生承认某些女性是教过他们的最出色教员之一，他们仍记不清这些女性教授的姓名。^①这些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引起当事人的注意，改变他们的行为，并敦促社会从总体上改变对妇女的态度。此外，一些精心设计的实验显示出男女两性在求职中所遇到的差别待遇，这类实验的发现不仅可用来唤起公众的注意，还可能会有助于形成一些相关的政策与法律。因此，尽管实验方法有着其内在的缺陷，但利用它的优势，或是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仍然可以为女性研究的目的服务。

73

（五）跨文化研究的方法

女性学者在从事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不仅对传统学科中的男权意识进行批判，同时对于自身的研究方向

^① 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p.1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地进行反省。她们意识到如果女性研究的框架只适用于西方白种的、中产阶级的或职业妇女，那也就谈不上女性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社会学或女性主义人类学。更具体地讲，这样四点认识促进和指导着女性研究领域的跨文化研究：第一，对文化特征重要性的认识，文化背景与文化特征对于认识妇女和探讨妇女问题是不可或缺的要害，女性学者通过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妇女，来证实她们提出的一些假设。如加拿大学者J.M. 比尔森研究了加拿大9个不同文化的妇女群体^①，其中包括中国人、印第安人、苏格兰人、因纽特人、法国人等等，以验证在跨文化基础上的妇女屈从地位的假设，即在这9个文化社区中妇女在传统上是否屈从于男性？目前的情况如何？她还寻求揭示有助于解释妇女屈从地位的实质与程度，或是她们的统治与权力的文化因素，而且她还探讨随着这些社区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男女的社会角色是否也发生了变化。为达到上述目的，她与每个社区的妇女一起劳作，鼓励她们与她讨论自己的祖辈，祖父母，父母及自身一代的性别关系。这一研究的目的是要证明：一般地讲“妇女的屈从”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妇女的屈从地位是种普遍现象，也仍要在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中理解它。第二，是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即在对妇女说三道四之前必须深入地研究她们，这点提醒女性学者一定要深入探讨妇女与她们的背景之间的关系。第三，通过跨文化研究，寻找

① Billson, Janet Mancini, 1991, "The Progressive Verification Method: Toward a Feminist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Women Cross-Culturally", 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14, No. 3.

不同文化群体妇女之间的共同特点，这是女性研究的一个特有课题。那些生活在表面看来各自独立的社会中的妇女，实际上有着许多共同点。第四，对研究资料进行批判性评估，是女性学者从事某种相关课题研究时必须进行的前期工作，而资料不足以及以前资料中的偏差，也促使她们去寻找新的资料来源，包括当地妇女对自己生活经历的描述。

女性学者从事跨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比较和评价社会政策，描述不同社会中一些共有的现象，并最终形成女性主义理论。例如，政治学家 V. 兰德尔在她的著作《妇女与政治学：一种国际的观点》^①中通过比较众多国家得来的数据，形成自己的妇女理论和政治学，希望由此瓦解男性统治的体系。具体地讲，她通过有关选举行为，各个政党的成员数和对革命运动的参与等数据分析，对以下五个有关妇女政治敏锐程度的刻板印象重新作出评估。这五个印象包括：妇女是保守的、妇女将政治个人化、妇女是说教的、妇女是不关心政治的，以及妇女在政治上是占优势的。她在研究中参考不同国家研究的资料来防止自己得出过于普遍化的结论，并通过这些资料来解释妇女在特殊情况下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通过这部著作，她批判了政治学的性别偏见，并发现自己必须依靠女性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从事的研究。

在提高对女性研究中种族中心主义的认识方面，跨文

^① Randall, Vicky, 1982, *Women and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49,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化研究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西方女性学者总是将她们的研究重心放在本民族、本文化的妇女身上，对其他地区和文化有所忽略。除了欧洲学者中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外，美国学术界也经常批判自己学者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行为和态度，诸如，在学习外语方面不思进取，对其他国家的地理位置不甚明了，以及对不同民族人们认为有价值的现象不能作出正确评价，其实她们并非不能做到，只是不去做而已。因此对跨文化研究的提倡促进了对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中妇女命运的关心。美国著名的黑人女性主义学者比尔·胡克斯建议改变过于依赖英语的现象，提出应鼓励学者学习西班牙语、日语、中文等。社会学家 A. 丹尼尔斯也系统地分析过女性学者的种族中心问题^①，她认为学者们的眼光不应局限在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身上，忽视了其他民族姐妹的经历，如果这样来讨论诸如劳动力市场中的妇女，或是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妇女的权力等问题是不全面的。这样的研究所形成的不仅是不完善的社会学，而且是糟糕的社会学。

联合国妇女十年以及哥本哈根、内罗毕的世界妇女大会对于妇女之间联系的建立和从事跨文化的女性研究提供了良机。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开始描述她们的观点是如何从狭隘的地方女性主义向全球女性主义转变的。1978年，非常有影响的女性研究学术刊物《女性研究国际论坛》开始刊登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学者的文章，从

^① 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p.1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跨文化和国际主义角度对女性学者的著作进行评价，这是良好的开端。在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我们看到世界妇女运动和女性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交流与合作的阶段，可以相信跨文化研究在女性研究的学术发展中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六）口述史——重要的女性研究方法

传记工作一直是妇女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将妇女从黑暗的角落推向前台，重新修正了历史记载。姐妹情谊的观念总是召唤女性研究学者与过去的妇女取得联系，而当学者们转过身去向前辈妇女求得帮助时，前辈妇女也同时获得了帮助。因为女性学者为她们在历史中找到了位置，她们让沉默者讲话，为无言者立言。不仅如此，妇女口述史还为女性研究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它产生了许多有关妇女的新资料，它描述妇女的经历，发展妇女之间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流，丰富了女性研究传记工作的内容。

伴随着女性研究中口述史项目的完成，许多产品也随之产生。单纯的口述史可以作为原始的或经过分析的文献出版，口述史选集可以服务于未来相关主题的研究，有时一个妇女群体的生活也可以作为口述史追踪的对象。女性研究的口述史项目即结合有工艺品和照片，还可以通过录音和录像，从而构成了对妇女生活的全景式展示。

女性研究的口述史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主题型、传记型和自传型。女性研究的口述史与访谈、自传和传记三种方法联系紧密，它们有些特点是共同的，同时，它们也还

有各自独有的特点。比如访谈与口述史是非常类似的，但是访谈往往集中于某种特殊的经历或现象，而口述史面对的是一个人过去更广泛的生活经历，包含了更多的主题，甚至包容了一个人从出生到目前的生活。口述史在传达方法上是不同于传记的，一些过去的事情必须通过口头方式传达出来，因为有些人是没有书写能力的。口头陈述对有些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她们寻找的材料在书写的记录中是没有的，欧洲一些历史学家运用口述史方法研究二战历史是不无理由的。一般而言，有关男人生活的记录更易于形成书写的文献，男人自然成为使用档案资料的历史学家分析的主体。与文字历史相反，口述史对于了解未经文字记载的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妇女的生活尤为重要。一般来讲，社会中权力相对弱小的群体是口述史研究的最佳候选人。

那些希望了解个人生活和理解某种社会现象的历史学家、记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女性研究的学者都在运用口述史方法。笔者在这方面也有着很深的感受，在1994年赴荷兰进修期间，阿姆斯特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的十几位工作博士，多数都采用口述史研究方法来开展她们的研究工作。除了对单一妇女的口述史研究，她们还对某一民族或某一家庭不同代的妇女进行口述史采集工作，以比较分析她们的生活、身份认同和角色观念的变化。另外在美国南方，口述史曾作为一种批判方法出现，它的出现使人们对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所了解，改变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南方妇女的刻板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女性研究使这种方法重放异彩。

女性学者对这一方法的兴趣，或许反映了她们在主流之外工作的意图。与其他方法一样，女性学者同样使用口述史的方法来发展或验证女性主义的理论，通过口述史的成果报告对其他妇女表达共鸣和钦佩之情，促进社会各阶级之间的了解，致力于社会公正地对待妇女，并将探讨各种事件在妇女眼中的意义。同时鉴于口述史有着将妇女引入历史的潜力，它使女性经历成为文字记载历史的一部分，它对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英雄提出质疑，并修正了此前公认的标准历史，这些构成了传统社会科学不愿接纳它的理由。然而不管怎样，女性研究的口述史方法在唤起人们对妇女生活的关注和修改历史记录方面的成功，对于丰富历史学方法论作出了贡献。

（七）女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

79

个案研究是通过对一个单独案例的详尽分析来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个案可以涉及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事件、一个过程、一个社区、一个社会或是社会生活的任何其他单元。它要求收集所有与个案有关的数据，并根据个案对数据进行组织。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将各种各样事实与一个单个案例的相互联系使被研究的数据具有了一元的特点，它还为深入细致地分析某些特殊细节提供了机会。这种方法还确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即研究中的个案在同类个案中具有典型性，所以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可以作出适用于其他类型案例的概括。个案研究对于女性研究同样是重要的，除了形成和检验理论之外，女性研究中运用个案研究方法有三个主要目的：即分析某种现

象在一段时期中的变化；分析这种现象对未来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分析该现象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个案研究的方法几乎囊括了从文献分析、调查、档案研究、访谈等等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在政治科学中，个案研究通常涉及某个特殊政治斗争的历史发展。而在社会学领域中更有着长期的个案研究的传统，社会学家曾就某些群体（如某个城市中的一个街角）、某些事件（如一场水灾的后果或一种工业污染危机）、机构（如精神病院、矿山）和社区（中等城镇、杨基城、民族亚文化）等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以其生动的描述和所形成的有趣的理论受到称赞。

女性研究的学者从事个案研究，与其他学者进行这一活动的理由是一致的，即解释某种观点，讲述一段时期的发展过程，指出一些概括性结论的局限，通过一个小范围的个案探讨某个未知的问题，或是提出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例如，一个精心选择的个案，可以说明某种概括是不能成立的。出于这一理由，特殊个案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启发和探讨价值，虽然它们不能形成概括，但是它们可以指出概括的局限性，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同其他研究手法一样，女性研究学者使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同样是要矫正由男性主导的理论所引导的研究。那种传统研究使工厂、矿山和其他男性为主的社会环境的研究者，无视妇女在这些环境中的存在，即使提到妇女，也是根据男性的需要对其进行限定。为了对这些曲解性的研究作出反应，女性社会科学家对以前未曾给予研究过的妇女个人、妇女活动和妇女组织进行个案研究，她们还对男

性学者已作出结论的研究结果进行重新研究，这些二次研究将注意力转向妇女的作用，帮助研究人员看到社会环境中性别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个案研究是女性研究的一种工具，它被用来撰写历史和形成理论，它通过观察特殊与例外来挑战社会科学寻求普遍性的传统。个案研究能生动地传达某种社会现象，或描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力量正是女性研究者希望利用的，当代社会科学对于个案研究尽管评价不高，但女性学者仍然不断地利用这一方法以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

总之，女性研究所运用的方法正如其研究本身的多学科性一样，也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包括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以及多重方法的综合使用等。

81

二、女性研究与研究方法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女性研究的方法，这就是持有女性主义立场的学者在从事研究时所运用的方法。因此，对女性研究特点的了解对于认识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是十分必要的。概括地讲，对女性研究及其与方法的关系可以做这样几点说明：

（一）女性主义为女性研究提供观点，而不是一种方法

多数女性研究的学者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观点、立场，而不是一种方法，这一观点和立场为新的方法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女性研究的一个共同信条是妇女的生

活是重要的，这一研究对于作为个人和作为一个社会类别的妇女感兴趣，从这个角度讲，女性主义提供观点，而各个学科提供方法。女性研究建筑在两个领域之上，一个是学科领域，另一个是女性研究的学术领域，女性研究的学者站在二者的结合点上，她似乎负荷着双重担子，同时又从这种结合中获得优势。

（二）女性研究使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

女性研究中不存在单一的“女性主义方式”，而是有着许多个人的创造与变化。女性研究是全方位的，它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度，它深入所有的学科并使用所有的方法，有时是单独地使用，有时则是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在一些情况下，女性研究学者运用她所在学科的方法而不做任何修改，她们利用这一学科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研究目标。有时研究者也对方法做必要的修改以满足女性研究的特殊需要，而当她们而临工作中的重大挑战而深感传统方法的不足时，她们便创造新的方法。由此女性研究与传统学科方法之间形成了既吸收、又对抗、同时相互丰富和共同发展的关系。

（三）女性主义研究是跨学科的

女性研究的跨学科特点是人所共知的，有的女性学者甚至断言，当我们某一天在研究人类经验和人类活动的特殊问题时，需要进行跨学科的探讨并结合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分析等学科的成果时，我们将使用“女性主义方法论”这一术语。这就是说，她们将女性

研究的方法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置于同等的位置上，女性研究使跨学科方法更加完美和具体化，它们共同代表一种符合趋势和潮流的方法。

（四）女性研究的目的在于社会变革

除了与理论的联系，很大一部分女性研究的工作是与社会变革和社会政策问题相关联的。甚至当一个女性研究学者进行所谓的基础研究时，她也会在结论处对读者如何运用这些成果提出建议。社会研究既要推进妇女的福祉，也要贡献于知识生产，这被女性学者视为她们多重职责的一部分。有的女性学者通过提高妇女觉悟和特殊政策的推荐来促进社会变革，女性研究中心和政策研究所的不断涌现为这类工作提供了制度支持。这种与社会变革的联系也使得女性研究既有学术性，同时又具有实践意义。

83

（五）女性研究服务于对差异性的认识

女性研究对于差异性的认识在本书中会进行多次探讨，她们不仅为自己认识、揭示和研究妇女之间的差异而深感自豪，也不断地批判所有学科的主流研究中无视这一差异的倾向。除了反映妇女个人、妇女群体之间的不同与变化，展示她们之间的交叉点也是女性研究的目标，差异性还成为衡量女性研究是否成功的新标准。

（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参与

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个人经验与研究项目是不相关的，有时还被视为对研究成果客观性的威胁，而从以

上对研究方法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女性研究学者将个人经验看作是有价值的财富，利用研究者的个人经验是女性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女性研究学者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开展一项课题研究的例子不胜枚举，她们不仅乐于描述某一研究问题的起源，还常常将实际研究过程作为一种生活经历来叙述，并告诉读者她们在这一过程中学到了什么。从某种意义而言，“从个人经验出发”是研究者确认自己是从“妇女的立场出发”的一种方法，它有助于限定研究主题，寻找资料来源和获得其他研究者的信任。然而在从事跨文化研究时，则要避免由此陷入种族中心主义的困境。

除了研究者自身的参与外，女性研究项目还包括被研究者的参与，特别是在那些以观察和访谈为基础方法的研究项目中。这些项目包容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是在研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常常在项目结束后仍得以保持，这种关系常常游离了研究的范围而进入了参与者的个人生活。女性研究学者认为良好的个人关系是研究妇女的重要先决条件，而有些研究者甚至给予她们所研究的妇女以直接的帮助。尽管有些女性学者对此有不同见解，它仍然构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女性研究的一大特色。

第五章 批判与重建

——女性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其特点

过去几十年中女性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尽管女性研究还未将其触角伸入到学术界的所有领域中，然而在某些领域她们已是成绩斐然，这远非一些早期的女性学术活动者所能想象。女性研究已走过了相当长的道路，虽然它尚未达到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所期望的目标，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学术成就进行恰当的评价。

一、女性研究学者队伍的形成与壮大

女性研究在学术界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不能否认，在任何学术领域中都有女性学者存在，然而最初这些女性学者却寥若晨星，未能形成一股力量。尽管如此，女性研究的学术发展仍然视这一存在为其重要的发端。英国女性研究学者 J. 艾伦和 S. 沃尔比在谈到女性主义学术空间的确立时，就首先提出了女性学者的“存在”作用。她们曾介绍英国女性学者参与学术界的几种方式，其中首先一点，即在男性为主体的学院和科系中，这些女性学者作为“象

征性的妇女”而存在，并将这一信号传达给男性学者。^①从20世纪60~80年代，经过女性学者的不断努力，她们已从“象征性的妇女”扩大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我们可以从美国政治科学界女性学生和学者人数的变化，具体地看到这一发展。美国政治学家J.S. 贾克特曾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美国政治学界女性人数的变化：60年代末，在美国大学和学院中，虽然主修政治学的大学生中女性占将近25%，而博士生中的女性只占9%，专职教员中女性仅为6.5%。到1989年，上述数字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女性人数占到博士学位获得者的1/4，女性专职教员的百分比也增加了一倍多。^②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学者都是从一开始就自觉地从女性主义观点出发从事研究的，分属于不同学科的女性学者们走上女性研究道路的经历和目的也是有所不同的。就文化人类学而言，作为一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殖民主义全盛时期形成的学科，最初其内部对任何有关妇女地位的考察和研究都不屑一顾。当时尽管也有一些独立的女性研究者，但在美国，较普遍的现象是一些妇女随同其丈夫参与田野工作，事实上，她们仅仅是作为第二观察者，关注一些与女性有关的事务。在英国方面，则多是—

① Aaron, Jane, and Walby, Sylvia, 1991, "Towards a Feminist Intellectual Space". in their (eds.) *Out of Margins*. p.2,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② Jaquette, J.S., 1993, "Political Science — Whose Common Good?" in Kramarae, Cheris, and Spender, D., (eds.) *The Knowledge Explosion-Generations of Feminist Scholarship*, p.141,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些未婚的女性人类学家与男性研究者结伴而行，在田野工作中记录妇女活动，并强调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因此，从最初的事实来看，不妨说这些欧美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利用她们接近殖民地妇女或美国原住民妇女的优越机会，来发展自己的职业身份和确立自身的专业地位。此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欧美国家在亚太、拉美等地区的利益迅速增长，同时大众文化和知识界中流行的科学态度促进了新的学术思想的兴起。这种思想倡导科学地认识其他文化，并对此前的主导框架进行批评，这一理论和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改变了“妇女与人类学”的处境，并为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些女性学者也曾坦言，她们对自身学科中妇女问题的关注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美国历史学家琼·凯利-加多这样描述她自身觉悟的戏剧性变化^①，1971年她正从事历史教学工作，一位女性历史学同事邀请她参与正在运筹中的课程、研究计划或举行一次讲座，讲讲与她研究领域相关的妇女问题。凯利回忆道：“当时我扔给她一个纸条，称赞了她的兴趣并告诉她，鉴于我研究的是文艺复兴的历史，因此对妇女问题我没什么可说的。”然而在与这位同事进行了4个小时的谈话之后，凯利改变了她的看法，这一改变并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新的证据或新的史料，而是这次谈话促使她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使她意识到迄今为止文艺复兴的历史研究中存在着很多的偏见、曲

87

^① Lewis, J., 1993, "Women's History, Gender History, and Feminist Politics", in Kramarae, Cheris and Spender, D., (eds.) *The Knowledge Explosion*. p.154,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解和局限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关妇女的问题在这里从未被提出过。在翻看了有关文艺复兴的各种研究资料之后，凯利不得不作出结论，即对妇女而言从未有过文艺复兴。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妇女常常通过提高觉悟小组的活动，来认识自己在当今世界中地位的某些特别方面。而诸如凯利这样得以从新的角度和立场重新审视自身的研究，似乎也得益于类似的活动。

当然，也有些妇女在进入学术界之前就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她们要为妇女运动寻找理论根据，为改变妇女的地位和命运而斗争，这种情况也不乏其例。比如在法学界中，妇女就是意识到需要通过立法，对法律体系进行改革，才能更有效地保障妇女的权利，更彻底地改变妇女的地位，因此她们不懈地努力，经过了几代人的奋斗，才得以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

在 19 世纪的西方国家，妇女既没有自身的人格，也没有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因此，专门为培养和教育男性而设立的大学也就没有妇女的位置，而妇女争取进入大学和法律专业的斗争，正是与这种社会现实相联系的。澳大利亚第一位学习法律的女性是艾达·E. 埃文斯（当妇女终于被允许进入大学后），她于 1903 年毕业于悉尼大学，但直至 1921 年才被准予开业。因为根据新南威尔士的律师开业条例，只有具有相当资格的“人”（person）才被允许开业，但是对“人”的解释并不包括妇女（women）。^① 类

① Scutt, Jocelyne A., 1993, "Women and the Law", in Kramarae, Cheris, and Spender, Dale, (eds.), *The Knowledge Explosion*, p.200,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似的情况在美国发生得要更早一些。第一位女性开业律师可以上溯到 1869 年的玛丽·E. 马古恩。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进入大学法律系的妇女人数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在有的学校中甚至等于或超过了男生的人数。女性也开始进入各级执法部门。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司法界,她们都为改变妇女的法律地位,保护妇女权益而呼吁和抗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妇女要求进入大学和法律系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传统的法学理念和规范的挑战。

从以上几个学科的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妇女为进入大学,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和介入社会的政治、法律和学术领域作过不懈的努力,真正的转折点却是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高涨时期。从那时起,大学里的女生人数迅速增多,还有更多的女性加入了教师和学者的行列,她们用自己的成就和业绩向传统观念示威,同时也为女性研究的学术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89

二、向传统学科中的性别歧视宣战 ——女性研究的突破口

对业已确立的学术研究的实践活动进行挑战,这一行动看似简单然而意义重大。当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她们所在学科的局限时,她们相信,从妇女的利益出发,应该共同工作来改正她们学科结构中的某些遗漏。然而当更多的来自不同学科的妇女进行讨论之后,她们发现这并不是某个单一学科的问题。因此,对现存知识领域中学术理论与学术实践中性别歧视和偏见的批判,就成为女性研究在学

术界确立自身地位的突破口。

以政治学为例，有史以来妇女一直远离政治——无论是政治实践还是政治研究。当妇女参与革命运动，并将自己在妇女权利的旗帜下组织起来时，她们所获得的政治权利仍然是有限的。政治学中对妇女的深刻偏见存在于广泛的文化背景中，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中，“妇女”与“公民”的概念就一直纠缠不清。一般认为，妇女既不是社会的主要活动者，甚至也不是政治话语的主体。她们被认为不适合对政治问题说三道四，没有能力作出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也缺少远见卓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政治学教学中广泛应用的有关政治参与的经典《平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中，有一段对妇女的描述就典型地代表了这样一种观点：“女性与男性之不同……仅在于她们在政治生活的个性、情感和审美诸方面更经常地表现为冷漠、狭隘、保守和敏感。”^①

首先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的是 K. 阿芒德森。她在1971年出版的《沉默的多数：妇女与美国民主政治》一书中，将妇女在政治上的无足轻重归因于她们极度的经济依赖，并呼唤人民对社会机制中的性别歧视给予注意。她呼吁进行有着更广泛基础的妇女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妇女应运用民主政治这一武器来创造期待已久的变革。^②

① Almond, Gabriel A., and Verba, Sidney, 1965, *The Civic Culture*, p.325, Boston, Little Brown.

② Jaquette, J.S.1993, "Political Science —Whose Common Good?" in Kramarae, Cheris and Spender, D. (eds.), *The Knowledge Explosion*, p.142,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在美国政治学协会 1973 年的大会上，更有两篇论文对学科中的性别歧视进行了直接的批判，这就是布尔奎和格罗斯霍尔茨的“作为一种非自然实践的政治学：政治学看女性参与”^①和 J.S. 贾克特为她所编《政治学中的妇女》一书所写的导言。贾克特在她的文章中强调指出，政治学的定义是根据男性经验所界定的，而认为妇女政治参与比例低和妇女在政治方面表现“冷漠”是正常的，不是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有问题，而是妇女选择的结果，这种观点也是失之偏颇的。^②

两篇文章都同意，政治学科中对政治制度和相关问题的探讨，对于理解妇女的政治参与是有深刻偏见的。正规的政治制度中，包括选举和行政管理方面，在决策者行列中妇女仅是凤毛麟角，即使将政治参与的定义扩大到参与游说集团和研究公众舆论等活动。但由于对外交往一向比国内问题更受重视，加之忽视地方政策倾向的影响，妇女的政治活动仍显得无足轻重。

类似的学科偏见与学术中的性别歧视，几乎在所有学科中都有所表现，而女性研究学者也无一不是从对这些偏见与歧视的批判，开始她们自己的学术历程的。例如，在社会学中，妇女做为主要研究对象而被遗漏或未予表现，男性及其相关主题受到特别的偏重；社会学的

① Bourque, Susan, and Grossholtz, Jean, 1974, "Politics as an Unnatural Practice: Political Science Looks at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4-1, pp.225~266.

② Jaquette, Jane S., 1974, "Introduction", in Jaquette, Jane S. (ed.), *Women in Politics*, p.1,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范畴、模式和方法都是以男性经验作为标准，而妇女的经验则被无视和曲解。在人类学中，女性学者则尝试在所有四个重要的分支中（体质、考古、语言和社会文化）矫正男性偏见。如早期的研究成果指出，正是作为采集者的妇女，在当时的社会中提供了日常食物，因而是她们，而不是作为狩猎者的男性，成为人类进化的主要推动者。在心理学中，女性主义的挑战涵盖了学科的各个方面，从大的理论问题到具体的方法论，及至心理治疗的实践。在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N.威斯坦就曾发表论文“心理学是建构了女性，还是建构了男性心理学家的幻境”，文章指出，心理学对于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她们需要什么、她们想要什么无可奉告，因为心理学对此一无所知。威斯坦的批评主要针对心理学的以男性为中心问题，还针对把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和妇女个人问题归咎于她们的心理素质，所以是不可避免的那种理论，她指出，应该注意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因为它可以显示社会环境对个人的经验和行为的影响。大约10年之后，美国女性主义心理学者卡洛琳·W.谢利夫的文章《心理学界的偏见》^①发表，进一步剖析了心理学界将自己建树为科学权威的手段，以及在“科学方法”掩盖下的种种偏见，指出文化中的社会性别观念同体制结构上排斥贬低妇女的做法在生产心理学知识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

^① 卡洛琳·伍德·谢利夫，1994，“心理学界的偏见”，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144页，三联书店，北京，1998。

在文学领域，鉴于文学本身与价值准则、传统文化、社会语言和审美情趣等社会精神生活范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就构成了女性主义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刘涓所撰写的“‘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一文^①，我们了解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有美、法、英三个主要流派，它们都吸取了英国 V. 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美国 B. 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中所阐述的女性主义思想，将性别和社会性别作为中心角度，致力于挖掘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从文学、语言和心理的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中比较有影响的学者还包括 B. 史密斯、M.R. 法韦尔、B.W. 库克、A. 克劳蒂妮、E. 肖沃特和 M. 杰海伦，其中 E. 肖沃特的《论女性主义诗学》（1979）和《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81）被认为是有关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两篇重要论文。

93

总之，女性主义学者对各个学科内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的批判不仅标志着妇女运动进入了更深一层的文化批判阶段，而且为女性研究知识与学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第 98 页，三联书店，北京，1994。

三、互动与重建——对传统学科知识发展的贡献

在学术界，女性研究并不仅仅依靠批判而生存，它还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推动力量，女性研究对学科传统知识批判的背后，总是伴随着女性研究学术的成长和对学科主题范围的扩大与重建。

在论述过去 20 年女性研究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时，英国女性社会学家 L. 斯坦利就指出：在英国，是 A. 奥克利最先将家务（housework）作为工作（work）进行详尽研究的，她的研究受到了 H. 加夫罗恩的早期研究的影响，正是她们形成了最初的女性主义学术重建工作，这类工作曾使英国的主流社会学对“工作”一词进行了重新概念化的理解。^① 此外，产生于 1974 年英国社会学年会上的两部论述性别分工问题的选集，也曾产生过类似的影响。

女性研究在英国社会学界的存在和成长，导致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新方向的出现，这些新方向主要包括：对性别分工的强调；注意“公众一个人”的定义与分类；集中探讨了一些相关的方法问题；关注女性犯罪和犯罪行为以及在刑事审判体系中对妇女的处置，同样也关注男性暴力的程度和类型；分析“工作”问题，包括它与就业的关系，以及它与“家庭生活”和非正规经济运转的关系；注意潜藏在正规的教育课程中的性别规范，以及女孩在学校内外

① Stanley, Liz, 1993, "The Impact of Feminism on Sociology in the Last 20 Years". in Kramarac, Cheris and Spender, Dale (eds.), *The Knowledge Explosion*, p.256,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的生活动态；关注妇女生活中的差别与类似点，同时与黑人女性主义批判相联系，就女性研究中的种族中心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进行商榷。在这些问题中，对英国主流社会学界构成最大影响的当属这样两点：第一，“性别分工”这个问题的突出和被广泛地研究，使人们普遍地在较高程度上认识到，权利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条件和男女之间关系的条件的存在；第二，从性别角度探讨工作和休闲问题，还包括对家庭之中权力影响的认识和对男性暴力之存在与盛行的认识。因此，女性研究学者的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学三个分支学科的课题领域，这三个分支是家庭社会学、工作社会学和对男性暴力的研究。在家庭社会学中，将权力视为家庭生活的一个维度，并认为性别与年龄对于认识家庭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工作社会学则认识到三种不同经济（即正规经济、非正规经济和家庭经济）中，工作的相互依赖以及它们在分布上的性别、种族和阶级的性质；犯罪社会学不仅接受了针对妇女与儿童的家庭和公共场所的暴力十分盛行这一事实，而且也接受犯罪、无罪、谴责、内疚和其他相关概念的产生和运用中涉及性别、年龄和种族诸方面的问题。

和社会学略有不同，女性研究在心理学中的活动同样影响了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然而这些新的方向与重点的提出是在摒弃或重新审视旧的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旧的理论通过女性研究被重新进行了阐释。这方面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重新解释和再应用的尝试。最初，妇女运动的复兴似乎在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中创造了一个共识，即心理分析是社会控

制的一种工具，对妇女的精神健康是有害的。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一些女性学者，如 J. 米切尔，试图在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证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一种重要的说明（描述）力量，可以用来解释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发展。H.B. 刘易斯也曾指出“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女性主义的主题一直是内在的”。^①英国作家 J. 塞耶斯将刘易斯的观察更推进了一步，她主张心理分析对于女性主义所关注的社会变革是一块必要的基石。还有的心理学家将心理分析作为其发展自己某种观点的出发点。然而女性主义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判仍然是强烈的，例如，H. 勒曼就论证说，在任何复兴心理分析的尝试中，妇女都不能得到好处，因为它有着“基本原理上的缺陷”。在她看来，这一理论不仅忽视和贬低妇女，它还无视妇女生活经历的独特性。^②

此前在心理学中还有着一些荒谬的假设和观点。比如，认定外出工作会引起角色紧张，并由此对妇女的身心健康构成威胁。就像其他对妇女的曲解一样，这种概念也是建立在未经证明的假设基础上，而不是真正的研究。在女性研究兴起之后，诸如此类的观念都被抛弃或从新的角度被重新考察。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若干实验研究就证

① Lewis, Helen Block, 1986, "Is Freud an Enemy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Bernay, T., & Cantor, D.W. (eds.) *The Psychology of Today's Women: New Psychoanalytic Visions*. p.3,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② Lerman, Hannah, 1986, "From Freud to Feminist Personality Theory: Getting Here from There". i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p.6, 1986, 10~1.

明,多重角色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它所引发的紧张,而且这些额外的角色增加了妇女获得福利的机会。最新的调查还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明,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卫生机构,在对1194名25~64岁妇女进行的调查显示,31%的家庭妇女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好,而参加工作的妇女有此种想法的只有16%。调查报告认为这些数字证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由于社会接触增多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参加工作的妇女感到自信心增强,精神状态也好得多。报告还为一种逐渐被接受的想法提供了证据,这种看法认为,参加工作有利于妇女的健康,由于远离了孤独和家务劳动的琐碎,它在心理上产生的作用尤其重大。此外,一些女性研究学者还从研究男性和女性行为入手,为妇女的心理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和新的见解。如C.吉利根的《以一种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和妇女的发展》^①一书,就向道德发展的阶段理论提出批判,引起了公众与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尽管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对其研究的基础和某些观点有不同见解,但很明显,她的研究成果较之20世纪70年代有着明显的不同,表明女性主义的心理学研究在不断地向前迈进。

97

在历史学方面,根据琼·凯利-加多的观点^②：“女性主义的历史研究有两个目的：将妇女还原到历史中去；为

①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② Kelly-Gadol, Joan, "The Social Relation of the Sexes-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Women's History", 1976 转引自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82页，三联书店，北京，1998。

妇女重建我们的历史。……但妇女史的另一个方面也是值得考虑的，即它在理论上的意义——对史学研究的普遍含义。在寻找将妇女增补到历史知识之库的过程中，妇女史更新了理论，因为它动摇了史学研究的概念基础，这种动摇来自于对史学思想所关注的三个基本方面的质疑：（1）历史分期，（2）社会分析的范畴，（3）社会变迁的理论。”具体而言，首先，在历史分期方面，妇女史动摇了已被接受的对历史时期的评论，纠正了认为妇女具有同男人一样的历史，纠正了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对一个性别的影响与对另一个性别的影响相同的观点。第二，将性别作为如同阶级和种族一样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范畴，视性别关系如同阶级和种族，是社会而不仅是自然所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发展，因社会组织的变化而多样化。任何对社会制度的研究，都应包括对社会制度所塑造并蕴藏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两性关系的研究。第三，在社会变化理论方面，既然社会性别关系如同社会阶级关系一样对理解人类历史是必要的，还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阶级和性别关系变化之间的联系，因此应从生产模式的基本变化来考虑男女各自角色的明显变化，同时还要考虑家庭生活和性别关系对心理和社会构成的影响。在她的文章中，凯利将这三点总结为对历史学领域的重要贡献。然而可以肯定，女性主义历史学研究的贡献决不仅止三点，随着女性研究在学术界的发展，它不断地、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传统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经济学是一门传统的学科，男性始终在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经济学理论是男性的专利。要证明这一点十分容

易，经济学家 M. 布劳格在 1985 年和 1986 年写过两本书，列举了凯恩斯之前和凯恩斯之后的各 100 位著名经济学家，而在这 200 位经济学家中，只有三位是妇女。

在女性研究进入经济学领域后，她们对经济学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在同工同酬、劳动的性别分工、发展项目中的妇女问题、偏重市场的思想体系对公共政策和妇女儿童的影响以及对妇女所从事人类生命本身再生产的认识等等方面，都有许多专门的著述和文章。要全面地描述女性主义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是一项十分困难和庞大的工作，这里仅以一例来看女性学者对这一学科的影响。1989 年国际经济学家协会世界大会之前，在美国的阿森斯召开了一个有 14 个国家的女性经济学家参加的研讨会。在这样一个评价妇女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影响的会上，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有选择的经济分析的要素清单。^① 这个清单展示了女性研究对经济学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①单纯的经济方法不能驾驭发展的复杂性，发展是一个由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因素相互依存所决定的过程，因此，经济理论和经验分析应在一种性别的基础上与这些范畴相结合。

②经济学应将其研究范围扩大到市场之外，涵盖“人类福利”的生产并结合非金融经济的部分，包括妇女在家务劳动、照料子女以及为协调儿童、夫妻关系和人际关系

① Waring, Marilyn J., 1993, "Economics", in Kramarac, Cheris and Spender, Dale (eds.), *The Knowledge Explosion*, p.307,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作出的贡献。

③短期经济政策、计划和项目常常忽略可能产生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果，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造成的后果，因此经济研究、经济分析与计划应该有一个长期框架，附带有长期和中期的政策目标。

④家庭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单元既没有权衡妇女的需求，也没有充分代表妇女的利益，因此，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的分析单元应该是家庭中的单个成员，这将有利于对家庭内部关系进行评价，有利于家庭资源、收入及劳动的分配，并带来有利于妇女的变化。

⑤经济学家与相关人士应严密注视债务危机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对妇女造成的总体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低收入国家妇女的影响。

⑥目前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应包括妇女在非正规部门和家务中的经济活动。

⑦在政治上利用诸如 GNP 和就业总体比例等原始指标，有可能导致决策对妇女的生活产生消极的影响。

⑧经济学应更好地认识有关妇女再就业、工作条件、收入等数量与质量方面的数据，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认识她们对所有国家经济生活的贡献。

⑨现行的数据和指标没有充分考虑妇女就业、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若干重要方面。现行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技术应当改进并形成国际标准，以全面把握妇女的工作与生活。

⑩宏观经济模式的构造者通常忽略和无视有关性别差别的信息，即使这种信息是可以得到的，这导致了对公共

政策于就业所造成的影响的不准确估价。

⑪建立在性别分析基础上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范畴应该更好地与经济分析、研究和政策建议相结合。

⑫应该充分认识到财政体系中对妇女工作的歧视，以及这种歧视在社会保障权利方面的延伸。税收制度应该进行改革，以便改变妇女的依附地位。

⑬像妇女一样，自然界也常常受到同样的待遇，它被轻视、掠夺和过度消耗，为未来发展制定的计划，应包括强调自然资源保护和鼓励形成持续发展政策的一系列指标。

从以上几个学科的简要分析，不难看到，面对传统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女性研究决不仅仅是批判，它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在动摇、修正、丰富和发展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为更加完善的人类知识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四、女性研究学术发展的特点及其面对的困难

从妇女在学术界表明她们对知识问题的关心与不满开始，至今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从最初的想法到现在妇女在学术界业已确立的地位之间的差别近乎于一场革命。女性研究的发展及其独特的认知方式，构成了对学术界中一些权力范型及其影响的挑战，而实际上学术界中女性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探讨传统的知识形成的实践和它的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学者们发现，传统学科对妇女和妇女经验的无视，与其说是这些学科本身的疏忽和失误，

还不如说是传统知识的形成过程本身存在问题。知识如同一种产品，总是有其制造者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凭空产生的知识，而那些对制造知识负有责任的人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种种远离客观和公正的学科知识，正是这样一种男性群体的产品，他们的主观性、个人偏好、优先权和特权影响着知识生产的全部过程。从跨学科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学科知识对妇女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而所谓对妇女的认识也是那些根本不关心妇女生活与妇女现实的男性构筑的。而对这种疏漏，以及学科主流对任何改变知识生产方式尝试的抵制，妇女们不得不发展一种在整体上和在特定学科中改变知识构筑方式的战略，依据学科的具体情况及其接受改造的可能性，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技巧来研究与解决问题。随着女性学者从新的角度、运用不同于以前的方法、依据女性研究理论对学科原有问题进行阐释与分析，得出与此前不同的结论，并由此形成新的研究重点与方向，女性研究的知识体系也随之逐渐形成，以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心理学，以及女性主义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等种种标识和论著。女性主义学术知识的成就蔚为壮观，这里无力对所有这些学科门类中的女性主义学术给予描述和分析，然而它们在形成过程中却有着共同的目的和框架特征，其弱点与缺陷似乎也有着某种共同性，这里不妨对此略作分析：

（一）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具有明确的目的与责任

首先，女性主义学术实践的中心原则是确保其服务于

妇女的利益。从一开始，西方国家的女性研究就被贴上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学术武器”这样一个有着明确政治色彩的标签。女性研究中知识构成的思想体系与大学中知识构成的指导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学院式的模式宣布对知识的追求是出于知识自身的缘故，而那些将知识诉诸笔端的人不过是公正的记录者而已，对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群体并不负有责任，而女性研究的思想体系则是利益的宣言。女性研究的目的是使妇女成为有关她们自身生活的权威，依据她们作为妇女的准则构筑关于妇女的知识，并通过这一知识的形成与发展，使妇女摆脱从属的、受压迫的地位。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与传统的思想体系不同，女性研究明确宣布对自身领域所形成的知识负有责任，宣布凡以女性主义名义生产或给予改造的知识必须经受严密的考察，必须服务于妇女的利益并为发展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作出贡献。

103

女性研究之所以对其学术成就具有责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学术、社会 and 妇女团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在学术界的妇女和社会团体的妇女之间有一种伙伴关系，有时学术妇女也是社团中的积极活动者，社团的活动也推动了女性研究的发展，有时还成为其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女性研究的学术建筑在学术与社会的交流上，它公开声明的意图与学院中通行的价值准则相悖。在校园中，女性研究学者一直在与对她们活动的抵触斗争，并始终在为女性研究的计划寻找稳定的、可以获得资助的安全场所，她们试图为妇女知识的构成找到位置，以便使改变课程、建立联盟和分享资源的工作能够不受妨碍地进行。而这一

切都需要有利于妇女的社会运动和社团活动的支持，倘若在国家 and 全球背景中，没有基层妇女组织的理论、行动主义和勇气，目前这种女性研究激增的状况肯定不会出现。

女性研究的责任感还表现在作为教师和学者的个人所付出的无偿劳动，女性研究领域中的教师和学者通常都来自其他科系，有着本已很沉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事女性研究对她们来说更多地是一份责任和义务，这些额外工作始终是女性研究学者生活的一部分，她们为女性研究筑下一块块基石，并保持和加强着这一领域的工作。

这种责任感还表现在其学术成就方面。女性研究学者通过打破旧的知识体系中的成见、偏执和歧视，为社会公正地看待妇女和不断提高妇女的地位而工作。以工作在法律领域中的学者为例，自从走进这一领域之后，她们的工作就导致了对法律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挑战：如法律表而上的中立，法律关照妇女时假意的偏袒，特别是在刑法和家庭法中。女性学者认识到法律在妇女所受压迫中所起的根本作用，并同时认识到法律可以被用来为妇女的利益服务，至少它可以阐明在剥削和压迫妇女方面，父权制是怎样进行运作的。女性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为改变法律中的性别歧视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些斗争导致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特别是诸如强奸、家庭法、同工同酬等方面出现了有利于妇女的改进。例如，加拿大、美国、新西兰都接受或部分地接受女性学者的建议，对有关强奸的法律进行改革，将婚内强奸也视为犯罪；家庭法中对于妇女在家庭内无酬劳动对家庭财富的贡献也给予了肯定。

（二）改变知识形成模式是女性研究在学术界的使命之一

在评价女性研究对知识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时，很明显的一点是，由于女性研究的影响而导致的知识构成方式的变化。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能力“构筑”知识，然而在传统上只有少数人有权决定哪些知识将归属于文化，而哪些不算。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特权集团，在西方社会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主宰者，比如在科学革命之前，只有教会的神父才有权决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此后，科学的世界观在与旧的信仰体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形成了“科学方法论”的标准，宣称只有一个真理，指出科学的真理是通过对客观现实的充分论证所揭示的。

女性学者指出，有些科学的结论形成于一种线性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无疑，就这种模式所产生的高精尖技术，以及从飞机、微波、计算机到核能、生殖技术和基因工程等广泛的科学技术产品，证明它确实是一种有着高生产率的方法与模式。但是，像所有的观点一样，这种科学的观点也暴露出它的疏漏和不足。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事物与现象是线性的因果模式所不能解释的。例如，在过去10年中，生态学与环境研究就对科学方法的能力提出了质疑，生态学家断定，我们要试图解释的这个世界要比简单的因果模式所断定的更为复杂、具有更多的关联性。在对传统科学世界观的挑战中，在从客观性和一个真理到一个负载更多的价

值标准和更多元的世界观的转变中，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事女性研究的人们与其他一些曾属于屈从地位的、处于社会中盲点的群体一道开展的对知识形成与发展模式进行变革的运动，不盲从于那些已成定律的东西，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

（三）从一个真理到多个真理——女性研究自身学术发展的写照

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曾经被排除在有关人类的知识之外，与这种严重的偏见相对峙，女性研究者坚持认为，仅仅根据客观现实而得出的论断未必就无懈可击。她们指出，正是科学领域男性化才产生了妇女智力低下的论断，因此，有必要在知识生产中建立一个更好的、更综合的多元模式。而过去 20 年内学术界中多元真理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女性主义学术发展的结果。女性主义坚持不止有一个真理，不止有一种历史，不止有一种法律解释和不止有一种社会学的说明，这些主张冲击的正是传统科学观点的中心。从初次进军学术论坛，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便坚持在自己的研究中包容妇女的经验，坚持结合传统体系中未予记录过的观点和价值标准，这对于学术传统是一种坚定的批判。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在女性研究中，单一解释的概念自然而然地遭到摒弃，对于从不同经验中引申出多样的、富于变化的解释则予以支持。不仅是趋向于多样性，趋向于可能存在着多个真理，女性研究还倡导形成一种更具流动性的认识状态。因此，即便是有众多的真理，

也仍被视为昙花一现，仍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这也是为什么设想女性主义是一种可以到达的境界是不适宜的，因为女性主义不是单纯固定的概念，它宣称自己是一个发展与变化的宪章。没有单一的女性主义的政纲或女性主义的政策，而是众多的学者与活动者都包含在运动、计划和研究的全世界的多样性之中。

（四）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包容尽可能多的变量

处于女性主义知识构成中心地位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和动态的研究模式。这一模式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获得好处，并在学科中打上自己的印记。女性研究提倡这样一种见解，即人类经验是多向度的。某个人可能是一个特定统治群体中的一员（如是一个白人、受过教育、身体健康），而在同时又是一个受支配，被剥削的群体中的一员（如女性），因此，主要的工作不是确定和排列一系列的等级制的压迫，在各类经验之间划定界限，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的女性研究，转向追溯众多经验来源之间的交叉，并标示其循环。这一方式超越了传统的分界，它强调持续的交流，同时对学科有着更深远的含义，即学科间的、跨学科的或多学科的方法将是受欢迎的。

女性研究学术技巧的一部分是包容所有的变量。它不仅试图包括所有的矛盾，甚至试图将研究者的变量也引入研究中，发展这样一个知识构筑形式可能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和更困难的实践，它要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探讨问题，而不是在一个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这样一种目标的确定是与女性研究的思想体系相一致的。

(五) 仍然面对的困难

虽然女性研究可能对新的认知方式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西方学术界中的等级制度并未得到彻底改变,它的主体仍然由 WHIMM 组成,即白种的 (white)、异性爱的 (heterosexual)、内部的 (inside)、中产阶级的 (middle-class) 男性 (men),他们有权宣布什么是正确的和有价值的。在这一合法化的政治体制中,已经处于内部的人蔑视外人或他人的研究成就是相对容易的,业已确立的知识构成模式要比最近形成的女性研究模式有着更高的权威和合法性,男性仍然把持着知识权威的垄断权,“像男人一样思考”仍是一句溢美之词,而“像女人一样思考”则是难以接受的侮辱。双重标准在合法化的政治运作中起作用并渗透到学术团体中去,它阻止了女性学者与那些男性认定与学术目的不相宜的群体、项目和机构建立联系,然而学术界中的妇女保持这种联盟,对于她们超越自身经验的局限是至关重要的。

科学的中立地位尽管受到了女性研究知识发展的威胁,然而西方女性学者认为,它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力量与影响,而只要它继续占据统治地位,这种思想体系就要驱使制度将妇女置于不受欢迎的地位上。显而易见,那些从事男子心理、社会和政治活动研究的男性总是被标榜为学者,而那些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妇女的心理、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女性则被称为政治鼓动者或是好事之徒,这种对妇女生活经验和研究的种种歧视和怀疑,妨碍了女性研究对学术界的理论与实践产生影响。

此外，由于女性研究领域中从不追求建立权威的理论体系，而是关注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尊重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见解，因此，尽管呈现了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但在客观上也造成过去几十年的女性研究理论始终缺乏完整性，使学术界的妇女难以采取统一的战略。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对这种不连续和不完整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如何，这种情况对于女性主义学术工作者结成共同的联盟，在学术界中壮大自己的声势与实力，并对学术知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构成一种瓦解的力量。

总之，女性研究在学术界发展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困难，而一些女性学者工作的重点正是研究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或是迂回于这些障碍，同时它还要顶住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压力，这需要女性主义学者们的努力与协作，还需要时间、耐力、良好的道德观与才干。

第六章 新的课题与新的挑战

——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研究的发展

自从席卷欧美大陆的第二次妇女运动的高潮以来，女性研究已经成功地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大量增加，女性研究的机构普遍成立，女性研究的课程遍及各个国家的大学和学院，女性研究从最初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教育手段，到今天已经发展为有着一定理论基础、有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有着十分宽泛的研究课题、有着大量学者与学生参与，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的独立的研究领域。然而面对今天的成功，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并没有陶醉其中，她们认为，如果仅仅将 20 世纪妇女在政治舞台和学术舞台上的崛起作为一个成功的故事来对待，便会贻误它的发展，而考察它的现状，分析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便成为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西方女性研究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

一、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女性研究的概况

(一) 学科间的研究活动继续增长

在女性研究学者进入学术界的初期，由于她们不能像其他男性学者那样，在自己所处的传统学科中获取知识营

养和对学术活动的支持，因此她们最主要的生存方式之一，就是在各自的科系之外建立核心小组，形成自己的知识网络，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以这样的方式，女性研究在单一科系中的虚弱状况得以转变，而在不同知识领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女性主义分析方法，使她们的研究更加富有成果和影响力，因此女性研究采用学科间的方式就成为它的重要特征之一。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女性研究的跨学科方式不再仅是一种生存战略，更是应和了其研究内容的需求。在学术界中，女性研究的最初目的是对现存的学科门类中父权制内容和假说提出挑战，而这种挑战在各个学科中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不同的。比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学研究中，很难想象没有女性研究对父权制文化的批判，这一批判对该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女性研究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同时，在一些相对新的学科中，诸如电影和电视等传媒手段的研究，女性研究的工作不仅产生影响，甚至形成了该学科的中心日程，因为对明星、体裁和观众的研究几乎都将性别作为一个分析的中心点。正是由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使女性研究者不仅仅在传统学科内部进行批判性研究，更渴望突破学科的界限，确立自己的跨学科的自主地位。

在女性研究领域的外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学生对学科间的女性研究课程的需求形成了一种新的市场力量，使不少西方国家教育机构对其给予越来越多的支持，女性研究的课程稳定增长。从这一教育机构方面的变化和女性研究的近期成果中都可以看出，在 90 年代，女

性研究正发展为一个跨学科的焦点，女性学者运用不止一个学科的方法来分析材料，表达见解，有的研究问题甚至是各个学科都不接纳的，这些工作无疑动摇了传统学科的分界。

在这样一种向学科间研究发展的总的趋势中，也出现了一些令女性研究学者忧虑的问题。英国女性学者 B. 坎贝尔在她的文章中就提出，将市场原则引入教育会引发一对矛盾：一方面，女性主义学者一直反对资本主义价值标准与实践向自身机构的扩展；另一方面，如果学生需求意味着女性研究可以兴旺繁荣，这又不失为一个积极的副产品。^① 引起女性学者产生疑问的还有这样一些问题：女性研究领域是否存在边界，哪一种理论框架更适宜女性研究，还需要什么样的机构变革来支持这一学科间的工作，集中与分散各有什么优势等等。然而尽管尚有这样一些有待明确的问题，女性研究学科间工作的创新仍然为该领域向新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动力。

（二）女性研究呈现多中心的发展趋势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理论派别中的“三大家”，多年来在女性研究的政治与理论日程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由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较早地确立了自己的门户，其根基相对稳固，因此从历史上讲，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之间

① Campbell, Beatrix, 1992, "Feminist Politics after Thatcher". in Hinds, Hilary (ed.), *Working Out: New Directions for Women's Studies*, p.14,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产生更多的争论。

这两个流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她们对妇女从属地位的研究中有不同的侧重点与解释。激进女性主义思想主要从针对妇女的暴力、男性对性行为 and 人类繁育的控制出发，分析妇女所受的压迫，将男子视为从妇女所受压迫中获得好处的集团。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强调资本主义在重新产生性别不平等中的作用，分析妇女在阶级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妇女的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

女性研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许多新的思想和研究成果纷纷出现，使人感到妇女所面对的问题要远远复杂于女性主义思想通常划分的这样三种观点，于是各个学派开始进一步的分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形成新的支派。激进的女性主义也划分出革命的、同性恋的和分离主义等等不同分支。甚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要求对自身作更进一步的定义，这一流派一直将改变法律与教育制度，使妇女获得选择与自由的权利，从而实现男女平等作为其信念。然而许多并不标榜自己为自由女性主义者的人也在现存制度中挑战，并进行成功的变革实践，可见超越“三大家”已经成为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必需。

使用上述三种观点将女性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观点进行分类一直存在问题，其一是它难以表现纷繁多样的女性主义思想与理论；例如生态女性主义、妇女和平运动以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都很难被归入女性研究课程的通常类别中。这些分类标准还造成了人们对此形成的刻板印象，并造成对其他女性主义著作缺乏分析并作出机械反应。僵硬

地将女性主义思想划分为三类实际上忽视了女性主义特征的转移和多样化,事实上,一个妇女在其生活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身份,即便在同一时间也可能关心着不同的问题,她可能会对性行为与暴力问题持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而在看待有酬劳动方面又接受了社会主义原则,或是游离于各种思想之间而不归属于某个类别。

以同样的分类方法,所有的黑人女性主义者的著作都被统一到“黑人女性主义”的类别中,而这似乎暗示白人女性主义思想是复杂和多样的,而黑人女性主义只构成一个单独的类别,抹杀了其思想的多样性,将它推向一种边缘化的地位,成为相对于三个中心流派的其他类别,这是有悖于女性主义运动的初衷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研究学术著作的激增,使得以少数观点作为划分其类别的方法越来越不恰当,许多学者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打破这种划分方法,她们将涉及妇女生活的,而在以前是截然分开的一些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性生活与有酬劳动。这种突破旧有框架的研究方法形成了90年代女性研究的一种趋势,它提醒人们对旧的分类模式进行思考,不要试图将新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著作硬塞进那些现存的、并不恰当的分类模式中去。

二、面临的挑战和新课题的形成

在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学术发展成功地走过了二十几年之后,20世纪90年代呈现给女性研究学者们的,不仅仅是她们在学术界业已确立的地位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同

时还有严峻的问题与挑战。这些问题除了女性研究一向所面对的制度上的局限、资金与资源的缺乏之外,对于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挑战是那些具有广泛知识背景、来自领域内部与外部、对研究主题的性质、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知识构成方式的分歧与争论。

有些女性主义学者将 90 年代看作是自省与怀疑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她们对女性研究项目的生命力感到信心不足,似乎女性主义的全盛期已经过去,有的学者甚至用“绝境”和“危机”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自身的处境。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女性研究在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兴盛发展后,并未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女性主义方法,以及对女性主义分析和女性主义政治学普遍有效的结构,初期研究的重点,即男性对妇女行使权力的方式,由于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妇女群体的差别而变得复杂化了,像从前那样以一种相同的方式讨论妇女问题已变得不再适宜了,因此认真地探讨与应付所面对的挑战、发展女性研究的新的课题已经成为这一领域发展的关键。

115

(一) 对“差异”问题的研究

差别与差异的概念是女性研究领域运用得最为频繁的概念之一。但在开始,研究的关注点是男女之间的差别,目的在于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妇女的从属地位,为争取男女平等而斗争。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妇女之间的差别开始引起注意,而这一问题的提出,对女性研究的未来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

有关妇女之间的差异,西方女性研究学者认为其中包

含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对差别的认识，这涉及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重要事实，即并不是所有妇女的生活都是以相同的方式所建构的，或是必然采取相同的形式。不同点与相似点都必须在研究中给予考虑，尤其要对妇女并不共有的特征与环境给予注意。理解差异的第二个要素是变化，即使在妇女表面上以相同的方式生活的地方，她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体验也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妇女被指定承担母亲的角色，然而由于其个人历史与文化定位的不同，这一角色对个人或对家庭的重要性与意义是不同的，因此“变化”引导人们注意经验的不同层次。

对女性研究的课题而言，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批评引导其认识差异的重要性。首先是来自非裔美国妇女和英国的黑人妇女的批判，她们认为，一直以来女性研究只为欧洲血统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讲话。她们指出，大量女性研究的文献与学术成果对黑人妇女都是视面不见的，并存在某种程度的种族歧视，她们还常常举例说明女性研究是怎样压制黑人妇女的观点，并无视她们对围绕压迫问题所进行辩论的贡献，因此她们的研究课题与资料很难找到进入女性研究工作主流的途径。

其次，将焦点集中于种族和种族歧视并不是关注差异的惟一方式，研究注意力向阶级、“异性爱主义”、伤残人和老龄等问题的转化，都对妇女产生了意味深长的影响，使她们懂得了如何正视自己、面对他人，以及认识妇女所能拥有的机会与可能性。就这方面的学术工作而言，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妇女与发展”研究的增长就是一例。在不同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妇

女经济与社会经验的区别与差异，强调妇女生活中家庭、工作、民族与公民身份的多重意义，这一工作启发并扩展了西方黑人妇女所发起的批判与辩论。

第三，还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女性同性恋者一向要面对的异性恋主义和对同性恋的憎恶，女同性恋者批评女性研究以草率的方式对待同性恋问题，并始终冷待这一问题。她们指出从女性同性恋角度观察问题的意义，并认为在讨论差异问题时，女性同性恋研究的发展是认识性行为之差别的一个重要途径。

有关差异的论争不仅仅限于学术界的女性研究领域，它早就在妇女运动的政治中有所表现。例如，在有关阶级差别的辩论中，在母亲与单身妇女不同的地位问题上。差异对妇女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这一点的认识尽管已逐渐地渗入到女性研究领域，然而直到 90 年代，女性研究的主流才开始认真与确切地对它进行分析。“差异”对于女性研究有着这样一些含义，首先，它对根据少数妇女的经验所作出的一些普遍性和概括性论断的合理与否提出质疑；其次，它削弱了形成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初期特征的同性、共有、姐妹情谊的温馨观念；它提出不能再简单地看待和分析妇女的从属性。差异的挑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各种各样的压迫势力建构与协调着妇女的生活经验，对男性的屈从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而且妇女不仅仅是不同的，有些妇女还能够依仗自己在这个纵横交错的压迫体系中的地位，对其他妇女行使特权。因此，尽管所有的妇女会受到压迫，然而她们并没有分享一种共同的压迫。

差异问题对于女性研究的挑战是严峻的，它使“妇女”不能再作为一个类别的概念来运用，以无条件的措辞谈论妇女的压迫和共有的姐妹情谊变得十分困难，女性研究探索社会的方法和妇女们在政治上团结起来的基础被动摇了，因此，如何克服对妇女单一的孤立的认识，将她们置于各种差异之中来考察，在更为全面和多元的基础上推进女性研究的发展，成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研究学者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二）性别研究与男性研究的发展

女性研究的主导观点是，这是一种将妇女置于分析的中心，并以妇女生活经验作为基础，来讨论妇女所受压迫的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这一观点近年来不仅受到差异性观点的挑战，同样也受到性别研究的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中使用“性别”来取代“妇女”一词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比如在英国，一些十分明确的女性研究课程现在则被冠以“当代英国的性别问题”等诸如此类的标签，女性研究中心纷纷改称性别研究中心，《性别研究》、《性别与社会》、《性别与历史》等新的学术刊物不断涌现，书商与出版社也将此作为一种市场战略，他们相信“性别研究”与“女性研究”相比较，更有利于吸引广泛的读者，从而增加利润。

这一趋势的另一个基本方面是，学术界对研究男性气质和发展男性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这类研究的理由是，虽然从历史上讲，男性一直是学术研究与探讨的主要课题，然而对他们的关注并未被赋予性别意义，几乎没有对

男性的社会建构进行过直接研究，仿佛男人的天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诸多品质对认识社会生活毫不相干。这些学者认为，一段时期以来，妇女生活与经验得到了详尽研究，现在是对男性从事类似研究的时候了。

从女性研究的角度而言，性别研究和探讨男性气质的社会构成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毕竟，男性始终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了解他们的角色、态度和观念，对于认识妇女所受压迫和从属地位，以及这一压迫的运作过程都是有帮助的。然而西方女性研究学者也还指出这一趋势存在的问题。首先，她们认为，以性别一词代指有关妇女的研究工作让人感到含糊不清，并且由它单独代表妇女的合理性让人表示怀疑。不说是公众而言很难理解，即使是从事学术工作的一些学者，也会将这一名词误认为是某种医学研究的分支。其次，性别一词在今天更经常地用在性别关系或性别体系的背景中，然而大量的研究工作只考虑性别之间的差别，而忽略了差别所造或的不平等。因此，有些女性学者认为，不加说明地使用“性别”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似乎男女两性的利益现在已合为一体，在考虑性别关系时，无需正视男性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是如何在特定环境中被用来压迫妇女的。

性别研究的问题与女性研究的自主与整合关系密切。对于那些主张将女性研究与主流学术研究整合的人，通过性别研究似乎可以更容易地实现这一目的，因为性别研究增加了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像女性研究那样，被某些人理解为一个有限的研究领域或是出于少数群体的兴趣。另一些女性学者则反对这种整合，希望保持女性研究的学科自

主性。她们提出女性研究保持一种边缘地位具有战略意义，它可以减少这一学术领域在学院中被同化，或是将女性主义以一种缺乏政治色彩的形式进行包装和推销的风险。

总之，在不否定性别分析和男性气质分析的意义的前提下，如何使这样一种发展得到协调，使之不在政治上对妇女的概念和女性研究项目构成危害，是摆在女性研究领域面前的新的课题。

（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近年来，有关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与女性研究的关系，以及对它们各自的影响的讨论进行得热火朝天，这并不仅仅是一时的风尚，其中确实有需要女性研究认真对待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与现代思想直接相关的启蒙思想的挑战，尤其是对理性与科学的探索可以为知识提供一个客观的、可靠的和具有普遍基础的信条发生疑问，并对理性本身具有超常的普遍性的信条提出质疑。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蔑视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学说，认为它们随时会受到对现实有着不同解释的其他学说的挑战，他们提出应抛弃对普遍性的探索，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摆脱了普遍理论的公式，更重实效、更特别、更关注事物的来龙去脉和更具地方色彩的探索。

各派女性主义学者曾以多种方式对后现代主义作出反应。例如，专心致力于制定政策，希望在西方人文思想与社会结构中改善妇女地位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后现代

主义不屑一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表现出与后现代思想的明显对立，她们认为，社会理论中的后现代主义导致了性别、民族与阶级概念的分裂，导致了对父权制、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相关性的否定；也有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于女性主义和女性研究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在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它们的关注点甚至是相同的，如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对现代思想中的宏大理论和元叙述进行批判，女性主义采取这一立场是因为这些理论家对性别视而不见，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他们的唯理论与本质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十分重视文化建构问题，而对其分析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它们同样偏重考虑差别与差异的问题，这导致它们对一些固定概念的批判，诸如自我、真理、性行为、科学及压迫；两者都在探讨理论与分析思想和严肃的社会、文化、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设想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并从事引发这一变革的政治活动？然而女性主义学术和后现代主义并非以相同的方式对待这些问题或得出类似的结论，只是二者都将这些问题作为其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尽管有这样一些相关之处，后现代主义思想仍然对女性主义和女性研究提出了一些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而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知识层次上和政治领域中。

121

首先在知识层次上，虽然女性主义一直对男性学者的宏大理论进行批判，然而女性学者也时常为自己所创造的、建立在女子特性类同基础上的元叙述感到内疚，这一点可以在女性主义将父权制作为一元的体系理论化，或是

讨论劳动的性别分工，而未对其历史和社会特性给予重视的工作中得到证实。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论点会加强和进一步支持这样一种主张，即从历史角度讲，女性主义和女性研究项目已经过时了，因为它的前提放在一个一元的主体——妇女身上，而这一主体已经不存在了。更为值得思考的是后现代主义对女性研究基本命题的挑战，女性研究将性别看作是大多数社会文化经验与实践中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现象，而且性别关系是不断产生不平等与剥削的根源。后现代主义思想则怀疑性别在社会与个人存在中有真实的基础，它强调个体自我的分裂，人的多重身份，以及这些身份从话语的多重性中表露出来的方式，这使女性主义的结构和一维的说法难于立足，否定了将性别作为有意义的和共有的社会政治类别的观念，从而对女性主义和女性研究存在的理由及合法性提出疑问。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女性研究不仅造成知识层面的挑战，还造成了政治方面的威胁。首先，由于后现代主义对于基本社会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及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分析提出怀疑，女性主义学者由此陷入这样一种困惑——我们如何推行解放的计划，这一计划正是由对男性权力、特权及压迫的分析所支持的，如果不再可能以一般的词汇对不平等进行概念化、分析和理论化，那么女性主义将很难找到从事政治活动的途径和应采用的形式。后现代主义断然否定了任何富有成效的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它还分裂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联系，而这一联系正是女性主义知识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其次，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所感受到的一个更直接的挑战是，大多数后现代主义思想

家对女性主义思想和活动所表示出的敌意，这即表现在他们对女性主义学术本身的轻视，也表现在他们语言与论点中不时流露出的厌恶情绪和大男子主义。

总之，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既有亲和、交融的基础，也有对立和分歧。与不断涌现的理论流派碰撞是女性主义思想在学术界发展的必经之路，可以说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产生正是这种碰撞的结果。而作为女性研究，这种理论的丰富和多元化可能会带给她更多的观点、话语和课题，但也会对这一研究的总体目标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如何趋利避弊，既保证女性研究为全体妇女的最大利益服务的根本方向，又吸收其他理论的营养，全面地推进它的发展，将是摆在西方女性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四）女性主义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中的问题

123

差异问题、性别研究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引导女性研究的学者们重新思考和反省自身所从事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思考女性研究领域的恰当论题，以及对其概念化并进行深入探讨的方式。

在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的初始阶段，女性学者所着力分析的是妇女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鉴于在其他理论文本中妇女是不存在的，这些学者特别关注以一种普通的术语将男女之间关系的结构性质理论化，正是由于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这一历史特性，它在面对差异问题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时候，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处境和理论走向：女性主义理论可以并应该有什么类型的研究项目？对不平等的结构性质的探讨是否应见好就收？生产具有普遍性知识

形式的尝试是否应予放弃？在澄清一些概念于不同环境中对不同的妇女有不同的意味之后，是不是仍有可能使用这些概念，比如父权制？什么样的理论类型可以被证明就分析和政治角度而言都是有用的？澄清这些问题牵涉到女性主义理论未来发展的战略，而且女性主义学者根据一段时期以来的经验也愈发意识到，严密关注其他知识领域中的相关理论讨论，对于保护女性主义的中心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在女性研究的学术工作中，学者们面对的形势同样严峻，这主要是来自认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女性主义一直反对对合理性、理性和客观性等观念的偏重，反对那种两分法的阐述，诸如理性与情感、现实与幻想、客观性与主观性、心灵与肉体等等，因为当其中的前者得到褒扬与肯定时，后者往往被贬低；女性主义还怀疑科学的所谓中立性和清白无暇，她们寻求改变我们对知识的认知，以及对其产生和取得合法地位的途径的看法，她们提出存在与知晓的可选择形式，尤其强调主观性、情感和经验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女性主义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可以在有关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论辩中了解到。她们还试图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等级关系，通过将过程、冲突与矛盾结合起来的技巧来冲破研究的固定模式，这一度被宣称为构成了新的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然而现在人们对这种说法已多少感到有些失望，这是因为，目前有关女性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多数集中于数据收集和研究实践的道德标准等问题上，而不是在方法论本身。此外，许多女性学者使用和提倡的方法并非是她们的专

利，而是所有良好的研究活动所包含的一个部分，有些研究手段仍是植根于主流学术形式之中，并未脱离其传统模式。因此，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在衔接其认识论与运用技巧方面，存在着差距，开发以妇女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对未来战略与对策的思考

尽管女性研究领域面对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多数女性主义学者仍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她们坚持女性研究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玛丽·埃文斯指出：“妇女仍然被付给相当于男子 3/4 的工资，仍然被政治权力所排斥，这正是因为妇女与男子之间的物质差别和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因此我主张保持女性研究和妇女类别的使用。”^① 她的观点代表了多数女性主义学者的立场。的确，从性别角度探讨种族歧视、阶级差别、异性爱至上、残疾人问题以及各种不同的压迫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问题对妇女生活构成重要影响，因此，女性研究对此具有当仁不让的责任。只有在女性研究领域中，这些因素才被认识的框架所包容，而女性研究方法也是惟一个不仅探讨性别之间差别，并进而认识这一差别所包含的不平等的方法。对差异性的认识并没有否定以妇女为中心的观点所具有的必要性和力量与活力，女性研究项目将妇女置于学术分析

125

^① Evans, Mary, 1991, "The Problem of Gender for Women's Studies", in Aaron, Jane and Walby, Sylvia (eds.), *Out of the Margins*, p.67, London, Falmer.

和研究成就的中心地位上，仍然具有无限的生机。

正是出于使女性研究领域不断发展和面向未来的目的，西方女性学者十分严肃地看待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乔安娜·德格罗特和玛丽·梅纳德在她们的“面向90年代”^①一文中，认真研究了从事差别的女性研究的战略，她们认为首先要使每个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负起责任，确保认识差异性的要求被满足，此外她们还应警惕有特权的妇女代表或是代替别人讲话的危险，这就要求将“倡导”和“占用”之间的区别弄清楚，前者包括鼓励和出版来自不同妇女群体的观点和见解，而后者是对其他妇女的原始材料进行重新加工和限定，并进而归为己有。认真地对待差异性，还需要认识差异性的所有方面并非都是相同的，如果用相同的理论、经验或政治方法来对待，它们各自的历史特征、当今构想和现实意义都将被抹杀。

在女性研究中强调差异问题还要防止走向偏向。首先，要认识到揭示所有妇女生活环境的重要性，还要注意不能以此来代替克服女性研究工作自身的歧视与偏见，也就是说，由黑人妇女讨论种族歧视问题，与女性研究领域自身检讨其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中的种族歧视同样重要，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其次，虽然了解不同妇女群体的生活经验是必要的，然而仍然要关注特权妇女的生活。鉴于妇女生活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形式，因此女性研究除集中于男权问题的研究外，各种妇女群体之间的关系，

^① De Groot, Joanna and Maynard, Mary, 1993, "Facing the 1990s". in their (eds.), *Women's Studies in the 1990s*, p.149,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某些妇女对另一些妇女行使权力的方式同样也是中心的课题。

对差异性的全面认识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应停留在对经验、身份和认同问题的描述上，或是追求更多的实证工作以及增加妇女群体的数目，对女性研究来讲，更为重要的工作是探讨差异性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观察它们在妇女特殊生活环境中的相互关系、分歧与冲突，并进而使之理论化。

谈到理论问题，德格罗特和梅纳德指出，尽管后现代主义对宏大理论叙述和使用这一方法的部分女性研究著述提出批判，然而女性研究不应就此抛弃所有的理论。理论具有超越个人的直接经验，将妇女从属地位的各种状态进行系统化分析的能力，它还可以引导人们注意压迫发生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与矛盾，并进而启动政治分析和决策过程，根据变革的可能性来指出前进方向。因此，理论在女性研究的政治生活和学术生活中都是重要的，而为了应付后现代主义对宏大理论的挑战，女性研究似乎应采用一种“中级”（middle-order）方法为宜。

她们对这种“中级”理论作了几点说明：首先，这种理论方法即包括归纳法的使用，也包括演绎的过程，它为考察和推敲已确立的理论框架中派生出的概念与观点提供经验环境，同时也鼓励从分析新的经验或重新观察旧的情况出发来形成新的观点和概念。其次，这种理论的含义是超出纯粹描述和经验归纳，形成理解框架，它包括抽象观念。而这种观念可以准确回溯到其赖以形成的资料。这种理论关注的不是广泛的历史归纳，而是对社会机制的认

识。最后，这类理论还有着合并成更为广泛的理论网络的潜能。“中级”理论克服了大理论过于普遍化的倾向，它使经验与分析建立起联系，它还为研究各种不同的错综复杂的妇女生活提供了机会。总之这种方法有助于女性研究形成其认识论与方法论标准，为其理论发展提供了特别的途径。

德格罗特的文章提出了女性研究在应付差异性 &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时可采用的对策，这些对策是建设性的，然而远未穷尽。女性研究作为一个业已确立的研究领域有着良好的学术实践活动，它对与妇女相关的一些学术论题作出过重要贡献，这种好的学术传统使人确信，它一定能吸收并发展适宜的理论和方法，成功地克服问题和应付挑战，为创造妇女的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第七章 妇女与和平

女性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变革，在于为妇女创造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因此，除了在学术界取得一席之地，为改变知识的形成和传授方式作出贡献外，一些与人类生存本身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和平、发展以及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成为女性研究领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方面。这些方面既有其学术特色，又与全球范围内的妇女运动联系紧密，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

“平等、发展与和平”是联合国妇女十年的主题。1985年在内罗毕“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上通过的《到2000年为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中明确提出：“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对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和人民的自决、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合法权利以及和平生活于其疆界之内的权利加以尊重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条件下，才能充分有效地促进妇女的权利。”这是一份由妇女参与形成的文件，因此其中有关和平的阐述可以说是世界妇女有关和平的思想与观念的总结。

一、人类和平是妇女始终不渝的追求

人类自古至今，不管其组织形式如何，也不管他们栖息何处，都在为获得和平的生存环境而斗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即使是保持一个国家之内的防卫与和平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而国家之间的和平更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点。1945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和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结束之际，渴望和平的人们以成立联合国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共同努力，防止战争灾祸和创造公正和永久和平的愿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落实这一宣言却成了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民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灾祸仍然威胁着这个星球，紧张、敌意和威胁常常成为形容某些国家和地区之间关系的最确切的字眼，军备竞赛刺激着一些国家开发和生产更大规模和更具杀伤力的武器，人类已经具有了摧毁自身的能力，那种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平等相处的和平却不知在哪里。

在今天，人类虽然已经迈进了21世纪，冷战业已结束，然而小规模、地区的和国内的冲突仍时有发生，军事大国和地区性军事组织动辄以武力手法干涉别国内政，联合国在敦促与保持和平方面的作用不断受到动摇，人们对于和平与环境及人类发展的关系日益关注。长期和平研究的结果还使人们意识到，各种形式的、在人类社会各个层面上出现的暴力是和平的中心问题，而和平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在于它是全球各种问题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总和。让

人略感欣慰的是一种时代的认识正在从模糊走向清晰，这就是，所有的人民——无论种族与肤色，不论男人或妇女——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是同一生物种类。

这一时代共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 20 世纪 60 年代达到高潮的这次妇女运动，凭借联合国妇女十年的推动，使妇女的声音和形象日益凸显于国际政治舞台上，在那 10 年当中，妇女的活动日程成为全面和平的综合纲领，她们不断地敦促国际社会作出更人道的选择，反对战争并为社会正义和人的权利面斗争，这些都为形成当今积极的和平概念和形成使所有人过上自主生活的人类社会的基本条件有所贡献。与男性不同，妇女始终相信、竭力证明并奋力争取可以取代战争的选择。妇女的观念，她们的奋斗、痛苦、挫折是和平斗争的本质所在，是一种具有多重特征的普遍愿望。一直以来妇女都反对在人们之间划分等级，由此而合理地排斥和压迫另一些人，在她们为争取与男子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平等的同时，也强调对男女之间各自独立和差别互补的认识。总之，妇女坚持以真正人类平等的名义给予各种人的差别以尊重。

国际妇女运动、联合国妇女十年以及女性主义思想在学术界的深入和发展改变着国际社会对妇女的看法，使人确信，为了保证对妇女的公正和人类的生存，需要妇女充分和平等地参与人类生活的所有事务。而女性主义思想中对差别的积极关注，对当今时代和世界未来都有着根本的影响。妇女的政治和学术活动生动地证明着“平等、发展与和平”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妨碍实现这些目标的全

球问题也是错综复杂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引导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带来了一种处理公共事务和全球问题的可选择观点。此前在决策中很少被注意到的妇女观点，现在成了民意调查的主要对象，依据性别对数据进行分析也成了非常普遍的事情，来自人类另一半人的看法构成了对世界和人类状况的新鲜的、有生气的、综合的和建设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和妇女们解决问题的行动给予了人们更多的希望，要减少武装冲突、消除贫困和保护地球。在妇女眼中，和平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没有战争，或是战争间的某段时间，它要更为广泛更为丰富，而和平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妇女，依赖于她们是否获得了最充分的解放，依赖于她们的和平观和防御观能否实现。

二、妇女对和平的理解与评价

和平没有一个简单和普遍使用的定义，由于人类文化和视角的不同，他们对和平的看法和体验也是不同的。然而有一种认识越来越明确，即和平并不仅仅是战争的对应。和平活动者认为，减少和消除战争是一个需要永远努力来加以实现的目标，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不容懈怠的。消除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手段、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目标，只有在人们不断地为获得公正的、可行的和持久的和平而斗争中才可能实现。多数的人们也会赞同，只有当地球上所有的人民都感到公正和公平，当所有国家与民族都认为它是可行和可接受时，这样的和平才会是持久的。和平似乎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合

成物，它使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更为公正并增进了一些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团结。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群众运动以及公民个人都在从事着和平的日常工作，为和平的实现而努力，而妇女则站在这一工作的最前列。

和平是一个被众多的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努力长久追寻的目标，其意义必定是广泛而深远的。内罗毕战略明确指出：“和平有赖于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略、军事占领、干涉别国内政，有赖于消除支配、歧视、压迫和剥削，以及消除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公然大规模侵犯。和平不仅指国家和在国际上没有战争、暴力和敌对行动，而且还要在社会上享有经济和社会正义、平等、所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内罗毕战略，第13段）仔细阅读这一战略，我们还可看到，在妇女眼中，和平还代表了人民与国家之间基于信任、合作和相互尊重彼此利益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所有关系。和平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即地球是一个独一无二、相互关联的体系，有着一个共同的未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同属一类，有着相同的基本人类需求，有着充分的人的尊严，有权实现所有的人的权利，并分享世界未来的共同利益。这种认识呼吁那些为和平而斗争的人为一种人道的和平等的全球社会环境而工作，这种社会环境满足人类需求，遏制暴力和保护地球。人类社会的种种暴力活动大多来源于不平等，贫穷则妨碍了对人类最基本需求的满足，不公正和不平等构成了对人的权利的粗暴干涉，而这些都是紧张与猜疑，进而发展为武力冲突的基础，今天的武力冲突则是对这个星球未来的潜在威胁。

和平的实现需要人道的和公平的全球社会环境的形成，和平的实现要求使所有人都充分、公平、普遍地享有人权，和平的实现除了对个人的权力要给予关注外，还要求对人民的集体权力给予重视，尤其是人民拥有一个健康环境的权力和拥有一个权利与自由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环境的权力，这种环境的特征是以宽容、尊敬和认真的态度去理解差别，确立一致性与信任，使冲突不以诉诸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而且这些特征有赖于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妇女与男人之间的公平与平等。

正如内罗毕战略所指出的：“妇女十年的三个目标：平等、发展与和平是范围广泛、互相联系又互为补充的目标。因此，达到一个目标就有助于达到另一个目标。”（内罗毕战略，第9段）在妇女运动和女性研究所形成的文件中，平等不仅仅是通过法律消除各种各样的歧视，还包括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平等参与和承担平等的责任。发展是国际上通行的消除贫困和获得经济活力的手段，它与和平有必然的联系。发展应该是一个寻求克服不平等与歧视的过程，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克服这些不平等与歧视。从和平的角度而言，发展的目的应当是满足人的需求，这一需求包括人的生理需求，以及人们的社会、知识、美学和精神发展的需求，这样的发展还将有助于保护健康的自然环境。不发展，平等就不能实现，没有平等与发展，和平也就是一个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同样，和平对于前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妇女的和平运动始终在寻求证明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对这些联系的理解是为实现人类完美的生存环境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世界和平与妇女利益攸关

联合国妇女十年之所以选择和平作为它的主题之一是有充足理由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是战争的必然结果，妇女对战争从来是深恶痛绝。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妇女还对自身在战争中所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看到自己有能力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此外当今妇女对有关和平与防御问题的决策影响显著增强，这尤为世人所瞩目。

妇女是战争的受害者，这是毋庸置疑的。妇女以她们的传统角色，如家务主持者、母亲等等，往往在战争期间备受苦难。她们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家中的老人和亲人因缺衣少食而受煎熬，许多人流离失所，因为男人们去打仗，妇女要照料农田和幼子，而且，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父亲、儿子、兄弟的情况更会使妇女内心的创痛长久难以愈合。有关的研究还证明，由于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大，妇女们还要承受贫穷和必要生活用品的匮乏。而另一方面，的确有相对较少的妇女在战争中直接参与战斗，却几乎没有妇女可以参与是否进行某场战争的决策，或是制定将军事力量置于人民需求之上的政策。然而如果没有妇女对于建立和保持战争能力的贡献，战争也难以进行。在战争期间，妇女往往承担着支持她们本国军队作战的任务，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妇女在军队中服役，更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担负着为战争服务的其他工作。在战争中，妇女支撑着“大后方”，照料伤员，保持经济运转，给予她们的丈夫和亲人战斗的力量。

妇女卷入战争似乎支持了战争的延续，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妇女无法摆脱不平等、贫穷和压迫的总体结构。有研究者指出，做母亲的经历使妇女先天就更偏爱和平，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而是有史以来妇女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使她们比男性更深切地体味了战争的痛苦和导致的沉重负担，比男性更公开和热切地渴望和平的降临。

人类倾向于对那些他们投入了关怀和努力的事情给予较高的评价，他们还更为关注他们负有责任的事情，男性决策者给予工业生产和军事生产更多的优先权，这至少是因素之一。在决定一个人是否具有侵略性方面，生理学的因素是应予考虑的，但是任何一条自然法则都不能决定这种侵略性必然具有暴力的或是破坏性的特征。因此，应该承认，男人和妇女在对待和平的态度与观点上的差别主要是社会习得的，而不是生理学的因素导致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妇女和平运动有这样一首歌，歌曲的名字是“我不养子当兵”，然而社会的现实是，妇女养育的所有子女都要服务于社会，其中必然包括从军服役，没有哪个妇女养育子女是为了被杀害或是去杀害别人的孩子，他们也不应去破坏什么或是被什么所毁灭，由此，妇女的切身体验与利益成了她们推进和保持世界和平的强有力的促进剂。所有国家的、社会中各阶层的妇女都是国际间理解与和平的倡导者，主张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协商解决国际间的差别与冲突。不管她们属于哪个国家和什么民族，在人类生活和人类生命的延续中妇女们的角色是一致的，因此她们更容易友好相处。战争导致的饥荒使非洲妇女的乳汁干涸，核武器的遗患至今影响着许多母婴

的健康与健全，战争破坏妇女的健康与生育的能力，威胁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延续，而保证这些权利不受侵犯是妇女共同的责任。虽然并非所有妇女都会成为母亲，但发展和保持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要素，则被所有妇女视为自己的使命。

随着妇女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她们在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更多的妇女了解到和平、平等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战争对社会造成的最大破坏是对妇女日常劳动的破坏，妇女保卫和平活动的基础是要保卫她们生产与劳动的成果，以及人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妇女以小组、地方社团、大型国际组织、国际运动等形式，成为世界和平的积极、有效的促进者和社会秩序的保卫者。她们将对和平的要求与非常具体的社会需求、发展的需求和解决全球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些需求产生自妇女们对世界的看法，产生自从最古老的地方传统到最新的全球环境状况。

妇女的传统角色和社会经验使她们对和平有着特殊的评价，这虽然很明显，但还不足以说明妇女与和平的利益攸关，有关妇女与和平问题的最新学术研究，涉及性别歧视与军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将研究的问题集中在将妇女排除在外的权利与政治结构的范围，这是从妇女的经验探讨和平问题上升到从女性研究观点出发探讨和平问题的标志。因为女性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寻求根本的政治变革，期待给予妇女更多的政治机会，而不是将她们禁锢在传统的角色上。

女性学者有关战争、和平与文化研究的文献大致有两类。第一类，一些女性和平研究者将战争研究与和平相联

系，这些人中包括 E. 博尔丁、B. 里尔登（1985）、R. 艾斯勒和 B. 布罗克-厄特尼，也有另外一些作者论述有关妇女与和平的问题，如 L. 卡甘和 B. 埃伦赖克等。另一类，有一些女性学者的文献并不直接与和平有关，但是因有助于女性和平研究者的工作所以被她们频繁引用，例如 C. 吉利根，她的著作《以一种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1982）已经成了许多和平研究者的检验标准，她们从论证妇女独特道德发展的角度，证明妇女比男性更倾向于和平。

四、女性研究学者对人类安全前景的看法

就世界范围而言，妇女视她们自身的解放和充分的平等为人类安全的根本，妇女有关人类安全保障的观点在内罗毕战略中被阐述得淋漓尽致：

和平有赖于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略、军事占领、干涉别国内政，有赖于消除支配、歧视、压迫和剥削，以及消除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公然大规模侵犯。

和平不仅指国家和在国际上没有战争、暴力和敌对行动，而且还要在社会上享有经济和社会正义、平等、所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和平有赖于尊重《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和其他国际文书，以及各国之间不论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都能互相合作和谅解，也有赖于各

国有效实施本国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标准。

和平还包括一整套活动，反映出人们对安全的关注以及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信任的默契。和平既保卫自由、人权和人的尊严，又体现对他人的善意和鼓励对生命的尊重。在经济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基本人权和自由受到剥夺，广大人民遭到肆意剥削，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并存在着剥削的经济关系的情况下，和平是无法实现的。没有和平与稳定，就没有发展。和平与发展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男女平等、经济平等和普遍享有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可以促进和平。要使人人享有和平，就得让妇女能够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行使参与她们本国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权利，特别是参与决策过程，同时行使她们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方面持有主张以及言论、信息和结社的自由。（内罗毕战略，第13段）

139

上面的论述总结了妇女的和平观，解释了妇女对可靠的和综合的全球安全的定义，它为人们展示了女性主义探讨和平问题的框架，这一框架来自于女性学者对和平问题的分析和女性和平研究者以更建设性和综合的词汇来限定安全的尝试。比如女性学者 M. 斯特恩曾做过这样的论述：如果人们从消极的和平和积极的和平之间的差别可以获得灵感和选择的话，他们也就可以开始以一种新的方法审视安全的概念，通过将消极的和积极的价值标准赋予安全的概念，人们可以开发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用来分析

对安全意义的不同的解释，……消极的和平和消极的安全依赖于阻止一个破坏性实体的存在，而积极的和平和积极的安全则基于寻求一个创造性实体……。^①

消极安全的概念源自于传统的“权力政治”范型，并以威慑物的取得或保持为前提。这意味着安全来自于通过另一个威慑来消除所面对的威胁，或是通过另一种威胁来从一种威胁中获得保护。安全成为两个消极威胁的总和，因此可以称为“消极的”安全。消极安全的一个日常例子是，人们购买家庭用枪支以便在他人犯罪中获得自我保护，也就是说通过拥有威慑别人的手段，人们感到更加安全。

140 消极的安全意味着以具有同等威慑力的手段，或是更具有威胁力的手段来抗衡或反击面临的威胁，因此，根据消根安全的逻辑，国家防御的概念就是一个拥有抗击任何所面临的军事威胁手段的国家——有着高水平军事防御能力的国家。

与此相反，积极的安全观念试图通过究根寻源，找出根本——诸如核武器的存在来消除威胁。它不主张以一种附加的威胁来抗衡事实上的威胁，由此，积极的安全具有了取代消极安全的积极价值。它警示着消除威胁的起源，而不仅仅是抗衡这一威胁，意味着消除灾难的同时，还要有效地消除灾难的根源。

女性主义的防御方法寻求以积极的共同安全的条件克

① 转引自 Reardon, Betty, 1993, *Women and Peace: Feminist Visions of Global Security*, p.2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服和化解对和平的威胁，这种为全世界人民寻求共同安全的努力正是典型的妇女和平行动，这些作为女性主义防卫观点基础的行动和观念，正是从妇女的工作和经验中得到鼓舞的。

妇女的传统角色决定着她们要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在生活中是多面手，这些有助于她们形成一种宽泛和综合的和平与安全的观点，这样一种观点对于主导当今国家和国际安全防卫政策形成过程的那些观点提供了有希望的选择。正如人们在内罗毕战略中体会到的，妇女将和平视为安全防卫的最有效途径。甘地的名言：“没有通向和平的道路，和平就是道路”，这是对妇女安全防卫观点的最佳总结。和平为人类社会中关爱与养育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和资源，而战争和战争准备则破坏资源，限制和扰乱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出于对积极和平的期盼和追求，妇女倾其全力在私人范畴和公共领域，从街区到国际体系的各个社会层面上从事着和平运动。妇女的和平行动正被由目前世界秩序构成的对现实的严重威胁所激励，她们的运动宣传了她们的安全构成的观点，她们认为所有地球上的人民对于自己的生活可以有四个基本期待。

这四个基本期待是：

第一，期待我们的星球将能够继续维持生命。尽管科学家警告臭氧层被破坏得十分严重，可能会难以恢复，它造成对人类免疫体系的严重危害和皮肤疾患的增多；森林的采伐减少了地球的氧气供给；贫穷和工业滥用污染了水源；武器试验破坏了大气层等等。尽管如此，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开发仍在持续，而人类用于保护自身安全而

开发的各种武器，当被用于战争或是尚在开发试验的过程中时，其潜在的后果正威胁人类自身的安全。

第二，期待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将得到满足。之所以是一种期待，正是鉴于今天世界上更多的人陷入贫穷，很多地区的人民得不到清洁的适于饮用的水、住房、足够的食物、基础教育和任何类型的健康保健，通货膨胀猖獗，失业增加，流离失所的儿童充斥着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街道，而受害最深和最为之焦虑的正是妇女。

第三，期待人的尊严与完善将会受到尊敬。个人的福利以及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不会被地方、国家或全球层次上的传统习俗、社会结构或政治政策所妨碍。1979年2月，第34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列举了迄今仍在世界各地流行的妨碍妇女个人福利的现象，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发展，用于国家防务的武器生产，常被用于为种族主义、否定民族群体的个人福利与发展的压迫体系服务。

第四，期待地球上人民的生命与福利将不会因不平衡的防务政策、战争准备和武装冲突的结果而受到伤害。然而，在一个高度军事化的世界中，地方冲突频仍，每天都将死亡和苦难强加于无辜的平民，以及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年轻生命。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众所周知的几次地区性战争夺去了难以数计的人民的生命，使成千上万人沦为难民，周边地区生存条件和环境极度恶化。蓬蓬勃勃的常规武器交易刺激了这些冲突的泛滥，并掠夺式地消耗着资源，置人民维持最起码生活标准的祈望于不顾。技术武器竞赛与高精尖武器的开发，进一步加剧了与社会民生

所需的资源争夺，而且武器生产与交易增加了武装冲突的升级，它不能为人们对安全的企望提供保障，而只是侵蚀了这种期望。^① 这些期望一直是联合国报告，有关发展、人权、环境、安全等宣言的焦点，然而它似乎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认真对待。

不管怎样，妇女和平运动和首创精神，号召人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满足于构成真正安全的这四个基本期望。她们的行动有助于指出，人们必须在理解自己与他人相互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一种综合的方式克服这些希望的绊脚石。只有当人们理解了这四个期望和由于破坏这些期望而引发的其他全球问题之间的联系，才能使这个世界，与生活其中的人民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安全。

143

五、妇女探讨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特点

有些女性研究的学者指出，妇女对和平与安全的看法和她们所推崇的实现途径，为真正公正的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提供了最大可能性。妇女对社会关系和经济需求的探讨，指出有一些能力是最急需的，这就是每个人自身发展的能力和改善人类社会生存机会的能力。许多人相信以妇女的经验和作为养育者的技能，有可能产生出新的政策以保护地球和供养生活其中的人民。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大都存在着严格的角色分离，妇女的活动常常被限制在私

^① Reardon, Betty, 1993, *Women and Peace: Feminist Visions of Global Security*. p.2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人范畴中，而男性则活跃于政治经济的公共领域。这种分隔使私人范畴中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女性特征的协调和调解冲突的方式，这些方式不仅维护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对群体的健康与发展作出贡献。妇女在承担其家庭角色中所形成的各种技巧与能力一直十分有效地在家庭的范围内使用，然而在公共领域这些技能却被忽视或被拒绝。女性研究学者论证说，这些技巧与构成其基础的价值准则，可以成为建设一个更安全和更人道的世界秩序的工具。实质上，这正是使妇女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对安全含义的限定和参与决策过程的理由。

女性学者还指出：妇女所注重的对他人的关照，可以为人们指出改变经济结构的途径，以便使这一结构具有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女性对关系的关注可以协助人们维系全球相互依存的体系，为所有人民共同努力实现共同安全寻求基础，特别是那些正处于冲突中的人民。妇女实现建设性和解的丰富经验，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战争体系，寻求公正的、创造性和积极的解决冲突的方法。

要更清楚地了解妇女参与安全政策的形成何以产生这些明显的区别，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特定的女性特点。这些特点显示妇女对和平进行概念化的途径，并影响着她们追求和平所采取的行动。此外，有四点与安全防卫问题特别有关，即妇女整体地看待和平与防卫问题的倾向；妇女坚持安全防卫话语的非神秘化；妇女以尊敬和和解消除对手武装的方法；妇女已被证明的增人资源效用的能力，这些无疑都是实现全球安全的基本要素。

女性学者坚持，整体论应该成为考虑安全问题的基本

框架。妇女的和平之路依据于对联系的认识，而不是将若干问题隔离开来。单一地强调“武器控制”、把和平步骤割裂起来进行，关注单个武器体系的特点和特殊的冲突趋势，这些标志着当今分析安全问题的特点，这是人们从旧的国家安全防卫观念中摆脱出来的障碍。妇女坚持从全球角度考虑问题，观察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正视对武器的普遍依赖，在将世界作为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基础上从事和平工作。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妇女通过消除敌意，通过帮助处于冲突中的人们看到冲突是一个共同承受的问题，相互都会有损害，卷入的各方都受到威胁等等形式，致力于使对抗者放弃对抗。她们帮助人们认识到冲突的根源并不完全归因于某一方，也可能归因于某种关系，解决冲突既要找到症结所在，又要找到某种非破坏性的解决方法，应客观地将冲突作为一个共同承受的问题来考察，必须重新调整关系以便预防引起冲突的问题出现。

145

解除对手的武装一直被看作为取得成功和解的途径，至少对冲突中的一方而言。作妈妈的常常以这种方法平定孩子们之间的打斗，告诉他们“放下武器”，也就是放下那些他们相互威胁和相互伤害的物件，尤其是放弃他们的怨恨、怒气和敌意，让他们认识到伤害的行为必须被双方所了解和相互求得原谅。这种母亲协调家庭中争吵的方法和“拉起手来成为好朋友”的教师解决学校中打斗的方法，与当今国际冲突中提倡宽恕与和解并非相去甚远。这些解决方法的基础是认识到，冲突中一方的生存与福利有赖于另一方的生存与福利，它们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而整体的健康与安全有赖于它各个部分的协调状况，这种认

识会引导人们相信合作要比冲突对大家都有好处。

“协同作用”代表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它可以使整体的力量比分散力量之和更为强大，这也是妇女一直坚持的行动模式。正是用这种行动模式，妇女力求以有限和不断减少的资源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当今世界资源极度消耗的情况下，妇女的这种行动模式是应被人类所采纳的。

语言的神秘化和安全防务政策的保密排除了大多数公众参与安全政策制定的可能性，而将军事防卫的话语非神秘化，并公开国家的防御政策，也一直是西方妇女和平努力的一个明显特点。

总而言之，上述的这些特点都是源自于妇女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决策方式，同样也是她们寻求和平的方式。女性学者宣称，如果人们寻求实现真正的全球安全，就应了解这些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和平运动和安全政策制定的工作中去，它们会有助于阐明当今安全防卫争论的狭窄和局限性问题，并证明思考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选择性方法的可能性。

第八章 妇女与发展

就一般意义而言，发展是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源、技术和专业知识被充分调动并相互结合，从而促进某一地区的经济增长。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发展还可以被看作一个控制的过程，有着一些不宜明言的设想和额外的含义。也就是说，发展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过程，被发展代理人、地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企图所驱动。

那么妇女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活动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用一位巴西妇女的话来讲：“我们是人口的一半还要多，我们还是另一半人的母亲。”作为母亲和照料者，作为生产者和农民，妇女的工作支撑着她们的家庭和她们的社区。然而就整体而言，妇女的劳动常常是无酬的，即使有，也远远低于男性。此外妇女占世界文盲人数的 2/3，妇女而临日益增多的各种程度的暴力，每年还有几十万妇女死于或间接死于怀孕和分娩，因此，就世界范围而言，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仍然是最贫困的人群。

一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方法倡导经济增长，主张减少国家的作用和对公用事业私有化，然而在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方法并未改善妇女的生活，却常常使她们更加贫穷，她们的工作负担增加了，社会地位反而降低了。

强加于债务国的结构调整措施，如取消补助，提高食品价格，减少政府服务，这些尤其对妇女产生影响，甚至有的国家通过性旅游业的发展使剥削妇女合法化。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妇女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对她们生活的影响是致命的。

将性别的意识结合进发展的努力仅仅是 20 多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说直到 70 年代初期，“妇女”才作为一个有特色的区别性范畴在发展思想中凸现出来。丹麦经济学家 E. 鲍塞罗普的著作《经济发展中妇女的作用》^①可以说是一个标志。不应否认的是，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一些社会运动所积聚的能量及其创造的氛围，也使国际环境更易于接受鲍塞罗普这种对发展的批评。这些社会运动包括，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南方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发达国家中反对阶级和种族特权的斗争，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国际妇女运动，在西方国家中出现的第二次妇女运动的高潮，它们共同发起了对一些最基本原理的挑战与批判，这些原理在当时是作为支撑和划分社会科学、政策话语和个人经验的基石与准则的，这一挑战使发展理论进入了反思、重新评价和转变方向的时期。

148

一、走入误区的发展战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若干年中，随着前殖民地国

^① Boserup, E., 1970,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家的独立并随之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发展被看作一个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过程，或简称作“现代化”。追随北方发达国家的模式，新兴的国家被鼓励通过工业化来克服贫穷，富裕的发达国家或前君主国通过注入资本和技术支持来提供发展援助，其主要着眼点放在一些基础设施和机构上面，从学校、医院到机场和饭店，使这些国家逐步地转入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和工业化的社会。最初设想通过现代化的过程，发展的好处将逐渐惠及社会中的所有群体，而贫穷将缓慢地被消灭。

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弊端逐渐明显。虽有很少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而多数国家却未能获得好处。在那些社会等级制度牢固的国家，现代化并没有解决不平等的问题，相反却使之更为严重。在有些地区，引进的农业种植技术确实增加了粮食作物的产量，然而只是少数土地占有者受益，真正辛苦劳作的人并没有获得好处。在国家一级的水平上，如以印度为例，在它的国家范围内确实发展起了一些现代工业化的飞地，富裕了少数人和城市精英，而大多数农村人口仍处于极度贫困之中。

在这些发展项目中常常反映出对劳动的性别分工，家庭中收入与资源分配的种族中心的偏见。项目设计者不加思考地照搬西方中产阶级的家庭模式，诸如结成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和孩子们组成家庭，丈夫作为一家之主负责养家糊口，妇女则操持家务、照料孩子，并通过某种工作换取收入补贴家用。此外，设计者还设想作为一家之主的男子如果获得土地和农业投入，就会使家庭的其他成员也随

之受益。而实际上,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作物的主要生产者是妇女,她们通常是被排除在土地改革之外的。在一些工业项目中也有这种情况,发展项目实施的结果往往都是使妇女更加依赖于控制家庭现金收入的男子,同时并未减轻她们支撑家庭生存的责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许多发展项目都归于失败,或是未能完全实现其目标,很大原因是由于计划者忽视了当地的社会与家庭结构,这一结构与西方的模式是有着明显差别的。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单纯依据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战略(如结构调整计划)未能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问题,甚至还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副作用,其中之一便是使穷人更加贫困。通常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最贫困者总是那些妇女作为一家之主的家庭,她们除了要对付贫民们要面对的其他困难之外,支撑家庭的女性还要与对妇女不利的社会传统做斗争,这些妇女的家庭往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她们难以获得充分的营养、干净的饮用水、遮风避雨的住所、基本的教育或初步的保健服务。

在传统上,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发展计划都是一种中性的,或者说是无视性别的,也就是说不含有任何性别的意识。部分原因是由于此前缺少有关妇女和她们对地区经济贡献的信息,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援助组织的管理者对性别角色问题所知甚少,其结果是妇女被发展问题边缘化的趋势与日俱增,发展的计划者仅仅将妇女看作为社会和保健服务的被动受益者,没有认识到她们在社会中所具有的积极的生产作用,并将她们结合到发展计划中去。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发展项目的目标群体也常常是

一些无性别的范畴，如“小农户”或“乡村贫困人口”，而在计划者的心目中这些群体都是男性，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中的多数是妇女。发展项目的结果对男人和妇女有潜在好处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设想，而实际上发展的结果常常以增加收入和节省劳动力等形式给男性带来好处，对妇女来说，则是增加了无报酬的工作负担。作为一种矫正方法，一些发展组织启动某些特殊的“妇女项目”，而有些女性学者认为，如此一来妇女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被更进一步边缘化了。

上述情况使发展援助机构，包括世界银行，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条原则，即发展必须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过程。因为人民既是发展的工具也是发展的目的，由此人力资源的发展应该处于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地位，其他的一切，包括经济增长、财政政策、汇率管理等等不过是达到改善人民福利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此外，还应该给予充分注意的是妇女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151

二、女性研究领域中的发展研究概况

西方女性研究领域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对第三世界国家妇女问题的研究正逐步兴起。鲍塞罗普的著作发表之后，最初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而到 1978 年左右，大量的研究工作开始启动，科学论文、著作、会议报告和各种类型的政策文献纷纷问世。早期的研究虽然主要表现为开展调查，停留在描述和实证的阶段，但却起到了揭示妇女生活的现实这一重要作用。

比如有些调查结果指出了妇女在经济领域里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而她们的劳动却是无酬的，因此难以衡量等等。除了定量的调查，传统的深入定性分析也在发展，揭示妇女在地方社区中的作用，如家庭户、村庄、城市贫民区、工业就业妇女等等。虽然在这种小型研究的基础上很难作出概括性的结论，但这些对妇女活动的初步调查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详细资料，甚至还有一些研究项目涉及全球问题，如国际贸易和经济对女性劳动力的构成和流动性的影响等，这些资料为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后，女性学者为了获得当地社会背景中性别角色更为全面的画面，采取了将有关文化、家庭、社会等级、阶级中的亲属关系和性别结构的小型深入的研究，与基于大量取样的家庭调查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相配合的手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结合，推动了发展和社会经济变革的概念的形成，指出这一变革过程依赖于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断整合，这是一种与单向度的和偏重技术的发展概念形成强烈对比的观念。女性研究还以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形式介入发展领域，她们在全球基础上收集和记录有关妇女的实际经历和经验材料，这样做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科学意义。她们将定性研究方法稍加修改后加以运用，比如参与性观察，开放式或半结构型访谈以及各种偏重行动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将妇女仅仅作为观察的客体，而是作为平等的伙伴，通过研究项目了解她们的需求和愿望。因此可以说，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不仅仅在于数据的收集，而是致力于开发和解放妇女自身的资源，提高她们对自身处境的认

识。在偏重行动的项目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妇女更是作为平等的伙伴来确认相关的研究课题，并寻找解决妇女从属地位问题的途径和手段。

无疑地，联合国国际妇女十年对推动这类研究的发展功不可没，几次联合国妇女大会和为这些大会进行长期准备的积极作用也不可低估。1975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城的大会上宣布了妇女十年的开始，正是这一事件促成了1978年前后有关妇女与发展的科学研究报告和普及读物的猛增。1980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妇女十年中期会议上，联合国秘书处采取措施，通过世界各个地区的公开数据，收集有关妇女生活状况的统计信息，这一举动标志着对全球妇女生活处境进行描述的第一次尝试，此后会议宣言中对妇女生活状况作了具体的总结性论述。

与联合国的官方努力并行的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会议，围绕它们的活动表现出了更强的推动力。这些会议有些是由基层妇女运动发起的，然而却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女性研究者和妇女政治活动者的广泛接触与合作，其发展的最高形式是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形成。1985年内罗毕联合国妇女大会的同时，约16000名妇女相聚在论坛，从政治、科学和教育等方面对妇女的生存状况进行探讨。到1995年北京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一论坛已发展到了空前的规模。这些基层运动的推动力不仅对妇女觉悟的提高和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程度产生影响，而且对女性研究领域里新的研究战略的形成意义深远。从国际妇女十年开始，相关的研究中心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相继成立，并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发展起一些网络，女性研究也不

只是单纯地关注妇女受剥削受压迫问题，而是将视野扩展到反对种族歧视、阶级统治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

三、发展研究中的性别概念与性别意识

发展运动中的妇女，不管她们是以科学的形式、政治的形式或是其他形式，已经使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妇女是发展中的强大的人力资源，她们在世界劳动力中占据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却未被重视，以及她们所处的非常不利的经济地位和工作环境。妇女的活动遍及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各个部门，然而由于她们在人类繁殖和养育照料子女方面的作用十分突出，也就由此产生出一个错误观念，即由于妇女具有养育后代的生物本性，那么妇女终生承担照料家务和家庭内的劳动似乎也成了自然的生物结果。

错误的刻板印象是思想的陷阱，并必然导致不合理的行为。比如这样一种现象，即妇女虽然在事实上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然而却常常被作为少数群体来对待。在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中，这样一些短语随处可见，比如“这是为妇女、青年和其他社会群体准备的”，或“为妇女、儿童和残疾者”，似乎身为女性无异于忍受着某种不可改变的残疾，而妇女也正是由于“生物原因”而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和边缘的地位。一般来说，家庭中劳动的性别分工包括了生产与繁殖两方面的活动，然而凡是与维持或延续日常生活有关的家庭内部的劳动，大部分都由妇女承担。在家庭之外，那些有可能会产生经济收入的活动则主要由男

子承担。这种劳动的分配以及对由劳动所获收入的权利分配，显而易见具有社会的性质而不仅是生物特性所决定的。

如果说从生物角度而言的“性别”对妇女来说是一种命运的话，那么从社会角度讲，“性别”代表了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中地位的特征，性别关系是由构成男女生活机会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这样的性别划分并不决定于生物学，而是构成更广泛的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方面，它还是植根于生产与再生产的条件中，并由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体系所控制。女性学者认为，性别概念使我们可以将男女之间以生物为基础的性别差别与社会赋予的男女差别，或他们实际承担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决定的差异区别出来，前者是不可改变的，而后者是可操作的，可以因政治或舆论的影响而改变。

155

四、女性研究领域所倡导的发展战略

除了进行一般的理论探讨之外，女性研究的学者还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以便解决发展计划与妇女问题相结合的途径问题，尽管在这方面学者们的意见各有偏重，然而其基本思路大致如下。

首先，女性主义的发展观点强调，发展计划的所有合作各方，包括提供援助组织的所有部门，以及受援国的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門都应将性别意识放在足够重要的位置。同样，在一个项目周期的各个阶段，对性别问题都不应有丝毫的忽视。当然，在项目计划的最初阶段充分考虑性别

问题尤为重要，在项目预算、招募适宜的工作人员和对地方妇女进行组织与培训等方面，尤其应予性别方面以足够的优先考虑，更应积极尝试了解地方妇女的所想和所需。

其次，应该不间断地收集有关性别问题的相关数据，在预先评估阶段做好基础研究，以便获得项目开展地区有关性别的系统知识，在大量参考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探讨研究项目和进行预先评估，将有助于确保设计中的项目与当地的社会与文化具有最大相关性。在项目周期的后续阶段中，即计划运作、落实、检验和影响研究的阶段，对性别范畴的问题应予持续跟踪调查，组织收集相关的信息文献，以供未来的项目参考。

一般而言，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发展项目官员主要是由男性组成，并偏重于接受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培训，相关合作国家的专业人员和地方官员，以及评估队伍的人员也是如此。女性学者指出，男女项目官员的均衡分派，以及在技术与管理人员之外补充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专家，会极大地改善发展机构在计划中考虑和正确处理性别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也需要学习如何有效地运用他们的技能，以及如何与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配合工作。

在许多国家的发展项目中有这样一种趋势，即将妇女问题归于社会服务部门的管辖范围内，而不是让她们在农业、计划和财政金融等部门中有足够的地位。发展机构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努力地改变这种趋势，支持各个部门开展与妇女有关的工作，使妇女得以全方位地参与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地区发展委员

会和其他类似机构的工作，妇女的角色特征和活动范围与当地男性往往是严格分开的，并被排除在有关发展决策的政治领域之外。妇女需要也渴望与地方政府和管理机构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希望获得有关发展纲领、机会和过程的信息，而发展机构应该积极地支持这种要求，让妇女和妇女组织在所有涉及发展计划和管理委员会中有足够的代表和充分的发言权。

受到女性研究中倡导差别的总趋势影响，在发展问题研究中女性学者也指出：发展项目的计划工作中，不仅要考虑男人与妇女处境之间的差别，妇女之间的差别也要给予考虑。一般地提及“妇女”是不现实的，因为年龄、在家庭中的地位、种姓、阶级等差异都会影响妇女参与发展活动的的能力。妇女的社会地位要比男子更易受到家庭结构的左右，这意味着认真仔细地权衡家庭状态中的变量，对于考察项目对妇女潜在的和实际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妇女从来不是单纯的妇女，她们是女儿、孩子的已婚母亲、未婚母亲、外来劳动力的妻子、岳母或者是寡妇。依照这些不同的身份，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力、自主性、责任、义务和工作负担等等也是不同的。因此，发展工作者不应简单地了解一个项目会怎样影响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还应了解她们的家庭角色会怎样影响她们对项目的参与，那些一味增加妇女的工作负担，而对她们的生存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发展活动应予避免。凡是极大依赖于妇女劳动力的发展项目尤其应该在计划和管理职位中给予妇女一席之地，并付给她们应得的报酬。对于减轻妇女工作负担的发展活动应予鼓励，对于有助于节省家务劳动的技术应给予

优先发展。女性学者认为，通过具有性别意识的发展计划，各方面的管理者便可以有机会动员起巨大的发展潜能。

五、从福利到赋权——方法与思考

具有性别意义的发展计划应建立在对妇女利益和实际需求的了解和认识上，女性学者认为妇女的需求应分为“战略的性别需求”和“实际的性别需求”。战略的性别需求是要改变妇女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谋求更合理的社会组织的形成，而实际的性别需求是根据妇女在现存劳动分工中的状况提出的。例如，足够的住房和洁净水的供应就是那些低收入妇女的实际性别需求。尽管这种需求会影响到全体家庭成员，但由于它们与妇女对于家务工作的传统责任有关，因此常被定义为“妇女的需求”。

女性发展研究者倡议，发展组织或援助机构在确立某种发展政策或是项目目标时，应当意识到这些不同的妇女战略需求和实际需求，同时采用不同的处理发展中妇女问题的模式。相应地，这些模式对妇女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女性研究学者将这些模式总结为以下几种方法：

（一）福利和平等的方法

20多年以前，鲍塞罗普的《经济发展中妇女的作用》出版，这是公认的有关“妇女与发展，或发展中的妇女”的第一部文献。鲍塞罗普以独具性别意识的眼光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发展历程，她将妇女从妻子和母

亲的角色局限中解放出来，看到并强调她们是重要的生产力并在农村经济中发挥活跃作用。鲍塞罗普的著作开创妇女与发展研究的先河，有着它不可否认的地位与作用。然而随着女性主义发展研究的深入，这一最早的文本也因它的局限而受到批判，如女性发展研究者指出，鲍塞罗普的全部论述与分析都是追随当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现代化”而进行的；还有的学者指出，她的著作没有充分注意到构成妇女从属地位基础的妇女家务劳动，以及殖民地环境中资本积累对妇女的影响，而这两个问题在鲍塞罗普之后成为妇女与发展领域中两个十分重要的研究主题。

现代化，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是一种模式，它试图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技术转让、资金援助等手段来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经济，而经济增长将逐渐地根除贫困。在这种发展的设想中，妇女或是被忽视，或是被视作家庭或社区的一部分，或是作为福利的对象。用于经济增长的资金支持主要面对男性，而对社会中易受伤害的群体则主要给予生活救济，这些群体的主要成员正是贫穷的妇女，她们在缓慢的经济增长中几乎没得到任何好处。这种福利方法的根基在于妇女的传统角色观念，即认为为人之母和照料孩子是妇女最重要的角色，并由此确认妇女只是发展的被动接受者。福利方法是一种社会政策的方法，包括许多广为人知的发展援助形式，如母婴保健计划、计划生育服务、食品援助等等。在很长时间里，这种福利的方法是非常通行的方式，尽管它不能对妇女的独立与自主有任何帮助，相反可能会鼓励妇女的依赖倾向。但从政治的

角度讲,这种方法十分安全,它不会改变受援国的价值准则和妇女经济地位的现状,不会改变当地劳动分工的现状,因此在对地区文化和社会价值准则把握不准的情况下,援助国的政府或发展机构十分乐于采用这种方法。

到20世纪70年代,现代化战略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它既未消除南方国家的贫穷,也未使妇女从中获得好处,福利方法在改变妇女的状况方面收效甚微,这促使有关发展的思考开始发生变化。发展计划者和提供援助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保健、营养和教育服务的直接提供上。1980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就曾强调,保健、识字能力和营养状况的改善不仅具有其本身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体国民收入和贫困人口本身的收入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分析不仅仅一般地用于贫困人口,也特别应用于妇女群体,当时有一种主导性的观点提出,如果妇女的传统工作没有被看作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那么就应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将妇女的工作与发展结合起来,或至少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根据对GNP的测量,食品生产和服务的提供肯定会带来收入并为发展进程作出贡献,而要让妇女进入这一体系,教育、职业和技能培训被看作是一个基本前提,这就要求给予妇女与男性同等的机会。于是,全部问题似乎又在于一个平等的机会问题。这时还很少有人考虑,要将妇女结合进来的这个体系是不是正确的合理的体系,因此,1975年联合国发起的国际妇女十年,其主题就是“平等、发展与和平”。

联合国妇女十年为发展过程中妇女问题的探讨与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思考有关妇女的发展需求时,平

等的观点成了一个重要的准则，政策方法也与此相适应。女性社会人类学家 C. 摩塞（世界银行城市发展部高级城市社会政策专家）在谈到这种平等的方法时曾有这样一段论述：这种方法承认妇女是发展过程的积极参与者，承认妇女通过其生产及再生产角色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却往往不被注意的作用。其基本出发点是：经济战略经常给妇女造成不利影响，因而必须为她们提供就业和进入市场的机会，把她们纳入发展过程中……。但是，平等的方法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发展问题，还包括涉及平等的一些根本问题，首先是公、私领域及社会——经济群体之间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它认为造成妇女从属地位的根源不仅存在于家庭中，而且还存在于男女在市场上的相互关系中，因此，它强调经济独立是公平的同义语。^①

161

在女性学者看来，这一段对平等方法的代表性论述至少表达了三方面的含义：首先，它肯定了妇女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经济价值；其次，它承认发展方法对妇女的影响通常是负面的；第三，它提出这样一种论点，即追求平等将在市场中和家庭中改变这种状况。然而也就是在这里，平等的方法又因其两个重要的弱点而受到批判：第一，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方法；第二，这种方法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女性主义者对平等的主观见解。妇女十年的战略在有些地区未能达到其预想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种发展思想过于关注政府对于平等的运作和落实

① Moser, C.O.N., 1989, "Gender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 Meeting Practical and Strategic Gender Needs", 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 288 页，三联书店，北京，1998。

有关系,比如敦促政府增强对妇女权利的认识,同工同酬政策的落实,给予妇女平等的经济决策权,采取措施抵制传媒中表现的对妇女的传统偏见,以及改善妇女作为一家之主家庭的困境,所有这些都是在针对政府而言的,而不是赋予妇女自身权力来改变她们的状况。此外,平等的方法主张发展战略满足性别需求,并将发展与平等相联系,其主要目的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似乎对于主权国家的传统有所干涉,所以较为不易在政治上被接受。加之它在衡量标准上,和相关信息与数据在收集、交流与评估等方面有一定难度,妨碍了这种方法的具体操作。但无论如何,平等的发展思想是一个进步,它使妇女问题在发展运动中更加引人注目,内罗毕会议上制定的为提高妇女地位的前瞻性战略是这种思想的总体体现,这一战略为通过官方立法改善妇女地位的努力提供了重要框架。

(二) 反贫困方法和效率方法

对于除福利与平等之外的其他三种方法,女性研究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称呼,有的学者,如C. 摩塞称它们为反贫困方法、效率方法和赋权方法;另有一些学者将方法的变化归总为从“发展中的妇女”(WID—Women in Development)到“妇女与发展”(WAD—Women and Development)再到“性别与发展”(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的渐进。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反贫困方法。到20世纪60年代末,贫民中最贫困的人口仍然贫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妇女。同时人们也看到教育和职业培

训只为极少数的妇女带来了好处，而尚未惠及妇女的大多数，因此根除贫困成了一些发展研究者关注的主题。这种方法将妇女的贫困作为出发点，而不是妇女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这时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些重点项目，以及相应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都反映了这种发展思想，这一战略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援助来满足当地的食品、衣服、住所和燃料需求，低收入妇女被确定为特殊的目标群体，而她们往往是为自己家庭提供这些基本需求的重要角色。

反贫困方法还将注意力集中于使妇女更多地获得生产资源，如土地和贷款，来为她们创造收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贫穷妇女创造收入的项目激增，成为最普遍的发展活动形式之一，尤其是由非政府组织所支持的项目。许多这类项目旨在增加妇女所从事工作的生产率，比如小规模的市场和食品生产。在另一方面，这种创造收入的项目也受到一些批评，因为它很少考虑妇女已有的超负荷的工作负担，而且由于妇女不能控制家庭预算，她们也很难能有所积蓄。多数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行为是受到限制的，而创造就业与增长的非正规部门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从总体而言，人们常常对妇女创造收入的项目不寄予太大希望，但它为赋权于妇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有些项目在创造收入的同时还带来了其他的一些社会变化。

效率的方法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的衰退、结构调整政策出台，以及全球对增加效率和提高生产率的强调，198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文件和1989年英国海外开发管理局（British ODA）的政策说明都对这种方法提供了

注释。在世界银行的题为“世界银行有关发展中妇女的新方法”^①的文件中，“发展中的妇女”部主任巴巴拉·赫茨写到，我们想要表明可以切实地做些什么来将妇女包括进发展计划，以及这样做怎样有助于经济工作、减轻贫困和其他发展目标……关于发展中的妇女，世界银行采用了一种新的、更具操作性的方法……它强调通过妇女更有效地参与来增加经济生产能力，并将重点放在使妇女实际参与农业、教育、初级保健和营养的常规运作的途径上。同样，英国海外开发管理局的政策声明中也指出：妇女占穷人中最贫困人口的大部分，帮助她们可以为解除贫困作出重要贡献，妇女掌握着实现一个更富饶和更具活力的社会的关键，如果她们自己是健康的、有知识的，如果她们更多地获得知识、技能和信贷，她们在经济上将是更有生产能力的。^② 以上两段陈述在重要的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确信只有使妇女参与进来，发展才会是高效率的。同时它们还看到，对于发展来说，人力资源的 50% 并未得到利用，而是被浪费掉了。这一认识表明人们已不仅仅关注妇女本身，而将重点转移到她们对于发展取得成功的贡献上。这时发展计划者对于大量资金和资源未能实现预期的效果十分忧虑，这促使效率的方法很快成为对妇女与发展来讲较为适宜的模式。

① “The World Bank New Approach to Women in Development”，转引自 Mosse, Julia Cleves, 1993, *Half the World, Half A Chance: An Introduction to Gender and Development*, p.158, Oxford, Oxfam.

② Mosse, Julia Cleves, 1993, *Half the World, Half A Chance: An Introduction to Gender and Development*, p.158, Oxford, Oxfam.

效率的方法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运作。在发展项目中，由于妇女常常比男子更投入和更有效率，因此只要有她们的充分参与，项目往往更易取得成功。第二方面是在由政府推行的、由世界银行等组织支持的发展政策的层面上，它们同样要求结构调整计划要有效率和高的生产率。

效率方法在对妇女与发展关系的认识上是一个进步，但它是以为妇女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无酬劳动为代价，因此在满足妇女的性别需求方面还不是一个十分完美的方法。

在介绍最后一种方法之前让我们换个角度，从“发展中的妇女”和“妇女与发展”的思路看一看。“发展中的妇女”或多或少地总结了初期阶段有关妇女在发展中作用的思考和上面已经提到的几种面向妇女的发展方法。这个词汇是美国国际开发署（SID）华盛顿分会的妇女委员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创造的，当时的主旨是要将由鲍塞罗普和其他学者提出的新的思想传达出来以唤起美国决策者的注意。从那时起，“发展中的妇女”成为对主要基于现代化范型的妇女与发展问题的一种简练的表达，它关注开发有助于减轻妇女负担的更好的、更适宜的新技术，并突出强调妇女工作与劳动的社会生产方面的作用，而淡化妇女在人类自身繁衍方面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它表现出 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国家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根基。无论如何，“发展中的妇女”是一个在相关领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概念。

“妇女与发展”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研究方法，它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对现代化理论局限性的关

注。这种方法的重点不在于将妇女与发展相结合的战略，而是从经济角度指出妇女的重要位置，她们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和社区工作对于维持她们所在社会的正常运转具有根本意义。“妇女与发展”的探讨方法还认识到因为发展计划的忽视，穷人常常成为发展过程的受害者，这种发展计划还倾向于将妇女视为一个群体，而没有充分分析她们的阶级、种族和民族差别。“妇女与发展”方法设想，随着国际结构更趋于平等，妇女的地位会得到改善，这种思想似乎冲淡了妇女所承受的性别压迫的性质，将妇女的地位看作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和父权制社会结构的后果。

“发展中的妇女”、“妇女与发展”这一思路和前面提到的四种女性主义发展方法具有相互包含、两相照应的关系，对它们的了解有助于对女性主义发展研究的脉络发展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三）赋权和性别与发展

在对“发展中的妇女”、“妇女与发展”的提法与主张不断地进行探讨与反思，并经历了发展领域中倡导的福利、平等、效率等处理发展中妇女问题的方法之后，女性学者们发现，虽然这些方法认识到了社会中男女地位的不同决定了妇女与男子有不同的需求，但是在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上仍有差异，或是以保护男女之间差别的方式来满足，或是以改变产生不平等结构的努力来满足这些要求。鉴于此，女性主义发展研究者提出她们认为最为全面的关照妇女发展问题的方法——“赋权”，也有的学者称之为

“性别与发展”。

赋权的方法与此前的几种方法有不同之处：首先，女性学者认为这种方法照应了妇女生活的所有方面，以及妇女所从事的各种工作，包括生产的和再生产的、私人范畴的和公共范畴的，并反对任何试图贬低妇女所从事的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这种方法对当时已经获得普遍接受的发展理论所包含的内容提出质疑，指出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资金的有效利用，对那种认为妇女是自愿地参与到西方式的发展主流中去的观念进行批评，实际情况是，妇女无权选择她们所希望的社会类型。赋权的方法在其对妇女压迫的起源、动力与结构的分析上明显不同于其他方法，在其改变第三世界妇女地位的战略上也有所不同，它致力于提高妇女对她们自身发展的觉悟，而这种自身发展往往与变革同等重要。

167

其次，赋权是与自下而上的方法相联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多数有关赋权的思考都是产生于女性研究的文章和形成于南方的妇女运动，因此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南方发展中国家妇女处理发展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北方的、白人妇女的方法。它从种族、阶级、殖民历史以及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等方面，探索妇女从属地位的根源，它认为对妇女来讲，发展的目标在于自力更生和内在力量的增强。较之通过立法来保证男女平等，它更强调增强妇女的工作能力来改变对她们十分不利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最后一点，赋权方法虽然也认识到应有支持性的立法工作，但她们更强调妇女组织的发展，政治方面的现代

化，人民觉悟的提高和普及教育等进行持续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妇女组织为妇女个人能力的增长和地位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并为这种个人变化转变为直接的政治行为提供了背景。通常最为成功的妇女组织是围绕某种妇女的特殊需求而展开工作的那些组织，比如保健与就业，而这种特殊问题常常演化为长期的工作目标并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赋权方法之所以特别受到女性学者的青睐与肯定，还因为它所表现的“性别与发展”的特性，因为性别概念的提出正是顺应了女性研究发展的趋势与特点。在这种趋势的引导下，一些学者主张用性别的概念来取代妇女的概念，他们认为“发展中的妇女”的概念是具体的，可能会导致将妇女作为有天生缺陷的特殊一类而边缘化，而发展中的性别概念则有抽象的意义，它为妇女在发展中生产潜能的实现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 ※ ※

从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对发展中妇女问题的探讨和观念经历了许多变化，而且仍然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各种探索方法和发展模式反映了对什么是适宜的发展范型和妇女的社会与经济作用的不同看法。如果不把妇女作为有着特殊需求、有应有的权利、有不逊于男性能力的个人来看待，其结果必然会加重她们的工作负担，却不能改变她们的地位和提供选择的机会。因此，女性学者们认为，只有找到形成妇女从属地位的深层原因，将她们自身的需求放在重要位置上，发展计划和发展项目才能对妇女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并持续地改善她们的生活。

第九章 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

“妇女、环境与发展”(WED)与妇女与发展问题相类似,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研究与实践课题。由于这一课题包含了对西方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批判,因此它或多或少地映射出二战后全球的经济与政治历程。今天,特别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伴随着人们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的警醒,以及对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深思,这一主题更加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

一、作为一个主题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是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此前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工业增长的政策在这一时期受到严厉批判。新的抗议浪潮以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反核运动的形式,向由于现代化和迅速工业化所引起的问题,以及技术进步和军事化所加重的问题提出抗议,人们对于人类自身和自然界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所付出的代价深感忧虑。作为标志,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关人类环境的大会,并决定在内罗毕设立联合国环境方

案 (UNEP), 以期使这个问题制度化, 与此平行的非政府组织会议也在内罗毕设立了环境联络中心, 成为 UNEP 的协调与监督机构。

在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初始之时, 妇女作为一支特殊的力量而异军突起, 是与一些地方妇女的环境行动紧密相连的, 其中突出的一例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妇女在保护当地资源的斗争中所显示的主动精神。当时她们抱住当地森林中成材的松树不放, 以防止它们被商业承包人所砍伐^①, 这一运动广为人知, 并一直被研究者描述为由妇女发起的地方环境行动的典型事例, 同时它也鼓舞了许多人为宣传妇女在反对环境破坏斗争中的作用而奔走呼号。

与此相对应的, 1973 年由石油生产国引发的石油“危机”以及萨赫勒干旱造成的大范围影响, 使工业化国家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可获得的能源资源是十分有限的。西方发展计划者开始认真考虑能否制订一个更系统的全球能源计划, 尤其是针对木材燃料的供应, 因为在当时来讲, 木材是未来 10 年多数南方国家的惟一能源来源。为对付木材资源日益短缺的趋势, 发展计划者制订了一个双重战略, 一方面引进节柴炉具以减少消耗, 另一方面开展大规模的绿化造林以增加木材供应。在这一战略中, 妇女以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和地方经济中特有的地位而成为当然的参

① Shiva, Vandana, 1989,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见 Hausler, Sabine, 1993, "Wome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 Years in Retrospect", in *VENA Journal*, Vol. 5, No. 2. pp. 5 ~ 15.

与者。

此时，为妇女在环境领域中脱颖而出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一些学术界的知识女性，她们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经过长期实地考察而获得的感同身受的体验，发表了有关南方妇女在环境领域的地位与作用的独到见解。这中间最具影响的还是丹麦经济学家 E. 鲍塞罗普。1970 年她在大量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出版了《经济发展中妇女的作用》一书，她在书中重新解释了南方妇女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为妇女与发展这一领域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鲍塞罗普的影响，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左右，发展领域中对妇女在林业、农业、水管理以及农村发展中作用的兴趣日益浓厚，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妇女不仅仅是在养育子女、家务劳动等部门中，同时也在诸如动物养殖、蔬菜生产以及林业等经济生产部门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于是，最初的有关妇女、环境与发展的讨论就从一些与环境有关的学科，如农业和林业开始了。

此后在西方妇女运动的活动家、社会科学家和发展专家们共同促成的联合国妇女十年中，妇女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资源”而得到广泛的承认与重视，第一次妇女与发展大会还提出了旨在推动各国政府和国际上采取行动，解决不发达问题和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结构来提高妇女地位的行动计划。

20 世纪 80 年代是以全球经济问题增多，债务危机日重，环境恶化和南方妇女贫穷化为特征的。这些问题对穷人，特别是对贫困妇女的影响更为严重，如越来越多的南方妇女成为家庭生存的供养者，而男人常常前往城

市寻求就业。妇女在其政府的结构调整方案中也蒙受损失，比如面对经济和债务问题的国家，政府削减了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费用，这不啻给妇女本已十分沉重的生活负担雪上加霜。同时由于环境的退化，妇女不得不走更远的路去寻找水、燃料和饲料，因此妇女和穷人成了可以交替使用的同义词，她们被看作是环境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至中期，“妇女、环境与发展”已经成为发展政策研究中的一个正式课题。1984 年联合国环境方案制订了一个大范围的计划，以扩大妇女参与环境管理，西方更多的女林学家、农学家和水利管理专家，被任命在一些国际援助的发展项目中供职，同时一些南方的受过教育的城市妇女也有机会担任有关的专业工作，并由此开始进入“妇女与环境”的新领域。1984 年，第一次“新时期妇女发展”会议在印度召开，这一会议的主要参加者是南方国家的女性学者，她们从第三世界贫穷妇女的生活经历出发，批判了西方的发展模式，并就在选择的发展模式中如何实现妇女的发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①

为标志联合国妇女十年的结束，第二届联合国妇女与发展大会于 1985 年在内罗毕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的南方国家的妇女参加，并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们敦促北方的妇女发展专家和妇女活动家从妇

^① 见 Sen, Gita and Grown, Caren, 1988, *Development, Crises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Third World Women's Perspectives*. London, Earthscan.

女整体利益的观点出发来考虑发展问题。与大会平行的非政府组织论坛还召开了第一次“妇女与环境危机”国际研讨会，会上发表了许多证明妇女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的个案研究成果，作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妇女在环境领域中作为机智活跃的能动者的形象得到承认，她们被描述为环境管理者，她们的参与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关键的。

内罗毕会议之后，“妇女、环境与发展”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制度化，1986年，联合国妇女发展秘书处指定“联合国环境方案”（UNEP）为有关妇女与环境问题的主导机构，许多发展机构和非政府发展组织开始对南方的妇女问题更为敏感，并开始启动一些环境领域的妇女项目。

随着这一课题中南方妇女领袖的影响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贫穷妇女的受害者形象开始转变，而在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新的辩论中，妇女开始被推举为应付环境危机的当然人选。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这一报告提出了旨在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持续发展意在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需求，以便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减少工业化所导致的浪费与污染等社会经济代价，也就是在满足当今人类需求的同时，避免危及后代子孙满足需求的一种发展方式。在报告发表后的数年中，“妇女、环境与发展”的辩论集中于妇女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项目的必要性上，同时“妇女、环境与发展”的主题也逐渐转变为“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妇女为她们能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而积极活动。1991年11

月在美国迈阿密成功地举行了两次全球性的妇女会议。一次是由有关持续发展的高级妇女顾问小组和以美国为中心的环境管理与保护国际妇女网络等三个组织主办的集会，主题是“妇女与环境：生活中的伙伴”。这次会议从各类发展组织中邀请了 500 位客人，在会上，这些男性的发展专家们聆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所讲述的 218 件地方妇女环境行动的成功事例。

另一次会议是由妇女的国际政策行动委员会（IPAC）组织的“为了一个健康的星球世界妇女大会”，来自 83 个国家的 1500 名妇女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的目的是制定一个从妇女的观点出发，为在下个世纪建设一个健康的星球而进行宣传和行动的计划，“妇女 21 世纪行动议程”就是这一会议的产物。

迈阿密会议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它是一个突破，是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跨越了政治、南北、阶级、种族、专业以及制度的界限，以集体的力量就有关环境危机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不适当的发展给予批判。

此后在 1992 年 6 月 3~13 日，即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巴西妇女联盟会同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在里约热内卢全球非政府组织论坛上，召集了有关环境问题的妇女会议，会上妇女们为她们在论坛中取得一席之地感到欢欣鼓舞，并草拟了一份人口协议和一个独立的妇女协议，而后者正是对“妇女 21 世纪行动议程”的总结。此外在一个妇女宣言中，她们以更为强硬的语气批判了联合国环发大会的议程，指出议程中遗漏了诸如经济体系和军事体系这些导致环境恶化的关键因素，并呼吁与会的各国领导

人确保“妇女 21 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

在官方的联合国环发大会上，妇女游说小组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她们成功地将以“为妇女趋向持续与平等的发展全球行动”为标题的第 24 章，写入了环发大会 21 世纪议程。这一章强调，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21 世纪议程的成功落实，将依赖于妇女在经济与政治决策和落实方面的积极参与。与妇女的期望所不同的是，这一章强调的是将妇女与主流发展结合起来，而不是对发展本身进行改造。

二、妇女、环境与人口问题

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前后，一场控制人口的宣传运动席卷全球，降低人口出生率被视为环境保护和妇女发展的同期战略。而在为 1994 年开罗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筹备过程中，更有人以保护环境和保证持续发展为前提，提出了在人口出生率高的国家采取控制生育率的要求，妇女则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战略的关键因素。

在有关发展的辩论中，对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世界人口的指数增长造成自然资源的持续短缺与过度消耗，因此减少人口压力成为必要的发展战略。然而这一纯数字的研究方法似乎没有考虑这样一类问题，即哪些地区存在着什么样的短缺？过度消耗是由什么人造成的？同时这种方法也没有分析在穷人中造成这种高生育率的动力是什么？在这种方

法中，对人口与环境问题本应十分复杂的表述只被四个因素的相互关系所取代。这四个因素是：任一人类群体对环境的影响（I）；人口规模（P）；富裕程度（A）和生产消费品过程中引起的环境破坏（T）。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等式表示，即 $I = PAT$ 。不难发现，这一等式将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因素排除在外，如果将其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必然会加强世界经济秩序和发展范型中的不平等与不公正。

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在联合国环发大会期间被炒得炙手可热，尤其得到发达国家政府和机构的推崇。与此相反，得到南方发展中国家支持的，是一种被称作“分配观点”的理论。在分配观点中，人口增长与环境恶化同被看作权利与资源的不良分配的结果，贫穷则加剧了人口与环境方面的问题。有众多的孩子仅仅是穷人的一种生存战略，而北方国家的过度消费和能源消耗对环境的威胁要比南部的贫穷严重得多。根据这一观点，通过对资源获取和控制权力的重新分配来减少贫穷才是关键的发展战略，才能带来人口与资源的均衡。

上述两种观点并非没有一定道理，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就难免流于简单化和走极端。此后，一种新的探讨问题的方法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第三种观点中，人口数量的增长、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利用资源的方式都在考察的范围内。这种观点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其中包括：当今北方国家过度奢靡的富足不正是借助于盘剥他人和剥夺珍贵的自然资源而存在的吗？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中有否可能公

正地分配“发展”这块蛋糕？发展这一处方本身是否就是错误的？根据这一新的观点，在解决人口与环境的问题时，应给予人的发展以优先权，包括对人的尊严的承认和基本需求的满足。因此，在人口对资源压力大的地方，应该解决资源的公正分配问题，同时每一“生产和消费单元”对环境的压力要降低，生活条件需要改善，以便使孩子不再是穷人的惟一生存战略。

根据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高的人口出生率产生于穷人中间，因此第三世界的贫穷妇女便是生育控制的目标群体。然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这一人口控制方法，他们认为发展才是控制人口的最佳良药。在1994年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单纯的对人口政策的强调转向了一种综合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方法，而妇女自身的发展被视为减少生育率的必然途径。

在1991年迈阿密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妇女作为一种团结的力量曾发表了她们对环境与人口问题的看法。她们认为，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工业与军事的污染，是有毒废料和现存经济体系对人力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她们对单纯指责妇女造成高生育率的提法表示愤慨。鉴于人口数量与资源消耗以及浪费之和决定其环境质量，她们认为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要比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民对环境有着更消极的影响。她们要求制定以妇女为中心的、妇女管理的全面的卫生保健和生育计划，要求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提高妇女的卫生、教育水准和社会、经济地位是阻止环境恶化的关键。

三、女性主义与绿色经济学

在对环境与持续发展的讨论的推动下，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在发展领域工作的经济学家开始涉足绿色经济学。绿色经济学要发展一些新的指标，以更准确地衡量开发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代价，绿色经济学还寻求保护生物差异以维护自然资源。

在对女性主义与绿色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观察时，首先会发现二者之间似乎有一些相同之处，女性主义学者对发展与经济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也正是绿色经济学所提出的问题。他们认为，长期以来的发展实践是建立在剥夺自然与人民的基础上，为纠正这种不平等和不公正，人们所需要的正是重新组织生产体系，设计新的目标、战略和指标以便平衡地使用和补充资源。然而，面对非持续的、种族中心的和忽视妇女的经济发展，仅仅在经济学指标中补充进环境付出的代价、妇女“无形”的贡献和“非正规”经济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更好的计划和新的目标是否就可以满足了？绿色经济学能否改造目前的经济理论，为世界 2/3 的人口和处于发展边缘的人们，承担起为获得公正与可持续的生存发展提供基础的重任？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绿色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的主导原则是市场，市场并不是中性的，它的运作受到各式各样的文化、社会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影响。环境退化正是与现代市场活动紧密联系的，这些活动是在加剧消费的基础上，将赢利作为物质活动的目的

与尺度。绿色经济学的弱点正在于它未能有效地对造成环境恶化的偏重市场的方法挑战，同时也没有考虑非市场取向的经济活动，而恰恰是这些活动形成了市场关系和非西方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因此，不能有效地调整市场机制，协调经济增长与保护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本身就有了深刻的内在矛盾。

在现代经济学和市场理论中，妇女始终是处于一种边缘状态。鲍塞罗普在她的著作中就指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工作以及与社会再生产有关的活动，没有被视为经济活动，经济发展中的男性偏见反映出宏观经济学中对性别的忽视，该理论没有考虑到不付酬的人力资源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依存。女性主义的观点揭示了经济学忽视性别的弊病，她们认为，以性别为决定因素的一些过程直接影响着市场的运转。对妇女财产权和教育权的歧视，妨碍了她们进入市场、获取收入和享有财富，而在占有和使用资源方面，性别差别更是妇女地位低下和交易权力受压制的产物。在家庭与市场中，权力关系决定着工作的分配和利益的获得，妇女由于工作分工和花费于人力资源生产方面的时间，往往被排除于这些利益之外。

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生态经济学，是人类关注自身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希望通过学科间的努力，协调人类经济活动、人口与环境资源的相互关系。不管是女性主义经济学还是生态经济学，都试图创造新的方法论以便全面地分析人类的经济企图。女性经济学家正试图在国家统计机构收集的数据中进行筛选，设计选择的方法并形成新的数据

类型，以便使经济分析不仅包括有酬劳动，还包括妇女所从事的各类无酬工作。她们认为，应将性别作为经济的一个基本组织原则而开展研究，并需要考察下列情况：妇女的无酬劳动；收入与资源的家庭内分配；劳动力配置；决策与权力关系；有酬劳动市场中的性别作用等。此外，还需要有关粮食生产、非正式有酬工作，家庭内生产和志愿工作等方面的信息，从而使市场不再被视为惟一的价值标准。

生态经济学家指出，在为环境服务制订价格的尝试中，绿色经济学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是受生态群落和社会体系所束缚的。生态经济学家 H. 戴利曾提出将伦理的和生态学的考虑结合起来的方式。戴利指出，我们需要将经济作为生态体系的恒定的亚体系来看待，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达到不仅仅是社会公正，而且也是生态的公正。^①

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绿色经济学的批判，为女性研究参与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辩论开辟了一些可产生丰硕成果的研究领域。女性学者对绿色经济学探讨的一个独特的理由，是要清楚地了解权力是怎样不公平地在男女之间、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之间分配的，并以此为基础来反对性别歧视。为反对经济学的数学化，女性学者阐明经济学方法论在本质上并非是中性的，她们还要求经济分析要包含

① Daly, Herman, 1992, *Further Essays in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 London, Earthscan. 见 Harcourt, Wendy, "Towards A Feminist Alternative to Greening Economics", in *VENA Journal*, Vol.5, No.2. pp.37-42.

所有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女性主义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一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尊重非西方文化对经济、环境和妇女在人力资源生产中作用的理解，并使人类为谋求生存的经济活动和为获取利益的经济活动，与保护今天与未来的自然资源和谐地发展。

四、妇女与生物差异保护

生物差异保护的社会范畴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是在 90 年代以前却始终受到冷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些与发展问题有关的研究机构开始尝试结合各个学科的力量来探讨生物差异保护和人类发展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妇女在保护生物差异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生物差异在这里主要指基因、物种和生态体系的数量。尽管有各种统计，到目前为止人类仍不能确知有多少物种生存在地球上。但是很明显，生物差异在世界范围内正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受到威胁，科学家估计 5~10% 的热带森林物种在未来 30 年内将而面临灭绝，农业基因差异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其结果正被人类社会各个部门所感受，并被称之为全球危机。

一般的研究认为，妇女、环境（包括生物差异）和发展之所以联系紧密，是取决于以下三个相关因素，即劳动的性别分工、性别思想体系和贫穷的女性化。而从这三点，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妇女与生物差异保护发生联系的途径，这包括：妇女常常最先感受到生物差异消失的影响，

她们总是充任自然资源管理者的角色，一些资源保护项目可能会带给她们消极影响，也可能使她们从中受益。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自然经济中，妇女通常是食品、燃料、饲料和饮水的主要提供者，在劳动实践中，妇女们经常会发明一些技术以便有效使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比如，养殖家畜以获得肉类、奶制品和肥料，采集野果，在庭院中种植蔬菜，并赚取收入以购买医药和日用品。作为食物生产者她们通常负责选种、除草、收获和加工。她们为生存的斗争随着资源的消耗与恶化变得更为艰巨，为供养家人，贫穷妇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庄内外的动植物的种类与数量。而从自给自足的农业转向以商品作物为主的农业，常常导致她们在维持家庭生活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因此，劳动的性别分工意味着生物差异的丧失对妇女的影响是更为严峻的。

妇女在享有和控制资源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也限制了她们发挥自己的能力，特别是最贫穷的妇女、没有土地的家庭和妇女为主要供养人的单亲家庭。这些妇女与家庭往往特别依赖像森林和牧场这样的公共土地。由于她们没有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因此对上述土地的退化与被破坏既忧心如焚，又无能为力。

在妇女作为自然资源管理者的潜力方面，一些研究者曾收集过有关妇女的环境知识，他们发现农村妇女有着独特的生物常识。一些仍生活在自给自足状况中的妇女，她们通常比男人更了解不同物种的特点，她们靠品尝味道，或其他特征可以分辨出不同的物种，甚至是同一物种内的差别，而且对不同物种的药用、食用、燃料等不同使用价

值了如指掌。这些妇女还清楚在何时何地可以找到这类植物，凭借这些知识，妇女在认识和管理她们周围的自然生物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一般来讲，目前采用的保护生物差异的方法是，试图将人类活动排除在该自然区域之外，这些严格措施或许对保护某些最珍贵的生态体系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人们在失去对某些资源的依赖后转而被迫消耗另外一些资源，那么这样的项目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了新的问题。经验表明，没有考虑当地妇女需要和意见的项目，在保护生态差异方面便会毫无建树。因此专家认为，在有关的项目中首先应考虑赋予妇女相关的权力，同时要摒弃在造林与自然保护项目中的急功近利的短浅目光。

以上资料的提供是希望读者对“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的总的论题中的某些具体方面有所了解，目前许多个案研究都证明了妇女在自然资源保护中的作用，然而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这方面对妇女的授权比仅仅了解她们的作用更为重要。

“妇女、环境与发展”的讨论与实践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它已经从一个单纯与第三世界贫穷妇女有关的课题，发展成为全世界妇女所关心的共同论题，妇女根据自身的经历，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全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与发展偏差，对与此有关的经济理论问题、人口问题等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全面地理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全球经济问题的日益增多，以南、北、东、西为标志的贫富对比十分明显，抢救地球生态环境的任务异常

艰巨，“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运动，仍然面临许多任务。它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动员广大的基层妇女，组成各种联盟，游说政府和各个发展组织，影响其政策的制定和发展项目的实施。特别是敦促政府与人民对发展给予历史的理解，在各种社会制度中建立起有利于地球及人类本身健康发展的责任机制。

结 语 面向新世纪的 西方女性研究

作为女性主义思想和妇女运动在学术界的延伸，西方女性研究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的历程。这 30 多年来，它以授课、教学、会议、出版等方式，教育妇女，启发觉悟，探讨妇女问题，发展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学术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女性主义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运动，它极大地改变了妇女的期望和生活，也影响了男性对妇女生活的看法和对待妇女的方式。可以说，没有其他的社会运动像女性主义运动这样，如此迅速地革命化，并进而深入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在今天，女性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的、广泛存在的、有大量教师和学生参与的、蓬勃发展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但是，与传统学科相比较，女性研究的历史毕竟还很短，在学术界的根基尚不牢固，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还有待完善，因此，在经济、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使女性研究继续在学术界生存，如何继续从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政治中吸取营养以保持活力，这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刻，令西方女性研究学者们思考最多的问题。

美国著名女性研究刊物《妇女：文化评论》1999年第2期曾发表一篇题为“今日美国性别研究”的专题论丛式文章，邀请美国4位知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就性别研究的趋势发表她们的看法，这4位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谈了当今美国女性研究发展的一些问题。^①如卡米拉·帕利亚指出，在未来，妇女运动应该有两个重要的行动领域：第一，应该保证第三世界妇女的基本公民权和受教育机会；第二，更好地设计教育和培训计划，使这些教育为西方妇女走上企业的和政治的领导岗位做好准备。帕利亚认为，过去10年中，美国学术界中的女性学者在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的讨论中（除了有关性骚扰问题的公开辩论）表现不突出，这暴露出传统女性主义理论在解决棘手的当代问题时的不足，因此，在新的社会背景中，理论的发展是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身为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的唐娜·朗德里，在文中谈到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研究中的种族主义和地方主义问题，她认为，在美国种族专制主义仍在起作用，这使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在国际发展方面要落后于英国。在英国，除了有欧盟的压力之外，女性主义学者还可以通过国家媒体获得有关国际政治、包括女性主义政治的信息。而在美国，一旦远离沿海的大都市，便会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地方主义的趋势。朗德里指出，鉴于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妇女一直是经济剥削和性别剥削的易受伤害的群体，因此，我

^① Paglia, Camille, et al. 1999, "American Gender Studies Today", in *Women: a Cultural Review*, pp.213~219, Vol.10, No.2.

们必须尽更大努力来弥补这一差距。对美国女性主义来说，千年之交之际应该是至为重要的对国际和民族问题警醒的转折点。另两位学者则对女性主义学者的身份问题和发展问题发表了看法。

在英国，英国最重要的女性研究学术组织——女性研究网络（UK）将它 1999 年年会的主题确定为“妇女与新千年”，其寓意不言自明。《女性研究国际论坛》2000 年第 1 期也在首篇的位置发表了英国女性学者休·杰克逊的文章“英国女性研究的观念、问题与发展史”。^① 在文章后半部，杰克逊描述了英国女性研究在新世纪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她指出，尽管 1999 年英国女性研究网络年会的主题是“妇女与新千年”，但女性研究能否作为一个学科而继续生存，仍有待观察，有许多情况妨碍着它的前进。比如目前英国教育界对职业教育的偏重，鼓励学生在读学位时，选择可以有助于就业的专业，而女性研究尚未证明自己可以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此外，1998 年英国大学生的学年费用已达 1000 英镑，而受学费上涨打击最大的正是女性研究希望吸引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妇女，而且还是一些特别的妇女，即黑人妇女、工人阶级妇女和过去一直未能获得教育机会的妇女。

杰克逊指出，对女性研究不利的另一个因素是，英国学术界现在对出版学术著作的强调，而大学获得出版资助的途径之一，是向研究评估部门（RAE）提交这些出版

^① Jackson, Sue, 2000, "Networking Women: A History of Ideas,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in Women's Studies in Britain", 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pp.1~11, Vol.23, No.1.

物。然而这一评估是以学科为基础的，女性研究却没有被作为一个直接的主题领域看待，这迫使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将其工作挂靠在其他学科，从而使女性研究获得的评价过低，缺少承认，甚至被进一步的边缘化。

尽管如此，杰克逊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方面。她认为，女性研究可能仍然需要斗争，但它的确已在学术界找到许多选择的方式来挑战传统的学术结构和教学实践；在新的强调高等教育教学的政治氛围中，女性研究是处在改进教育和革新教学实践的最前线；女性研究尽管不能轻易地吸引到学术资助，但现在它在杂志和书籍的出版方面是一个颇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此外，尽管有招生方面的担心，但女性研究课程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还是广泛存在的，同时它还可以在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领域中生存和发展。

188

除了学者们所提到的在学术界所遇到的困难外，女性研究还面对着经济发展、特别是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以及由此提出的新课题。比如这些变革使一些人认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使妇女处于较之男性更为有利的地位，因此，女性主义的主张已经过时了。英国学者罗莎琳德·科沃德的文章“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女性主义吗？”^①就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她在文章中列举了如下一些事实：目前在英国出现了所谓的“经济的女性化”，虽然1970年以来工作数量的总数没有变化，而工作的类型、工作的方式和什么人从事工作却有了很大变化，其中最重要

^① Coward, Rosalind, 1999, "Do We Need a New Feminism?" in *Women: a Cultural Review*, pp.192~205, Vol.10, No.2.

的是工作场所中男女比率的变化。随着服务部门的扩展，妇女的就业人数显著增加，而男性从事的专职工作却相应减少。此外，现在非全日工作的数目要比 20 世纪 70 年代增加了 300 万个。非全日工作和弹性工作是经济变革的结果，经济发展正好为妇女提供了她们所适合的工作方式。

妇女不仅大量涌入低报酬的工作领域，到 20 世纪 90 年代，妇女从事专职的、收入较高的专业工作的比率也有相当大的提高。女学生在学院和大学中表现突出，与男性在教育背景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比她们的男性同辈具有了更高的资质。

妇女在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意味着她们拥有了更多的个人财富，夫妻双方都有收入的家庭中，女方比男方收入高的比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 1/15，到 90 年代中期达到 1/5。1996 年估计有 20% 以上的英国家庭中，女性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提供者。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与法律和道德方面的变化一起，标志着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妇女第一次有能力经济自主，并获得同男性同伴一样的地位。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女性主义者将女孩子受教育程度低看作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源。而到 1996 年，小学中的女生比男生有更好的表现，而在 16 岁学生的测试中，女孩子甚至在所有科目中都优于男生。在被开除的小学生中 92% 是男孩子，被开除的中学生中 80% 是男生，67% 的男中学生要继续接受教育，而继续接受教育的女生则达 73.8%，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男学生表现得越来越不如女学生，而且与教育体系的关系更成问题。

尽管大多数女性主义学者坚持认为，妇女仍然受到不

公正的待遇，在社会中处于劣势，然而科沃德通过分析指出，在90年代的西方国家，性别的意义，连同它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业已发生了变化，仍然坚持从男性权力的模式来解释这些变化，似乎是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女性主义性别关系的思想，已经变成了一种过时的思想意识，无力对一个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社会作出解释。

科沃德认为，女性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学说，它的某些目标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比如性别之间的公正与平等，这对任何富有活力的现代民主制度都是重要的。女性主义的多数信念和主张对今天的社会仍是相关的，它使我们不可能再接受建立在自然秩序之上的男性主导的观念，不可能再接受造成社会歧视的那种劳动分工，它推进性别平等，建立没有等级的家庭关系等这些现代社会民主理想的实现。但是女性主义也是它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在许多情况下它未能注意到社会以及性别之间的权利平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部分是由于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引发的。今天的经济在许多情况下是无视性别的，男性的期望值甚至因此而不得不改变。在新的社会背景中，女性主义实际上已经将妇女带到了更能适应的，甚至是更为有利的位置。总之，科沃德认为，女性主义的陈旧说教在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再适宜了，性别在众多不同的背景、现实、生活方式和时尚中，仍是一个富有意义的划分方法，但远不是其中一方永远受另一方歧视的划分方法。她指出，我们或许需要一个新的女性主义，来应对这一如此多变和更为复杂的现实，但是同时，必须准备摒弃旧的女性主义。

科沃德的观点或许代表了部分学者的看法，或许仅是一家之言，一己之见，但应该承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女性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女性主义作为一个致力于为妇女创造变革的思想武器，必将不断面临新的课题、困难与挑战，这些困难也会越来越复杂、深刻和严峻，因此，推进女性研究的发展，完善它的理论和方法的任务也会越来越艰巨。我们将继续关注西方女性研究面对新的挑战所作出的反应，并寄希望于女性研究的理想、概念和方法能为社会发展中的妇女，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录 国外女性研究机构简介

阿根廷 (Argentina)

阿丽西亚·莫罗·德胡斯托基金会

The Alicia Moreau De Justo Foundation

Corrientes 1485, 1st 'A', 042 Buenos Aires

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研究妇女的历史，并开展有关妇女问题的社会研究。基金会还组织会议、研讨会和开设短期课程，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

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men

Olleros 2554 PB, 1426 Buenos Aires

美洲国家间妇女委员会多国女性研究与培训中心

Multinational Women's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of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Women

Av Velez Sarsfield 153, Cordoba

中心开设教学和培训课程,从事出版工作,设有美术馆和图书馆,支持研究课题的开展。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悉尼大学女性学研究中心

Women's Studies Center and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Sydney

127 Darlington Road, Sydney, NSW 2006

成立于 1990 年,任务是促进相关的研究与教育。

格里菲斯大学澳大利亚女性研究与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Women's Research and Policy, Griffith University

Kessels Road, Nathan, Qld 4111

成立于 1991 年,旨在支持澳大利亚妇女获得高等教育和从事研究工作,加强研究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联系,提高妇女问题与性别问题研究的地位。

昆士兰大学妇女、文化与意识形态研究部

Women, Culture and Ideology Unit, 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Qld. 4072

促进相关研究。

阿德莱德大学女性学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University of
Adelaide

GPO Box 498, Adelaide, SA 5001

成立于 1983 年, 研究领域包括: 女性主义史、政治研究、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开展教育、研究管理和出版, 出版杂志《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南澳大利亚大学性别研究中心

Center for Gender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North Terrace, Adelaide, SA 5000

194

女性研究者的网络, 旨在使其活动在机构中获得正式的地位, 给予女性研究领域更高的学位授予权, 对于性别研究给予支持。

迪金大学澳大利亚女性研究中心

Australian Women's Research Center, Deakin University
Geelong Campus, Geelong, Vic. 3217

支持学生从事女性研究。

莫纳什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1987 年成立)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Clayton, Vic. 3168

旨在鼓励、支持和管理研究生的研究工作, 同时开展

教学和会议组织工作。

斯温伯恩工科大学女性学学院

Women's Studies College,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O Box 218, Hawthorn, Vic. 3122

研究工作集中于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 特别偏重于劳动大军中的妇女、技术领域中的妇女、组织与管理与妇女与家庭。

墨尔本大学社会中的妇女健康中心

Key Center for Women's Health in Societ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Faculty of Medicine, Dentistry and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arkville, Vic. 3052

促进与妇女健康有关的教育与研究工作。

西澳大利亚大学间女性研究中心

Western Australian 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促进与协调澳大利亚西部四所大学女性研究的共同发展, 这四所大学包括:

(1)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PO Box U 1987, Perth, WA 6001

(2) Edith Cowan University, 2 Bradford Street, Mount

Lawley, WA 6050

(3) Murdoch University, South Street, Murdoch, WA 6150

(4)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Nedlands, WA 6009

国际妇女发展机构 (IWDA)

International Women's Development Agency

PO Box 372, Abbotsford, Vic. 3067

孟加拉国 (Bangladesh)

196

妇女为妇女：研究小组 (1973 年成立)

Women for Women: A Research and Study Group

15 Green Square, Green Road, Dhaka

就孟加拉妇女的生活开展研究与出版工作，组织研讨会以传播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制作记录孟加拉农村妇女生活与活动的录像。小组的工作与研究均是志愿性质的，并用部分时间工作的方式完成的。

巴巴多斯 (Barbados)

西印度群岛大学新时代妇女发展的选择 (DAWN)
(1984 年设立)

The Development Alternative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School of Continuing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Pinelands, St Michael

它是第三世界女性发展研究网络的一部分,研究领域包括可选择的经济结构、生育权与人口、环境。出版《DAWN 通讯》(*DAWN Inform*) (英语), 每年三期, 每年发表《筹划指导委员会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还出版了《环境与发展: 草根妇女的观点》(*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Grass Roots Women's Perspective*) 一书。

西印度群岛大学妇女与发展部 (WAND)

Women and Development Unit,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197

Pinelands, St Michael

揭示妇女在历史中的作用, 支持加勒比地区妇女运动的发展。

比 利 时 (Belgium)

安特卫普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Centrum Vrouwenstudies, Universitaire Instelling
Antwerpen

Universiteitsplein, 1 Wilrijk, 2610 Antwerp

开设跨学科的女性研究课程。

欧洲女性研究中心 (CREW) (1980 年成立)

CREW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uropean Women)

38 Rue Stevin, 1040 Brussels

重点研究欧洲的妇女与就业问题, 对欧洲地区妇女的合作或集体企业开展比较研究。

布鲁塞尔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1990 年成立)

Centrum voor Vrouwenstudies, 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Pleinlaan 2, 1050 Brussels

开设社会学范畴内的性别研究课程。

巴 西 (Brazil)

Potifal 天主教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Nucleo de Estudos Sobre a Mulhe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men)

The Potifal Catholic University

Rue Marques de Sao Vicente, 225 Gavea, Rio de Janeiro
22453

作为社会学与政治学系的一部分于 1981 年成立, 旨在推动女性研究课程的发展和出版有关妇女的研究论著。

加 拿 大 (Canada)

芒特圣文森特大学女性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omen, Mount Saint Vincent
University

166 Bedford Highway, Halifax, Nova Scotia B3M 2J6

加拿大妇女地位顾问委员会 (CACSW) (1973 年成立)

The Canadian Advisory Council on the Status of Women
100 O' Connor St., 9th Floor, PO Box 1541, Sta. 'B',
Ottawa, Ontario K1P 5R5

由联邦政府拨款的独立机构, 就有关妇女的问题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并就农业、同工同酬、保育、色情文学、自由贸易对产业界妇女的影响等与妇女相关问题开展研究。

199

加拿大妇女的进步研究所 (CRIAOW)

Canadi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151 Slater Street, Suite 408, Ottawa, Ontario K1P 5H3

主要由联邦政府通过妇女计划提供财政支持, 从事有关家庭中的暴力和生育技术的利用等课题研究, 为研究者提供资金支持。

劳工部妇女局 (1954 年成立)

Women's Bureau, Department of Labour
Ottawa, Ontario K1A 0J2

主要研究以下问题：妇女就业、生育与保育、同工同酬、技术变革、性骚扰、妇女就业状况的统计分析等等。定期出版《劳动力中的妇女》（*Women in the Labour Force*）。

安大略教育研究所·妇女教育研究中心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in Education,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Education

252 Bloor St. West, Room S 630, Toronto, Ontario
M5S 1V6

康科迪亚大学西蒙娜·德比维尔研究所（1978年成立）

Simone de Beauvoir Institute, Concordia University

1455 de Maidonneuve Blvd West, Montreal, Quebec
H3G 1M8

促进女性研究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所设有文献中心。研究所中个人研究者的课题涉及移民妇女、妇女与科学、组织中的妇女与权力等。

萨斯喀彻温大学女性学研究部

Women's Studies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Education Building, Saskatoon Saskatchewan S7N 0W0

智利 (Chile)

女性研究中心

Centre de Estudios de la Mujer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Purísima 353, Santiago

信息中心和档案馆。

伊希斯国际

Isis International

Casilla 2067, Correo Central, Santiago

旨在消除性别歧视和改善妇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在意大利和智利设有办公机构,开展世界范围的信息与交流服务。 201

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大学多学科的性别研究计划

Programa Interdisciplinario de Estudios del Género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for the Study of Gender)

Universidad de Costa Rica, San José

捷克 (Czech Republic)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性别研究课程中心和图书馆 (1991)

年成立)

Curriculum Centre and Library for Gender Studies,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Box 695, 111 21 Prague 1

中心旨在各个课程和研究计划中发展性别研究和女性研究,并建立一个女性研究的数据库,它还设有多学科的图书资料中心。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东西方性别研究协调与研究中心
(1991 年成立)

The Research and Co-ordination Centre for Gender
Studies East/West,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202 PO Box 188, 111 21 Prague 1

任务是促进性别研究领域中的研究、教学和合作。

丹 麦 (Denmark)

奥尔堡大学 FREIA - 女性主义研究中心

FREIA-Centre for Feminist Research, University of
Aalborg

Fibigerstraede 2, 9220 Aalborg O

中心的女性研究者主要来自人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与发展研究等领域。“性别关系、权力和身份的变化”是中心的重点研究课题。

奥胡斯大学 Cekvina—女性研究中心 (1982~1983 年成立)

Cekvina-Women's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Aarhus
Finlandsgade 26B, 8210 Aarhus V

主要从事教学、研究和出版, 还设有大型的参考图书和文献中心。

哥本哈根大学 Samkvind—社会研究中的女性学中心 (1987 年成立)

Samkvind-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in the Soci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St Kannikestraede 11, 1169 Copenhagen K

开展教育、研究、出版等活动, 以发起、协调与支持 203
社会科学学院内的女性研究。

哥本哈根大学社会医学研究所·女性主义医学研究中心

Feminist Research Centre in Medicine, Institute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Panum Institute, Blegdamsvej 3, 2200 Copenhagen N

开展教育、研究、出版与文献工作, 安排相关课程, 并定期讨论研究工作。

哥本哈根大学丹麦妇女与性别研究协会 (1990 年成立)

Danish Association for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Panum Institute, Blegdamsvej 3, 2200, Copenhagen N

在全国和国际范围内开展工作, 与国际女性研究组织
建立网络联系, 是丹麦所有女性主义学者的科学论坛。

发展研究中心 (CDR) (1969 年成立)

Centre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Kongensgade 9, 1472 Copenhagen K

主要从事与第三世界妇女相关的研究。

阿马厄哥本哈根大学女性主义研究中心

204 Centre for Feminist Research and Studies, Copenhagen
University - Amager

Njalsgade 106, 2300 Copenhagen S

从事教学、研究、出版与交流工作, 研究课题涉及历
史、文学、医学、科学、自然与文化。

丹麦教育大学女性主义研究论坛

Forum for Feminist Research, Denmarks Laererhojskole

Emdrupvej 101, 2400 Copenhagen NV

主要工作是将性别的观点引入与教育和教学有关的课
题研究中。

奥登斯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Kvinde-Og Kønssudier, Odense University
Campusvej 55, 5230 Odense M

近期的研究课题包括：女性主义认识论、女性主义文化分析、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教育学。

罗斯基勒大学女性主义研究中心
Kvinde Pa Tvaers—Feminist Research Centre, Roskilde
University Centre House 03.2.5
PO Box 260, 4000 Roskilde
主要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

女性主义研究中心 (KVINFO)
Center for Kvindeforskning (Center for Feminist
Research)
Laederstraede 15, 2 SAL 1201 Copenhagen K

多米尼加 (Dominican Republic)

妇女行动研究中心 (CIPAF)
Centro de Investigacion para la Action Femenina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s Action)
Benigno Filomena Rojas no. 307, Aparado 1744, Santo
Domingo

国际妇女发展研究与培训研究所 (INSTRAW)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Calle Cesar Nicolas Penson 102 A, Apparado Postal
21747, Santo Domingo

研究所的活动包括培训、收集和交换有关妇女的信息以及研究。研究课题包括：国际经济中妇女的地位、妇女与技术、妇女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妇女与合作。研究所出版《国际妇女发展研究与培训研究所通讯》(INSTRAW News) 半年刊，用英、法、西班牙文出版。

厄瓜多尔 (Ecuador)

206

厄瓜多尔妇女促进与行动中心

Centro Ecuatoriano par la Promocion y Accion de la
Mujer, Los Rios (Ecuadorean Centre for Women's Promotion
and Action)

Apartado 182—C, Sucursal 15, Los Rios y Quito

从事研究，提供法律咨询，推动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妇女培训与研究中心

African Training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Women, Uni-
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Box 3001, Addis Ababa

开展研究与培训工作，促进妇女的进步与发展。

芬 兰 (Finland)

赫尔辛基大学女性研究所

The Christina Institute for Women's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O Box 4, 00014 Helsinki

研究所活动包括教学、研究与出版，开设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课程，为研究者提供参考图书和其他研究便利。

坦佩雷大学女性学与性别研究中心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and Gender Research,

University of Tampere

Research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

PO Box 607, 33101 Tampere

开展研究、教学和出版工作。

奥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Women's Studies

Abo Akademi University

20500 Abo (Turku)

全国性的女性研究文献中心与图书馆。同时在该大学中发起和协调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的课题与项目。

女性研究指导网络

Naistutkimuksen Ohjausverkosto

Women's Studies Guidance Network

University of Turku

协调全国的女性研究课程与研究活动。

法 国 (France)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当代社会研究所

劳动的社会与性别分工研究小组 (GEDISST)

Groupe d'études sur la Division Sociale et Sexuelle du Travail

208

Institut de Recherche sur les Sociétés Contemporaine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GEDISST-IRESO-CNRS 59 - 61 rue Pouchet - 75849

Paris cedex 17

巴黎第七大学女性主义研究·资料与教育中心
(CEDREF) (1984 年成立)

Centre d'Enseignement de Documentation et de
Recherches pour les Etudes Feministes

Universite Paris 7

2 place Jussieu, 75251 Paris, Cedex 05

巴黎第八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1978 年成立)

Centre d'Etudes Feminines, Universite Paris 8

2 rue de la liberte, 93526 St Denis, Cedex 02

从事女性研究, 提供相关资料, 开设女性学研究的学位课程。

里昂第二大学里昂女性主义研究中心 (CLEF) (1976 年成立)

Centre Lyonnais d'Etudes Feministes, Irish Université
Lyon 2

Av. Pierre Mendes France Case 11, 69676 Bron

艾克斯-马赛大学·普罗旺斯大学女性主义研究中心
(CEFUP) (1972 年成立)

209

Centre d'Etudes Feministes, l'Universite de Provence,
l'Universite Aix-Marseille

29 Av. Robert-Schuman, 13100 Aix-en-Provence

图卢兹大学女性学学科间研究小组 (GRIEF) (1979 年成立)

Groupe de Recherche Interdisciplinaire et d'Etudes des
Femmes, Universite de Toulouse le Mirail

56 rue du Tour Toulouse 31000

图卢兹大学女性研究思想与交流中心 (1986 年成立)

SIMONE, Conceptualisation et Communication de la

Recherche/Femmes,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le Mirail

UFR d'Histoire, 5 allées Antonio Machado, 31058
Toulouse, Cedex

从事女性学研究及教学、出版和文献等工作, 开设的课程涉及女性、历史、社会、文化、女性主义研究等等。

波尔多大学女性研究与信息中心 (CRIF) (1983 年成立)

Centre de Recherches et d'Information sur les Femmes,
Université de Bordeaux

南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210 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es Femmes, Université de
Nantes

44036 Nantes, Cedex 01

以法学系为主的女性研究中心。

德 国 (Germany)

柏林自由大学女性研究促进中心 (ZE) (1981 年成立)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Zentraleinrichtung zur
Förderung von Frauenstudien und Frauenforschung

Königin-Luise-Str. 34, D-1000 Berlin 33

主要从事女性学方法论和女性的主体性理论的研究。

柏林洪堡大学跨学科女性研究中心 (ZiF) (1989 年成立)

Zentrum für interdisziplinäre Frauenforschung,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Sophienstraße 22 a, 10099 Berlin

从事女性学的学科间研究。

女性学·女性教育与信息中心 (FFBIGZ) (1978 年成立)

Frauenforschungs, -bildungs-und-informationszentrum
e. V.

Danckelmannstraße 47, 1000 Berlin 19

从妇女劳动史的角度开展妇女史研究。

211

基尔 C. 阿尔布莱希特大学跨学科女性研究中心 (ZiF)

Zentrum für interdisziplinäre Frauenforschung der
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zu Kiel

Olshausenstraße 40, 24098 Kiel

比勒费尔德大学历史与哲学女性学研究系

Frauenstudien-Fakultä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sophie,
Universität Bielefeld

Postfach 8640, 4800 Bielefeld 1

主要研究妇女运动的政治与历史, 工业革命与女性劳

动，以及女性学方法论等。

加 纳 (Ghana)

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加纳女性研究协会 (GAFRO)

Ghana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Wome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Ghana

Legon, Ghana

促进对女性问题的研究，提高各界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开展对加纳妇女的研究，传播相关的信息。

英 国 (Great Britain)

西约克郡女性研究中心；暴力、虐待和性别关系研究部；工作与性别研究部；就业小组；妇女与发展小组；女性主义档案馆

West Yorkshir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Women;
Violence, Abuse and Gender Relations Research Unit; Work
and Gender Research Unit; Employment group; Women and
Development group; Feminist Archive

University of Bradford, Bradford BD7 1DP

从事妇女与社会问题研究。

苏塞克斯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妇女与技术研究计划

Research Centre in Women's Studies, Women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rogramme

University of Sussex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Mantell Building, Falmer

Brighton BN1 9RF

开设的课程有：同性恋研究、性别与发展、妇女与教育。

阿尔斯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女性研究论坛

Centre for Research on Women; Women's Studies Forum

University of Ulster, Coleraine BT52 1SA

开设信息技术与妇女等课程，还提供成人教育的短期课程。

213

考文垂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Women's Studies Centre, Coventry University

Priory Street, Coventry CV1 5FB

协调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小组的工作，定期安排有关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问题的研讨会。

兰开斯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Feminist Reading Group,
Language and Gender in the Classroom Group,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Lancaster La1 4YL

开设女性研究的系列研究班，并就下列课程进行研究管理：妇女与历史、性行为、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科学中的女性主义问题、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教育中的性别问题、社会政策问题等。

伦敦妇女中心非洲妇女联合体 (AMWA)

Akina Mama wa Afrika (Solidarity among African Women), London Women's Centre

Wesley House, 4 Wild Court, London WC2B 5AU

是一个自治组织，全体成员都由非洲妇女组成，研究重点是非洲妇女问题，出版和宣传相关的研究成果，与草根妇女配合，在有关非洲妇女的事务中起到压力集团的作用。

214 用。出版《聚焦非洲妇女》(Focus on African Women)

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教育与性别研究中心

Centre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and Gender,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20 Bedford Way, London WC1H 0AH

研究与培训，开设的课程有：妇女与管理、性别、社会与文化、女性研究与教育、人权、教育权、英语与传媒等。

伦敦经济学院性别研究中心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ende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oughton Street, London WC2A 2AE

教学与研究。

东伦敦大学女性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小组

Women's Studies and Feminist Research Group,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Longbridge Road, Dagenham, Essex RM8 2AS

教学与研究。

北伦敦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Women's Stud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North London

1 Prince of Wales Road, London NW5 3LB

教学与研究。

215

北伦敦大学·虐待妇女与儿童问题的研究与资料中心

Abuse of Women and Children Studies and Resources
Unit, University of North London

Ladbroke House, 62 ~ 66 Highbury Grove, London N5
2AD

涉及研究、政策和实践问题的培训、咨询与资料机
构。

索思兰德斯大学女性学与女性主义研究小组

Women's Studies and Feminist Research Group,
Southlands College

Parkside, Wimbledon, London SW19

教学, 定期举办研讨会。

曼彻斯特大学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中心

Feminist and Gender Studies Centre; Feminist Research
Group,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Coupland Street, Manchester M13 9PL

牛津大学跨文化的女性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Women, Univer-
sity of Oxford

Queen Elizabeth House, Oxford

举办系列讲座和研究班。

朴次茅斯大学女性学与女性主义研究小组

Women's Studies/Feminist Research Group,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Milldam Site, Burnaby Road, Portsmouth PO1 3AS

斯塔福德郡大学女性研究小组

Women's Research Group,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Brindley Building, Leek Road,
Stoke on Trent

约克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Postgraduate Teaching & Research Centre;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Feminist Research Group, University of York

Heslington, York YO1 5DD

开设女性主义研究的研究生课程, 安排研究班活动, 组织会议和公开讲座。

几 内 亚 (Guinea)

几内亚女性研究与发展协会 (AFGRED)

Association des Femmes Guineennes pour la Recherche et le Developpement

BP 945, Conakry, Guinea

从事并推进女性问题的社会与经济研究。

圭 亚 那 (Guyana)

圭亚那大学女性研究部 (1987 年成立)

Women's Studies Unit, University of Guyana

PO Box 10 11 10, Georgetown

从事女性学研究与教学的专门机构, 研究领域涉及就业、暴力、健康、教育等等, 设有文献资料中心。

洪都拉斯 (Honduras)

洪都拉斯大学妇女协会 (AMUH) (1950 年成立)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in Honduras

El Centro, Tegucigalpa, DC, Casa No. 1241 y 7a Ave,
Honduras

为争取妇女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就业机会均等和同工同酬而成立, 从事对洪都拉斯妇女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

匈牙利 (Hungary)

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1992 年成立)

Women's Studies Centre, Budapest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1093 Budapest, Fovam ter 8

匈牙利成立最早的女性学研究机构, 开展研究, 联络和提供女性研究课程, 组织讲座等活动, 进行有“变革时期妇女的地位”等国际研究课题。

冰 岛 (Iceland)

冰岛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1990 年成立)

Rannsoknastofa; kvennafræðum við Háskóla Íslands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Iceland's University

Oddi IS 101, Reykjavik

促进与协调国内女性学与女性主义研究。

印 度 (India)

SNDT 女子大学女性学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SNDT Women's University

Sir Vithaldas Vidyavihar, Santa Cruz (West), Juhu Road, Bombay 400049

从事女性研究, 研究问题涉及妇女与劳动、教育、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妇女的政治参与、妇女与宗教、妇女与暴力等等。

219

Tata 社会科学研究所女性研究部

Women's Studies Unit, 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PO Box 8313 Sion-Trombay Road, Deonar, Bombay 400088

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 为研究者提供资金支持和学术指导。

妇女发展研究中心 (CWDS) (1980 年成立)

Center for Women's Development Studies

B-43 Panchshila Enclave, New Delhi 110017

关注政策变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对影响妇女社会经

济和政治地位的因素与过程进行预测、评论和考察，参与出版、教育、培训和有关妇女问题的政策讨论。

社会研究合作研究所（1964 年成立）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rust (ISST)

M-1 Kanchenjunga, 18 Barakhamba Road, New Delhi
110001

研究工作集中于妇女的经济作用、以及如何将妇女结合进发展项目。设有图书馆，出版相关书籍和研究报告。

巴纳拉斯印度大学女性研究与发展中心（1987 年成立）

220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Banras
Hindu University

Indian Association for Women's Studies

228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Varanasi 221005

推动高等教育领域中女性研究的发展，为跨学科女性研究工作提供研究补贴。出版《印度女性研究协会通讯》（*Newsletter of the Indian Association for Women's Studies*）。

女性研究与资料中心（AALOCHANA）（1989 年成立）

Center for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on Women

'KEDAR', 86/11 - B Kanchangalli, Erandavana,
Poona 411004, Maharashtra

重点收集、分析和提供有关妇女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问题的资料。

拉贾斯坦大学成人教育系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Rajasthan

Jaipur 302004, Rajasthan

伊 朗 (Iran)

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PO Box 13145~654, Tehran

221

爱 尔 兰 (Ireland)

都柏林大学女性教育研究与资料中心 (WERRC)

Women's Education Research and Resource Centre,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525 Library Building, University College, Belfield,
Dublin 4

主要从事女性学的教育、研究、出版和资料提供工作, 定期组织讲座和相关会议, 设有图书馆。

都柏林大学女性研究大学论坛 (WSF) (1983 年成立)

Women's Studies Forum,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525 Library Building, University College, Belfield,
Dublin 4

论坛旨在分享和传播有关妇女的研究成果和资料,特别是对爱尔兰妇女的研究与发展,它的研讨会对所有妇女开放,鼓励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戈尔韦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系女性研究中心
Women's Studies Centr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Galway
Galway
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

222

利默里克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University of Limerick
Plassey Technological Park, Limerick
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

以色列 (Israel)

海法大学女性研究计划 (1983 年设立)
Women's Studies Programme, University of Haifa
Mt. Carmel, Haifa 31999
在人文学、社会科学、教育、劳动就业和宗教等领域
中开展女性研究。

教育中的性别公正国际网络 (INSEE) (1987 年成立)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Sex Equity in Education

22 Yehuda Halevi Street, Raanana 43556

以在教育领域中实现性别平等为目的, 交流教学资料、从事课题研究、从事出版等活动, 出版《INSEE 通讯》(INSEE Newsletter)。

女性研究中心 (1990 年成立)

Women's Studies Centre

PO Box 19591, East Jerusalem

开展研究和培训工作, 保护妇女利益, 提倡妇女的政治参与, 提供相关信息, 出版《通讯》(Newsletter)。

223

意大利 (Italy)

博洛尼亚大学文学系市立女性研究与资料中心

City Women's Research and Resource Centre

Dipartimento Di Lingue E Letterature-Straniere Moderne, 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Bologna

Via Zamboni 16, 40126 Bologna

开展女性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米兰大学家庭与女性主义研究小组

GRIFF (Group for Research on Family and Feminism),
University of Mila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Via Conservatorio 7, Milan

日 本 (Japan)

日本女性研究学会 (WSSJ) (1978 年成立)

Women's Studies Society of Japan

Shokadou Women's Book Store

Nishinotouinn-Nishiiru, Shimodachiuri

Kamigyoku-Ku Kyoto-shi

Kyoto

学会宗旨是开展对日本妇女和国外妇女的跨学科研究, 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妇女解放的政治学, 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和私人企业的支持, 每月出版通讯《妇女的声音》(*Voice of Women*)。

日本大学妇女协会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Toyama Mansion 241

Shinjuku 7-17-18

Tokyo

工作在大学中的妇女之间的网络, 从事对妇女问题的研究。

肯尼亚 (Kenya)

内罗毕大学非洲妇女研究与发展协会 (AAWORD)

Association of African Wome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Kenya

University of Nairobi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PO Box 30197, Nairobi

促进非洲国家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以发展中国家妇女面临的问题为研究的重点,研究领域涉及劳动、人口统计、教育、政治和就业等等。

韩国 (Korea)

韩国女性发展研究所 (1983 年成立)

Korean Women's Development Institute (KWDI)

1-363 Pulgwang-dong, Eunpyung-ku, Seoul 122-040

主要从事妇女问题研究,通过教育与培训促进妇女潜能的发挥,推进对有关妇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利用,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法律、政策、妇女技能的开发、女性就业与职业培训、家务劳动等等。主要出版物有《妇女发展通讯》(*Women's Development News*) (月刊);《KWDI 研究活动年度报告》(韩文);《女性研究论坛》(*Women's Studies Forum*) (英文)。

晓星女子大学亚洲妇女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Asian Women, Hyosung Women's University

No. 53-12, 2 - ka Chungpa-Dong, Yongsan-ku, Seoul
出版《亚洲妇女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Women*)

釜山国立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Women's Studies Center,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30 Jangjeon-dong, Dongnae-ku, Pusan

出版《女性研究杂志》(*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釜山女子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Pusan Women's University
1528 Yonsanli-dong, Tongnae-ku, Pusan 607-737

出版《女性学》(*Women's Studies*)

晓星女子大学女性问题研究所

Women's Problem Research Institute, Hyosung Women's University

419 Ssangmun-dong, Tobong-ku, Seoul

出版《女性问题研究所杂志》(*Journal of WPRI*)

汉城女子大学女性研究所

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Seoul Women's University
126 Kongnung 2 - dong, Nowon-ku, Seoul 139-744

出版《女性研究杂志》(*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木浦国立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Women's Studies Center, Mokpo National University

534 Porri Torimi-Phontye Chongye-yoe Yamgun
Chonnam 729

出版《女性研究》(*The Women's Studies*)

中央大学国际女性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Chung-ang
University

221 Huksuk-dong, Dongjak-ku, Seoul 151

出版《国际女性学研究所杂志》(*The Journal of IIW*)

227

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女性研究所 (1977 年成立)

Korean Women's Institute, Ewha Women's University

Seoul, Korea 120-750

促进高等教育领域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 开展女性问题研究和妇女史的研究, 出版《女性研究评论》(*Women's Studies Review*)。

黎 巴 嫩 (Lebanon)

贝鲁特大学阿拉伯世界女性学研究所 (IWSAW)
(1973 年成立)

Institute for Women's Studies in the Arab World, Beirut
University College

PO Box 13 5053, Beirut

研究阿拉伯社会妇女地位与女性问题, 涉及文学、教育、就业及发展等领域。

立陶宛 (Lithuania)

维尔纽斯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1992 年成立)

Women's Stud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Vilnius

Universiteto g. 3, Vilnius 2731

研究活动集中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法学和医学领域, 开展相关的研究、资料提供和出版工作, 组织学术讨论会, 并成立了立陶宛大学妇女协会 (Lithuanian University Women's Association, LUWA)。

228

马来西亚 (Malaysia)

亚太发展中心·发展计划中的妇女

Women in Development Programme,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

Pesiaran Duta, PO Box 12224, 50770 Kuala Lumpur

以妇女与发展, 以及与妇女相关的发展政策和计划等问题为重点开展研究与出版工作, 研究课题涉及农村变革与农村妇女、女性与发展计划、工业过程中妇女的参与等。“女性与贫困”、“国际移民与妇女”一直是其特别的研究课题。

墨西哥 (Mexico)

墨西哥大学跨学科女性研究计划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n Women's Studies, El Colegio de Mexico

Camino al Ajusco No. 20, C.P. 01000, Mexico D.F.

对女性主义研究提供支持,开展相关研究,研究主题包括家庭、妇女与家庭结构、农村发展与农村妇女、女性文学等等方面。组织讲座和研讨会,设有资料部门,出版研究成果。

荷兰 (Netherlands)

229

国际信息中心与妇女运动档案馆 (IIAV)

IIAV—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re and Archives for the Women's Movement

Keizersgracht 10

1015 CN Amsterdam

是荷兰全国性的信息服务中心和数据库,就妇女和女性研究开展咨询、研究和特别的课题研究工作,它还是国际交流中心,负责收集、储存和传播有关妇女的信息。

阿姆斯特丹大学多文化与比较性别研究中心

Belle van Zuylen Institute (Amsterdam Graduate Center for Multi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Gender Studie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Rokin 84-90, 1012 KX Amsterdam

协调与推动该大学 12 个系中的女性学研究, 发起和从事自己的研究计划, 提供大学生和博士生的女性研究课程, 通过会议和交流计划保持和扩大国内和国际的联系与交流。研究所自身的重点研究领域包括: 国际文化传播; 技术、性别与文化的互建; 多文化背景的比较性别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所妇女与发展计划 (1977 年成立)

Wome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ISS

PO Box 90733, 2509 LS The Hague

开展范围广泛的有关妇女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大型的国际性课题研究, 提供相关的硕士和博士课程。

格罗宁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Werkgroep Vrouwenstudies Letteren

Rijksuniversiteit Groningen

Internationalisering Fac. der Letteren

PO Box 716, 9700 AS Groningen

开展研究与教学工作, 提供的课程包括以下内容: 语言学、文学与历史学中的女性研究; 后现代主义与女性研究;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权利、法律与身体; 荷兰女性主义中的政治与文化等等。

莱顿大学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学院妇女与自治中心

Women and Autonomy Centre (VENA)

Faculty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Rijks Universiteit Leiden

Pieter de la Court Building

Wassenaarseweg 52

PO Box 9555 2300 RB Leiden

中心的主要作用是收集与妇女的赋权与自治有关的一切信息和数据，并促进对这一领域内的知识与经验的了解，进而帮助妇女改善自己的处境与地位。研究活动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变革过程中妇女的地位；发展项目的计划与落实对妇女影响的研究与评估；对旨在改善妇女地位和提高她们自治的个人项目和组织项目提供支持性服务和帮助；收集和提供相关的一切信息和知识等。

231

乌德勒支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Anna Maria Van Schuurman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Rijksuniversiteit Utrecht

Drift 13, 3512 BR Utrecht

开展教学、研究、出版和文献活动。

解放研究促进委员会

Promotion Committee for Emancipation Research (STEO)

Lutherse Burgwal 10, 2512 CB The Hague

1985年由荷兰政府成立,旨在促进荷兰女性研究的发展,它利用其在荷兰的网络为女性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合作与交流的便利,并出版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瓦赫宁恩农业大学女性学部

Department of Women's Studies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ageningen

Hollandsweg 1, 6706 KN Wageningen

开展研究与教学工作,研究问题涉及第三世界和欧洲国家的农村发展与性别问题;性别与农业科学等等。

232

新 西 兰 (New Zealand)

怀卡托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1986 年成立)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ikato

Private Bag, Hamilton

开展研究与教学工作,开设女性研究的各级学位课程。研究的问题包括:妇女与工作、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工会、女性主义与种族主义,以及妇女健康等方面。

尼 日 利 亚 (Nigeria)

尼日利亚妇女 (WIN) (1982 年成立)

Women in Nigeria

PO Box 253, Samaru, Zaria, Kaduna State

or PO Box 5600, Benin City, Bendel State

尼日利亚妇女是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非宗教性的组织，主要从事对妇女的研究和相关信息的传播。研究的问题包括：妇女与家庭、妇女与教育、农村地区的妇女、妇女对尼日利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参与、针对妇女与儿童的暴力等，该组织还设有文献中心。

伊巴丹大学非洲研究所女性研究与文献中心
(WORDOC) (1986 年成立)

Women's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r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badan

Ibadan

协调和推进对新的方法论的研究，开展课题研究，组织研讨会，出版相关的研究成果。研究的领域涉及：农业、政治、文化、历史、法律体系、健康、家庭、教育、文学和城市经济。出版《WORDOC 通讯》(WORDOC Newsletter)

阿马杜·贝洛大学尼日利亚妇女推进委员会

Steering Committee of Women in Nigeria, Ahmadu Ballo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Zaria, Kaduna

在尼日利亚推进有关女性问题的研究。

挪威 (Norway)

卑尔根大学人文学女性研究中心 (1985 年成立)

Senter for humanistisk kvinneforskning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Bergen

Hermann Fossgt. 12, 5007 Bergen

旨在协调研究和推动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 研究活动涉及文学分析、妇女史等领域。

卑尔根大学社会科学女性研究中心 (1987 年成立)

234 Senter for Samfunnsvitenskapelig Kvinneforskning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Bergen

Hans Holmboesgt, 22-24, 5007 Bergen

为推进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女性主义研究而设立, 它对于社会科学各系中的学者与学生的联系起着重要作用, 由各个系协同举办的研讨会和讲座被给予特别强调。

发展研究中心性别与发展研究小组 (1986 年成立)

The Gender and Development Group, Centr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Stromgaten 54, 5007 Bergen

偏重跨学科的性别研究, 研究领域包括: 历史、比较

宗教、人类学、地理学和哲学。

特隆赫姆大学文理学院女性研究中心 (1993 年成立)

Senter for Kvinneforskning, Den Allmennvitenskapelige
Hogskole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rondheim

Hakon Magnussons gate 1b (Lade), 7055

Dragvoll

开展研究和出版工作, 为海外学者提供研究工作和住宿便利。

工作研究所

Arbeidsforskninginstituttet (Work Research Institute)

235

Stensberg gate 29, PO Box 8179, 0034 Oslo 1

进行两项主要的女性研究计划: 性别; 工作与平等。

奥斯陆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Senter for kvinneforskning (Center for Women'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Oslo

PO Box 1040, Blindern, 0315 Oslo 3

促进女性研究的发展, 在大学内指导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
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出版研究成果。

社会研究所

Institutt for samfunnsforskning

Munthes gate 31

0260 Oslo 2

自 60 年代以来, 研究所一直是挪威重要的女性研究中心, 80 年代的研究重点是性别平等问题, 90 年的研究课题涉及妇女的家庭和平等地位研究。

妇女与研究事务局 (1977 年成立)

Secretariat for Women and Research

PO Box 2700, 0131 Oslo

挪威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 (Norwegian Research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NAVF) 的一个部门, 主要工作是发起、协调与推动有关妇女的研究, 出版研究成果, 出版《女性研究新闻》 (*News of Women's Studies*) (每年五期)。

特罗姆瑟大学语言文学系女性研究小组

Kvinneforskningsgruppa ved Institutt for Språk og Litteratur (Women's Studies Group in the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romsø

Breivika, 9000 Tromsø

开展研究与出版工作。

巴基斯坦 (Pakistan)

应用社会经济研究所 (ASR) (1983 年成立)

Applied Socio-Economic Research
Flat No.8, 2nd Floor Sheraz Plaza
PO Box 3154, Gulberg, Lahore

主要开展研究、出版、培训和文献提供等活动。研究的问题包括：妇女与土地、妇女口述史、妇女与伊斯兰教、南亚的女性主义理论。

巴 拿 马 (Panama)

巴拿马促进妇女地位提高研究所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y Capacitacion para la
Promocion de la Mujer en Panama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and Promotion of Women in
Panama) 237

Apartado Postal 6-5950 'El Dolado', Panama City

巴拿马女性研究中心

Centro de la Mujer Panamena

Sam Miguelito C1 -1, # 1783, Apartado Postal 7433,
Panama 5

促进对妇女与女性问题的研究，以提高妇女的生活水平为目的，通过教育与培训提高妇女自我管理的能力，促进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巴拿马大学女性研究委员会

Comision de Estudio de la Mujer, Universidad de Panama
Vicerectoria de Docencia e Investigacion, Apartado Postal
9256, Panama 6

发起和支持有关女性课题的研究, 相关教育课程的提供, 文献服务。

巴拉圭 (Paraguay)

巴拉圭女性研究小组 (1985 年成立)

Grupo de Estudio de la Mujer Paraguaya (Group for the
Study of Women in Paraguay)

Eligio Ayala 937 C. C. 21 57, Asuncion

专门为研究女性问题而设立, 最近的研究课题包括:
女性与劳动力市场、妇女与教育、妇女与政治、传媒中的
妇女形象等等。出版《聚焦妇女》(*Focus on Women*) 和
《巴拉圭妇女文献目录》(*Bibliography of Paraguayan
Women*)

秘 鲁 (Peru)

弗洛拉·特里斯坦秘鲁妇女中心 (1979 年成立)

Flora Tristan Peruvian Women's Centre

Parque Hernan Verlade 42, Lima 1

研究秘鲁的妇女问题, 出版相关的研究成果。研究的
问题涉及: 秘鲁妇女运动的形成、大学中的性别研究。

劳动发展协会

Labour Association for Development

Leon Verlarde 890 - Lince, Lima 14

以妇女的就业问题为重点开展研究工作，还涉足传播与培训工作。

菲 律 宾 (Philippines)

圣斯科拉丝蒂卡学院女性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Women's Studies, St Scholastica's College

PO Box 3153, Manila

从事研究、出版、文献服务等工作。

239

劳动信息部 (LID)

Labour Information Desk

Ateneo Centre for Social Policy and Public Affairs

Room 230 Faura Hall, PO Box 154, Manila

研究劳工运动；社会改革与劳工运动的关系；工会运动中的妇女；发展中的性别平等等问题。

女性资料中心 (1982 年成立)

Centre for Women's Resources

43 Roces Avenue, 2nd Floor, Mar Santos Building,
Quezon City

开展研究、教学和出版活动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出

版季刊《三八》(Marso 8)。

女性资料与研究中心 (1987 年成立)

Women's Resource and Research Centre

Katipunan Parkway, Loyola Heights, Quezon City

支持国内外的妇女运动,开展与女性问题有关的学术研究,推动菲律宾妇女的发展。研究重点包括:女性主义教育和对贫困妇女的培训、妇女的信息需求、教育体系中非性别歧视的学习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

波 兰 (Poland)

240

罗兹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1992 年成立)

Women's Stud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Lodz

Kosciuszki 65, 90514 Lodz

波兰成立最早的女性学研究机构。

塞内加尔 (Senegal)

非洲妇女研究与发展协会 (AAWORD) (1977 年成立)

Association of African Wome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P 3304, Dakar

有着广泛的地区、全国和国际联系,在非洲社会科学研究中引入性别的观点。主要出版物:《AAWORD 杂志》

(*The AAWORD Journal*) ; 《非洲妇女与农村发展》(*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 《非洲妇女研究》(*Research on African Women*) 等等。

第三世界环境开发活动 (1972 年成立)

ENDA Third World (The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ction in the Third World)

BP 3370, Dakar

与草根团体合作开展本土的发展工作, 从事研究、文献、出版和培训等活动, 出版《非洲环境》(*African Environment*) 等文献和书籍。

南 非 (South Africa)

241

南非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O Box 392, Pretoria 0001

西 班 牙 (Spain)

巴塞罗那大学妇女史研究中心 (1982 年成立)

Centre d'Investigacio Historica de la Dona (Centre for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Universitat de Barcelona

61 Brusi, 08006, Barcelona

专为促进对妇女史的研究而设立, 以妇女历史与艺术、电影史的研究为重点, 开展教学、出版和文献活动。

马德里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Women's Studies Center,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Edificio Escuela de Estadística

Ciudad Universitaria, Despacho 209, 28040 Madrid

从事教学、研究、出版工作。

马德里大学西班牙妇女史研究协会

Asociación Española Investigación de Historia de
Mujeres,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Facultad de G. e Historia,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D-
39, E-28040 Madrid

从事妇女史研究, 提高人们对妇女在历史中的地位的认识。

242

斯里兰卡 (Sri Lanka)

斯里兰卡科学促进协会女性研究中心 (CENWOR)
(1984 年成立)

Centre for Women's Research, Sri Lanka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20/10 Wijerama Mawatha, Colombo

从事有关妇女问题的政策研究和行动研究。近期的研究包括: 城市妇女的经济需求、低收入家庭的问题等。它还设有文献中心和图书馆及女性研究参考文献中心, 出版《联合国妇女十年: 斯里兰卡妇女的进步与成就》(UN Decade for Women: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of Women in

Sri Lanka)。

苏丹 (Sudan)

苏丹女性研究与发展组织

Sudan Wome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PO Box 208 I, Khartoum

这一组织是基于苏丹和国际基础的资料中心,它通过研究课题的实施和在城市与乡村发起妇女的自助项目来推动妇女地位的提高,通过研讨会和出版活动来传播研究成果和相关信息。

阿哈法女子大学 (1966 年成立)

Ahfad University for Women
PO Box 167, Omdurman

下设四个学院:家政学、心理学与学前教育、组织管理、农村教育与发展。定期出版刊物。

瑞典 (Sweden)

哥德堡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The Women's Studies Centre, Gothenburg University
41298 Gothenburg

吕勒奥大学妇女与就业生活研究中心

Forum for Kvinnor if Forskning och arbetsliv (Centre for Women in Research and Working Life), Hogskolan I Luleå
Luleå University, 95181 Luleå

隆德大学女性学者与女性研究论坛

Forum for Women Scholars and Research on Women,
Lund University
PO Box 1703, 22101 Lund

厄勒布鲁大学政治学系女性学研究中心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örebro College
PO Box 923, 70130 örebro

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瑞典第三世界性别关系研究网络

Swedish Network for Research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the Third World, Population Participation Programmes of the
Development Study Unit,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Stockholm University
10691 Stockholm

就业生活研究中心女性研究小组

Arbetslivscentrum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Working
Life), Women's Research Group

PO Box 5606, 11486 Stockholm

工作中的妇女是中心的研究重点, 鼓励国外女性学者从事研究。

乌普萨拉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 Uppsala University

Ostra Agatan 19 3r, 75322 Uppsala

为女性研究者提供支持,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神学、女性与文学等, 出版定期刊物。

瑞 士 (Switzerland)

国际女性主义网络 (IFN)

245

International Feminist Network, Isis-wicce (Women's International Action-Oriented Resource Centre)

3 chemin des Campanules, 1219 Aire, Geneve

研究公正、和平、性别差别和暴力问题, 对相关运动提供支持。

坦 桑 尼 亚 (Tanzania)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坦桑尼亚非洲妇女研究与发展协会 (AAWORD)

Association of African Wome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Tanzania,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PO Box 35044, Dar es Salaam

开展对坦桑尼亚妇女和女性问题的研究。以促进妇女的社会参与为目的,研究她们所面临的问题,研究领域涉及:劳动、人口统计、教育、政治与妇女就业等。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女性研究与文献计划 (WRDP)
(1979 年成立)

Women's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Project,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Box 35185 Dar es Salaam

坦桑尼亚女性研究文献工作的中心机构。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发展研究所女性研究小组 (WSG)

Women's Study Group,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PO Box 35169, Dar es Salaam

女性研究与发展项目

Wome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PO Box 35544, Dar es Salaam

泰 国 (Thailand)

清迈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1986 年成立)

Women's Studies Center, Chiang Mai Universit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Chiang Mai University,

Chiang Mai 50002

以泰国北部妇女与发展问题作为研究重点而设立的研究单位。

朱拉隆宫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妇女、儿童和青年研究计划 (1981 年成立)

Women, Children and Youth Study Programme,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hayathai Rd., Bangkok 10330

孔敬大学女性研究计划 (1991 年成立)

Women's Studies Programme, Khon Kaen University

Faculty of Human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Khon Kaen University, Khon Kaen 40002 247

收集和提供与妇女相关的信息, 提供有关女性学研究的文献服务, 着重女性潜力的开发, 出版《孔敬大学女性研究杂志》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Khon Kaen University*)。

帕亚普大学女性研究计划

Women's Studies Programme, Payap University

LPO Box 101 Chiang Mai 50002

宋卡亲王大学研究与发展部女性研究中心

Women Study Center,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Head Yai, Songkhla 90110

以泰国南方地区的妇女为对象开展女性学研究工作。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Trinidad and Tobago)

加勒比女性主义研究与行动协会 (CAFRA) (1985 年成立)

Caribbean Association for Feminist Research and Action

PO Box 442, Tunapuna Post Office, Tunapuna

工作宗旨是运用女性主义方法探讨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 促进女性主义研究与行动之间的联系, 支持加勒比地区的女性主义运动。近期研究课题有: 加勒比农业中的妇女; 妇女的加勒比史。出版季刊《CAFRA 通讯》(CAFRA News) 以发表研究成果。

乌克兰 (Ukraine)

乌克兰科学院乌克兰女性研究中心 (1992 年成立)

Ukrainian Centre of Women's Studies, Ukrainian Academy of Sciences

Grushevskogo STR 4, 252001 Kiev 1

在乌克兰开展女性研究, 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女性研究中心建立联系, 并开展合作研究, 翻译和出版女性主义著作。

美 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纽约市立大学女性与社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udy of Women and Society,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33 W 42nd St., New York, NY 10036

主要研究妇女健康与工作环境问题, 进行课题研究,
出版刊物, 组织相关会议。

巴纳德学院巴纳德女性研究中心

Barnard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Barnard College
3009 Broadway, New York, NY 10027

249

主要开展与女性相关的课题计划和研究。

阿尔弗诺学院女性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on Women, Alverno College
3401 S 39th St., Milwaukee, WI 53215

布朗大学彭布罗克女性教学和研究中心

Pembroke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Reseach on Women,
Brown University Alumnae Hall, Box 1958, 194 Meeting
St., Providence, RI 02912

主要从事与妇女有关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课题的研究
与指导工作。

圣凯瑟琳学院艾比盖尔·奎格利·麦卡锡女性中心

Abigail Quigley McCarthy Center for Women, College of
St. Catherine

2004 Randolph Ave., St. Paul, MN 55105

以有着天主教背景的妇女为特别的研究对象。

哥伦比亚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Gender, Colomhia
University

763 Schermerhorn Ext., New York, NY 10027

康奈尔大学女性与工作研究所

250

Institute for Women and Work, Cornell University

New York State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ur Relation

15 E. 26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0

主要从事工业和劳资关系领域内的妇女问题研究

北卡罗来纳杜克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Duk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aldwell Hall, P.O. Box 90719, Durham, NC 27708-

3135

埃默里大学非洲研究协会-妇女核心小组

Africa Studies Association-Women's Caucus, Emory

University

Atlanta, GA 30322

纽约市立大学女性主义出版社

Feminist Pres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311 E 94th St., New York, NY 10128

研究女性教育与平等、高等教育机构中妇女的地位与待遇等问题,出版相关著作与刊物,对相关计划提供支持,提供图书馆服务。

乔治·华盛顿大学女性研究计划与政策中心

Women's Studies Program and Policy Center,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Funger Hall 217, 2201 G St. NW Washington, DC 20052

从事公共政策及公共政策中与妇女相关问题的研究,对此有关的经济、教育、家庭和社会问题进行对策研究。

匹兹堡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Women's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632 Cathedral of Learning

Pittsburgh, PA 15260

研究活动集中于经济调整和社会变革对妇女与性别的

影响。

哈特福德女子学院女性研究所

Office of Women's Research, Hartford College for
Women

260 Girard Ave., Hartford, CT 06105

主要从事性别与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

哈佛大学宗教与妇女研究计划

Women's Studies in Religion Program, Harvard Univer-
sity

45 Francis Ave., Cambridge, MA 02138

252 开设宗教领域里的女性研究及宗教、性别与文化方面
的课程，对与妇女有关的宗教、社会和文化课题进行评
估，出版相关出版物，召开有关会议。

明尼苏达大学汉弗莱女性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Humphrey Institute Center on Women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301 19th Ave. S, Minneapolis, MN 55455

肯特州立大学性别与教育研究项目

Project for the Study of Gender and Educati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405 White Hall, Kent, OH 44242

孟菲斯州立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Memphis State University

Clement Hall - 339, Memphis, TN 38152

从事与美国南部妇女、有色人种妇女相关的课题研究,对性别分工、阶级、社会不平等状况进行调查,出版与发行相关的出版物。

密执安州立大学妇女与国际发展计划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02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ograms, East Lansing, MI 48824

253

从事国际妇女问题的研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妇女所面对的问题,研究与妇女有关的劳动、政治和经济等焦点问题。出版相关出版物和召开相关会议。

全国女性研究协会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MD 20742-1325

全国女性研究网络。

俄亥俄州立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7 Dulles Hall, 230 W 17th Ave., Columbus, OH

43210-1311

从事性别、文化与历史问题的研究。为相关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出版相关的出版物，举办有关讲座。

拉塞尔·塞奇学院海伦·厄普顿女性研究中心

Helen Upton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Russell Sage College

90 1st St., Troy, NY 12180

从事女性与教育问题的研究，出版发行相关的出版物。

拉特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美国妇女与政治学中心

Center for the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Eagleton Institute of Politics, New Brunswick, NJ 08901

拉特格斯大学道格拉斯学院女性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men,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Douglass College

27 Clifton Ave., New Brunswick, NJ 08903

史密斯学院妇女与社会变革研究项目

Project on Women and Social Change, Smith College

138 Elm St., Northampton, MA 01063

研究妇女健康、政治与发展等问题。

斯佩尔曼学院女性研究与资料中心

Women's Research and Resource Center, Spelman
College

Box 115, Atlanta, GA 30314

开展与美国妇女有关的问题研究,以人文、教育和妇女健康为重点研究领域,并从事出版和会议组织工作。

斯坦福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Gender, Stanford
University

Serra House, Serra St., Stanford, CA 94305-8640

研究女性与性别问题。包括妇女史、妇女经验及其文化意义、女性的社会规范、妇女健康等问题。组织讲座, 255
提供图书馆服务。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女性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me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Dept. of Sociology, SS 326, 1400 Washington Ave.,
Albany, NY 12222

从事女性问题研究。组织相关的国际会议。

圣荷塞大学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女性与教育研究小组
(1973年成立)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Research on

Women and Education Group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CA
95192-0103

妇女政策研究所 (IWRP) (1978 年成立)

Center for Women Policy Studies

Suite 508, 2000 P St NW,

Washington, DC 20036

从事政策研究和开展与改变妇女的法律、政治和社会地位有关的运动。

256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thnic Women's Studie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hico

Chico, CA 95929

主要从事教育工作。

图拉尼大学纽科姆学院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Tulani University,
Newcomh College

1229 Broadway, New Orleans, LA 70118

重点研究南方妇女和妇女的教育问题。

亚利桑那大学西南女性研究所

Southwest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men, University of Arizona

Douglass 102, Tucson, AZ 85721

对美国西南部妇女的历史与当今状况进行研究,开展多文化的课题研究和教育工作,从事出版和会议组织工作。

亚利桑那大学中东研究协会 - 中东妇女研究协会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Association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 University of Arizona

1232 N. Cherry Ave., Tucson, AZ 85721

推动对美籍阿拉伯妇女问题的研究。

257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比阿特丽斯·M. 贝恩研究小组

Beatrice M. Bain Research Grou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539 Channing Way, Rm. 19, Berkeley, CA 94720

研究女性与性别问题,召开会议,组织讲座和讨论会。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女性资料与研究中心

Women's Resources and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0 Lower Freeborn, Davis, CA 95616

从事女性问题研究,开展出版和教育等工作。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m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36 Kinsey Hall, 405 Hilgard Ave., Los Angeles, CA
90024-1504

从事与妇女有关的健康、暴力、种族差异、历史、艺术和教育等问题的研究。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女性主义研究活动

258 Feminist Studies Focused Research Activ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188 Kresge College, Santa Cruz, CA 95064

开展女性学研究。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中的妇女与男性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omen and Men in Societ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734 West Adams Boulevard

Los Angeles, CA 90007

辛辛那提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Women's Studies Research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ML-164, Cincinnati, OH 45221。

康涅狄格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omen and Gender,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U-181, Storrs, CT 06268-1181

特拉华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Women'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Delaware

333 Smith Hall, Newark, DE 19716

开展政治、历史和教育领域中的女性研究。

夏威夷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Women's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2424 Maile Way, Porteus 722, Honolulu, HI 96822

从事以亚洲、太平洋和夏威夷妇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女性学研究。

马里兰大学美洲研究协会-妇女委员会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Women's Committe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Taliaferro Hall, College Park, MD 20742

促进美洲研究领域内的女性问题研究。

明尼苏达大学女性主义高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dvanced Femin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496 Ford Hall, 224 Church St. SE, Minneapolis, MN
55455

主要从事性别分工和妇女史研究, 出版相关出版物。

明尼苏达大学妇女、公共政策与发展计划

Women, Public Policy,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umphrey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301 19th Ave.,
S, Minneapolis, MN 55455

260

密西西比大学萨拉·艾索姆女性研究中心

Sarah Isom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University, MS 38677

以南部妇女为主要对象的下层妇女问题和性别问题研究。

俄勒冈大学社会/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men in Society,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OR 97403

从事妇女与性别问题研究。出版相关著作, 支持有关

的研究工作，举办公开讲座。

宾夕法尼亚大学艾丽斯·保罗女性研究中心

Alice Pau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me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06 Logan Hall, Philadelphia, PA 19104

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女性/少数民族研究与资料中心

Women and Minority Research and Resource Center,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Box 19129, Arlington, TX 76019

以家庭问题、女性企业家、保育和性别差别等为中心 261
对与妇女就业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

塔尔萨大学妇女文学研究

Research in Women's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ulsa

600 S College, Tulsa, OK 74104

研究女性文学与妇女史。

华盛顿大学西北女性研究中心

Northwest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J - 50 Cunningham Hall, Seattle, WA 98195

研究重点放在课程改革以及妇女、科学与技术等问

题。

威斯康星大学女性学研究中心

Women's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336 North Hall, La Crosse, WI 54601

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公共政策、妇女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妇女史。出版相关出版物,组织演讲,在研究资金方面提供援助,设有图书馆。

犹他州州立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所

Women and Gender Research Institute, Utah State University

Logan, UT 84322-3555

华盛顿州立大学女性资料与研究中心

Women's Resource and Research Center,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ullman, WA 99164-7204

研究重点为西北地区的发展和农村妇女。

韦尔斯利学院女性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Wellesley College

828 Washington St., Wellesley, MA 02181

对公共政策、教育、保育、科学和就业等与妇女有关

的问题进行研究。

国际女性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1717 Massachusetts Avenue NW, Suite 501
Washington, DC 20036

妇女研究与教育研究所

1700 18th Street NW, Suite 400
Washington, DC 20009

国际发展中的妇女

Women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2 International Centr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 MI 48824

图书馆和咨询机构，从事与第三世界妇女生活相关的
信息与研究成果的传播工作。

妇女与国际发展研究与信息中心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N

提供有关妇女与发展的信息。

发展中的妇女协会

Association for Women in Development

PO Box 66133

Washington, DC 20035

学者、发展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网络，旨在推动妇女对发展的参与。

全国女性研究理事会 (NCRW)

National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Women

5th Floor, Sara Delano Roosevelt Memorial House

47-49 East 65th Street

New York City, NY 10021

女性主义学者的网络，从事协作研究。

全国有色人种妇女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Women of Colour

Suite 104, 1400 20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36

推动有色人种妇女获得平等的教育和经济机会。

全国妇女组织 (NOW)

National Organi Zation for Women

Suite 800

1401 New York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003

就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开展运动。

乌拉圭 (Uruguay)

乌拉圭女性研究小组 (GRECMU)

Grupo Estudio la Condicion de la Mujer en Uruguay
(Group for the Study of Women in Uruguay)

Juan Pamilier 1174, Montevideo

越南 (Vietnam)

女性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on Women

6 Vinh Cong Trang, Hanoi

津巴布韦 (Zimbabwe)

种族关系研究中心·发展中的妇女研究部

Women in Development Research Unit, Center for Inter-racial Studies

Box M.P. 167, Mount Pleasant, Salisbury

参考文献: Brown, Loulou, Collins, Helen, Humm, Pat Green Maggie, Landells, Mel (ed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Women's Studies*.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主要参考文献

østergaard, Lise (ed.), 1992, *Gender and Development: a Practical Guide*. London, Routledge.

Aaron, Jane and Walby, Sylvia (eds.), 1991, *Out of the Margins: Women's Studies in the Nineties*.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Afshar, Haleh and Maynard, Mary (eds.), 1994, *The Dynamics of 'Race' and Gender: Some Feminist Intervention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Ashworth, Georgina (ed.), 1995, *A Diplomacy of the Oppressed—New Dir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 Ltd.

Bowles, Gloria and Klein, Renate Duelli (eds.), 1983,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rouns, Margo, 1990,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tudies. A Re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Gravenhage, STEO (Promotion Committee for Emancipation Research).

Davis, Kathy and Grünell, Marianne, 1994, *The Dutch Case: An Interview with Margo Brouns*. i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1, p.100.

De Groot, Joanna, and Maynard, Mary (eds.), 1993, *Women's Studies in the 1990s—Doing Things Differentl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Douma, Willy and Hombergh, Heleen van den, 1993,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Women's Empowerment: Local Dilemmas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VENA (Women and Autonomy Centre) Journal*, 5-2, 31~35.

Eisenstein, Hester, 1984,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Elshtain, Jean Bethke, 1993,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Harcourt, Wendy, 1993, Towards a Feminist Alternative to Greening Economics. *VENA Journal*, 5-2, 37~42.

Hausler, Sabine, 1993, Wome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 Years in Retrospect. *VENA Journal*, 5-2, 5~15.

Herrmann, Anne C. and Stewart, Abigail J. (eds.), 1994, *Theorizing Feminism—Parallel Trend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Hinds, Hilary; Phoenix, Ann and Stacey, Jackie (eds.), 1992, *Working Out: New Directions for Women's Studies*.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Humm, Maggie, 1995, *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 (Second Edition) Prentice Hall / Harvester Wheatsheaf.

Katzenstein, Mary Fainsod and Mueller, Carol McClurg (eds.), 1987,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ennedy, Mary; Lubelska, Cathy and Walsh, Val (eds.), 1993, *Making Connections: Women's Studies, Women's Movements, Women's Live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Keyzers, Loes, 1993, Women and Population Questions: from Rioto Cairo and Beyond. *VENA Journal*, 5-2, pp.43~52.

268

Kramarae, Cheris and Spender, Dale (eds.), 1993, *The Knowledge Explosion——Generations of Feminist Scholarship*.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Kuper, Adam and Kuper, Jessica (eds.), 1985, *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doc-Jones, Beryl and Coates, Jennifer (eds.),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Women's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Maynard, Mary and Purvis, June (eds.), 1994,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Ltd.

Maynard, Mary and Purvis, June (eds.), 1996, *New Frontiers in Women's Studie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Ltd.

Mosse, Julia Cleves, 1993, *Half the World, Half A Chance. An Introduction to Gender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am.

Reardon, Betty A., 1993, *Women and Peace: Feminist Visions of Global Secur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Diane and Robinson, Victoria (eds.), 1993,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Feminist Theory and Practice*.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Rowbotham, Sheila, 1992, *Women in Movement—Femin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Ryan, Barbara, 1992, *Feminism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Dynamics of Change in 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Activism*. London, Routledge.

Stanton, Domna C. and Stewart, Abigail J. (eds.), 1995, *Feminism in the Academ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Tierney, Helen (ed.), 1991, *Women's Studies Encyclopedia VI*.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北京，1995。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北京，1998。